

# 中共党史人物资料



- 坚难岁月几多事，但留真情在人间  
——忆和刘志丹在神府的最后几次会面
- 大跃进的序幕  
——南宁会议
- 高岗发难与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召开

李克农传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57

1996年2月

# 中共党史资料

第五十七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年·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共党史资料 第57辑/《中共党史资料》编辑部编辑.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3

ISBN 7-80023-983-7

I. 中… I. 中… III. 中国共产党-党史-史料 IV. D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6)第05413号

### 中共党史资料(第57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1929信箱 邮编:10009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35号

电话:(010)2581570 传真:(010)2581532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

---

850×1168毫米 32开 7.875印张 160千字

1996年3月北京第1版 199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5000册

---

ISBN 7-80023-983-7/K·903

定 价:6.00元

# 目 录

## 文 献

- 一组“三一八”惨案资料并注释 ..... 王善中(1)

## 回 忆 录

- 刘伯承与中央教导师的组建 ..... 裴周玉(20)
- 艰难岁月几多事,但留真情在人间  
——忆和刘志丹在神府的最后几次会面 ..... 王兆相(30)
- 延安时期的“赵占魁运动” ..... 杨长春(44)
- “大跃进”的序幕——南宁会议 ..... 李 锐(56)

## 专 题 资 料

- 中国共产党民族自治政策的成功尝试  
——记1936年红军西征期间建立的豫海县  
回民自治政府 ..... 孙国标(114)
- 延安的最高学府  
——从马列学院到中央研究院 ..... 宋金寿(123)

- 高岗发难与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召开 ..... 林蕴晖(132)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历史回顾  
..... 唐小菊(156)

### 人物介绍

- 李克农传略 ..... 林 聪(168)

### 大事记

- “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恩来生平大事记  
(1966—1976) ..... 安建设(215)

### 民国史·现代史

- 日本帝国主义在牡丹江的经济掠夺 ..... 张兆庶等(235)

### 小资料

-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始末 ..... 史 言(245)  
《红军不怕远征难》征文启事 ..... (249)

# 一组“三一八”惨案资料并注释

王善中

1926年3月,北京发生了段祺瑞卖国政府残酷镇压反帝爱国群众的事件,史称“三一八”惨案。从表面来看,这次北京各界群众参加的反帝爱国斗争的领导者是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但是,当时国共两党正在合作期间,根据1923年6月中共三大决议和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决议。共产党组织可在保持独立性的前提下,其党员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的名义下进行活动。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是共产党人李大钊、于树德等人筹建起来的<sup>①</sup>。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陈毅、王一飞、杨善南等中共北方区委、共青团区委领导人及在北京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几乎都参加了“三一八”前后的斗争。所以,这一斗争虽然有徐谦等国民党人参加,但实际上,中共北方区委是真正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关于“三一八”惨案的资料,除了解放后出版的一些回忆录和当时中国共产党、共青团的公开宣言外,有关这次运动共产党本身资料极少,使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很难再深入进行。为此,笔者提供并注释如下资料:

---

<sup>①</sup> 至1926年1月,据北京执行部所辖华北、东北、西北、15个省区的统计,国民党党员人数已达14000多人。

## 资料(一) 柏桂给曾延的信

曾延哥哥：

尊前日来，收到讲义两份，信两封，转经弟讲义两份。讲义不论说。信里边我哥仍旧是高谈阔论，一点不识忌讳。谁不知哥哥近来在图书馆里做事，看了几本书，就这样狂妄起来。所论不管对不对，你要知道，你弟弟是一个守本份的生意人，这些东西是用不着。就是函授学校的讲义，承哥哥情，总寄给我们看。但是，我们所要的只是商家知识，其他的却用不着。在哥哥，或者是一番好意。不过，现在当局正在严厉搜查卖国的赤党。信也严密的要检查。所以，你虽然无心，却难免引起别人的怀疑。哥之爱我，适足以害我也。务愿遵言回信去，不要依旧像以前那样的不遵先王之道了。元芳弟那里，我们不是没有去信，在最近一个半月里，我去了有五封信呢，恐是因交通不便的原故，所以没(收)到吧。哥又时催我向总店报告状况，这却是一件难事。自从奉军进城，我们恐慌较前更甚。虽然我们门前做了电网，可是，账目不得不来之高阁。恐防奉军查赤党的时候，我们的账目要因此遗失。那才吃不了，兜了跑。总店也不得不原谅我们这一届待时局稍平静，自可像以前每作详细报告。目前只可不依形式的随便谈谈。现在将各处招到的和以前的股数大概写在下面，不过，还有几位老板仍旧好久没有信来。我店现在山西已有一百七十股(渔橡林第一人上月就收了七十余股，不过旧股退了些，共计苻弟是十八股)。天津锦弟共有九十九股。大连张兼德老板亦有五十股。其他还不十分清楚。北京景棣生意却不十分做得好。详细因账目收起的原故，一两天恐查不清。弟虽平安，然因天气不正，时刻有病的危险。当自知保重以免我哥挂念也。肃此并祝

哥、嫂大安

小弟 柏桂叩

三月二十六日

注：曾延是团中央的代称，柏桂是共青团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代称，股是支部的隐语。1926年3月18日，北京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北京学生总会以及200多个群众团体代表，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声讨帝国主义和段祺瑞卖国政府的大会，会后，不少人去段祺瑞的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的国务院处示威请愿，遭到执政府卫队的残酷镇压，这就是举国震惊的“三一八惨案”，惨案后，执政府在北京大肆抓捕爱国民众和师生，在白色恐怖下，柏桂给曾延发出此信，从信中可以看出，对当时形势的看法，柏桂和曾延之间是有分歧的。

## 资料(二) 芳渠给曾延的信

曾延兄：

北京惨案发生后，柏蔚兄曾有一报告给钟英兄，想我兄对于此次惨案的情形，当能知道一个大概的情形，弟因病，不能与兄详细作笔谈，只好将家中关于此次事件的记载刊物，择一二较详实的寄给我兄，另外在该物中未说及的情形稍加补述，请我兄将柏蔚兄的报告和弟的此信参照一看，如尚有不知道的事情要问弟的，即希速为示知！

关于惨案的本身是这样：死者四十九人，重伤者数十，轻伤者百余（截止今天为止）。我校同学死者八人，民校同学死者十一人；重伤者两校皆有数人，有一、二人恐有残废之虞。四十九人中，女子五人；学生三十余人；市民十余人。至于惨案内幕，则请问钟英兄，因柏蔚兄已报告了。

惨案发生后，至十九日至今今天，各校之追悼会和送殡者络绎不绝。由我校同学和民校所主持之各界追悼大会，亦于二十三日举行了，但因近数日天气不正，同学多恐患病不能积极参加工作者，故此会规模不能宏大，赴会者千余人。惨案后各界所组织的团体有：(1)北京惨案善后委员会（本校所领导的），(2)三月十八惨案北京各界昭雪会（民治主义同志会与国家主义团体所领导的），(3)北京国民反辛丑条约国侵略大会（民治主义同志会所领导的）。

(1)即十八日在国民大会所报告的当晚七时的各界代表集会，



适惨案发生,故即成立北京惨案善后委员会,其工作之最主要者,除二十三日之各界追悼会外,则为筹备死难烈士之合葬工作;他如唁死慰伤及调查死伤数目,亦为该会之工作。(2)为国家主义团体及民治主义同志会所发起,我校及民左同学初亦参加,后因开会时民左与彼事冲突,遂分裂出来。现该会又在进行国民追悼大会,我校同学亦当斟酌参加。合葬事彼等亦愿参加,但在开筹备会时,彼等主张以为此事彼等自己已讨论过,并在彼等所筹备之国民追悼会联席会中议决组织三月十八死难烈士公葬筹备处。不过昭雪会中所参加之团体数量很少,一部分还是死者的苦主,被他们拉住,自不好意思退出,故结果他们决定派代表来参加善后委员会的公葬筹备会。今天下午开会时,他们代表果出席,在讨论时,善后委员会中之团体主张即日切实进行合葬事宜,因环境的关系太坏,待葬后,视环境如何,仍可进行大规模之工作,此说颇得一般死者亲属之赞同,他们虽未加以反对,但以此事之进行应以昭雪会为主,并空谈怎样纪念追悼及对于公葬工作不切实主张,未能得到多数的同情,他们就自行而退席。在此筹备会中之代表人数,善后委员会并不多于昭雪会,不过主张能得多数之同情者而已。此事之进行如何,容后再告。(3)为民治主义同志会及孙文主义学会所领导的几个团体所组织,并无什么工作,现只剩一个空名而已。

北京各报纸对于惨案的态度:(1)顺天时报(日帝机关报),阅其廿日之社论即可知(社论全附上)。(2)晨报(研究系的),惨案发生后五六日每天都有社论,主要的意思在诬蔑群众运动的基础,攻击群众运动的领袖(徐、李、顾诸人),并言“先除坏人,再言运动”;对于此次惨案的解决步骤该报主张:A、搜集证据;B、以所搜集之证据由死伤者之家属或本人向法庭控告,依法解决。(3)大同晚报(老吴机关的),一味谩骂和诬蔑。以上都是反动报纸中之最重要者,以下为表同情之报纸,亦择其重要者而言。(4)京报,附上该报二十一日之社论。(5)世界日报态度比较好,可看其十九日之社论(附上);二十日的社论大意为指责段政府通电及通缉令之谬妄。

(6)国民新报,此报之态度自不待言,但惜编辑太差耳。其他报纸不甚重要,故不赘述。

北方各地对于惨案的声援:如天津曾召集联席会议通电声援:保定亦然:太原学联议决罢课援助:张家口,南口亦开会,来电表示援助。

近闻尚有大批通缉令要下,人数由五十至三百之多,确否尚不知,容缓告我兄可也。

再者,出版物中如《语丝》、《猛进》及大部分各校学生会刊物皆表同情于此次惨案,反动者居少数。其余情形,请参看最近出版之政刊(特刊),恕弟不多谈了。柏蔚兄尚有详细之政治报告,请兄注意!

我校同学死亡名单列后。

弟芳渠上言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附:死者姓名

姚宗贤(艺术专门)P. Y.

李廉楨(交大毕业)P. Y.

江禹烈(工业大学)P.

宋昭丙(平民大学)P.

张仲超(北京大学)P. Y.

范士融(师范大学)P.

张梦庚(大同中学)Y.

陈桂深(广东外交代表团)P.

注:芳渠是共青团北方区委的代称,柏蔚是中共北方区委的代称。“校”是共产党、共青团的隐语。在这封信中,芳渠向曾延比较详细地报告了“三一八惨案”的经过,并告知,在这次惨案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共有8人牺牲。信中还报告了当时北京的一些情况。

### 资料(三) 白芳渠给曾延的信

曾延兄:

快函悉。兹答复如下,并略有所声(申)述。

北京事件兄方所给之指导实为正确,但时局之变化,实非吾人所意料及者。其详细情形以及大的方略,大校已有报告,可不重述。

渠对此新局面下的工作，仍然是依照弼时来京所规定各项工作之原则进行，惟各地各特支受影响，工作之发展恐难如愿以偿。在此新的反动局面下，北方宜特别注意秘密工作，保存并发展我们的实力，同时公开的活动甚难，活动范围亦缩小，前途进行，极感棘手。

北京事件仅张家口与太原有群中(众)运动表示同情，尚可勉强支持，其次天津仅在国军退前一日举行示威，其后遂不能继续。沿京汉一带，学校停课，而我校亦多陷入停顿状况；晋省则在军事行动时期更少活动；天津，唐山近日稍有整顿，此根基尚未巩固之；二地当为此政治局面之遽变而波及，但情况尚不大恶。

北京地方尚无不好情况，惟在此政局摇动不稳时，仍表露幼稚状态。近来忙于惨案善后与内部整顿，进行秘密工作，现已大略就绪。内部稍加准备，严密组织，洗刷同学，加紧训练并力求各方面组织之扩大。宣传方面似稍觉迟缓，但亦不顶坏，秘密工作方面已将所有负责办公处搬移秘密起来，一切文件，俱设妥法，俟时局稍定后，当稍好也！

近来京中反宣传甚力，反共之声浪起初颇高，现反沉寂，□义派并向政府中告密，种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惨案运动亦只能善其后已，日来筹备公葬，到时或可举行一大的送葬运动。

总之，此次政局之变动，给吾人以莫大的打击，而惨案亦不能得一结果，更不能有似五卅之运动，吾人工作趋于保存与发展我们的实力一途，乘时而动也！（详因请参阅大学政告，便可知我们并非故速来命）

区代会因军事时代交通不便，北京城内亦极紧急，已决定停开，大校亦同；俟京汉车通，派南兄出巡，视察并整顿各地或各特支工作，同时在可能机会内，代表学总考察并发展各地学联合会。

区代会既停，区无法改组，祈兄速为指定名单，现已过期数日矣。

兹有零碎事项报告：

1 大同、丰镇停止通信，该地春瘟甚盛，入病院学生二十余人，由病出境者镇寰一人。

2 振纲已来京，因唐道塞，暂赴张视察。

3 天津兰田妹因不服水土，拟赴张调养，余世颂兄速离沪为盼！

4 四月份家用费从速寄来！！

5 三月份试卷因各地俱未有寄来者，故无法品列。

6 陕北两地虽划归渠，但迄未来信。

7 拟给中青作一惨案文字，不日奉上。

8 渠原名犯讳，大校已另赐名，是否亦可改名，乞示知。

9 津地所求增加家用，预算尚未来。

10 俞山兄近已失散，所代印之中青暂停，兄意若何？（渠之三千份仍早翻印）

11 弼兄前嘱代订“国民新报”半年，已照办（二千份）并代付了报费。

白 渠 芳

E. Shiao

另告：附大校政刊及政告各一份，祈查收！

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五日

注：白芳渠，芳渠，均为共青团北方区委的代称，南兄指共青团北方区委宣传部长杨善南，中青指《中国青年》，E. shiao 指共青团北方区委书记萧三，弼时、弼兄指任弼时。大学是共产党的隐语，试卷是报告的隐语。这是一篇“工作报告”信。

## 资料(四) 柏经狄三、四月份工作报告

(一九二六年)

柏经狄三四月份的工作，有两个时期，应该分开说明。

(A) 三月十八日大惨案以前

三一八以前反奉联合战线的破坏,尚未很明显的表现出来。国军的军事行动,正是很顺利的向前发展。国军一部分领袖的政治主张的右倾,也并未露骨。普遍民众对他们的希望热忱,尚在兴高采烈的时候,反奉的宣传及反帝的运动——这些都是直接帮助国军的表现,几乎没有一天不在进行中。在国军支配下政治环境,还未受着帝国主义激烈的威胁手段及反动军阀联合进攻的恐怖。(国民军)对于民众直接间接的帮助他们的力量,也略有一点感觉。虽然国民军的重要领袖始终没有明白的政治主张和显然站在民众方面,不能博得民众深刻的信仰,而尽力帮助我们。但是他们对民众运动采取消极不干涉的状态之下,民众本身在政治上的力量,总得遂其相当的发展,所以此刻的群众运动和社团活动都得着充分的自由而尽量作去。

#### (a) 群众运动

(1) 三八纪念,在艺专举行讲演大会,到会在四百人以上。讲演的有徐季龙,陈启修,鲍罗丁夫人及女工同学等。宣传品除妇女联合会的传单外,政治生活、中青及各种书籍均由同学负责在会场贩卖。

(2) 援助旅俄华侨大会,国家主义者为金石声失踪,在第三院如召集反苏大会。事前决定二三同学出席讲演,用理论去诘责他们,并印有传单“反苏联帝国主义?”五百份在会场散发。当时到会人数约二百余,同学参加的约二分之一。国家主义北方领袖李璜主席,刚说一人讲演毕,同学即有起而出席讲演者,经主席阻止。于是会场秩序大乱,打得一哄而散。

(3) 中山纪念节,在三殿举行,连续三日,群众在三十万人以上。当日宣传品有与大学合发“为中山纪念告全国民众”及接得区的“为反张讨吴告全国民众”各三万份,中青及北京学生均出特刊,其他如学总、非基、济难……皆发有宣言或小册,并各支均组织讲演队,分布四城讲演。惟当时有我们领导下的工人维持队,未得团体的命令,自由的用武力驱逐破坏秩序的群众,致引起左派与我们

的误会，这完全是工人同志之幼稚缺乏训练工作的结果。右派曾在中央公园举行，参加群众与宣传品则较少。

(4)反对八国通牒的国民大会。三月十七日因八国无理通牒，各团体代表到执政府请愿，小有冲突。至十八日午后一时在天安门开国民大会，到会群众有学生市民工人，约五万人以上，除与大学共同发表宣言外，如学总、非基、济难……等均有宣言及传单。午后二时至国务院，卫队早已荷枪实弹，严阵以待矣。群众秩序，异常整齐，惟有少数同学持传单向卫队散发均被拒绝，甫及半小时，即有流氓持棍混入群众中，大呼打者，于是秩序大乱，枪声四起，这算是前所未有的大屠杀。我们的死者如张仲超等五人。以组织异常薄弱的群众，经了这样大的挫折，此后我们在群众中的工作，当然受了重大的打击。

此外如反日进兵南满大会，反张讨吴大会，反英反日讨张吴国民大会……等，同学均全体参加，宣传品除每次与党共同发表宣言外，只组织有讲演队及指定同学赠卖书籍，并无特别煽动品。

#### (b) 社团活动概况

(1)学总 学总正式加入的学校有四十余校，而每次代表大会，至多只能到三十校。这因为右派、国家主义者消极抵制的原因。但是主任会议与执行委员会，颇能照常召集，各种工作尚能积极进行。特别是政治运动，作得最多，如反日进兵南满，反张讨日，反张吴讨英日；反对日本炮击大沽口，驱马运动，反对八国通牒。各种群众运动，大都以学总为中心。对于学生本身利益工作，虽然对各校学潮有相当援助和指导，我们总嫌作得太少，尤其是组织与训练工作，更没有成绩表现。所以总不能使普遍学生感觉学总的需要而尽力拥护他，这是一件顶危险的事情。

(2)非基大同盟 非基支部有三十余个，约四五百人。工作甚积极，如反对教会学校强迫学生信教，教会学校应照部章办理，援助教会学校学潮及退学生等，都能引起群众对他的信任。尤其是在中山纪念节的宣传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当时自动加入的有

两千余人。可是工作的最大缺点,是太偏于上届(层)的公开活动,没有实际去组织群众,训练群众,所以他的基础,并不巩固。

(3)革命青年敢死队 除却群众运动发生时,召集临时大会,作一点宣传工作外,平时并没有什么组织与训练,因此在群众中,也没有大的活动与影响。

(4)仇货检查团 这是一个临时的组织,十八号以前,每日均积极进行,同学参加的,间日二十人。

(5)四川青年社 这是四川左派学生新近才有的组织,社员约百余人,本校四川同学参加的甚多。现已成立党团,坚固这个组织,以为四川左派势力发展的核心。

(6)yc 团 这是无组织的共产主义者的集合,四川人占大多数。同学参加这个工作,很有成绩,在他们中间吸收了不少的分子加入本校。《新世纪》就是他们的刊物,可是同学投稿的占大多数。

(7)其余如国民党,新军社……等工作、完全在大学的指导之下,中校同学参加的也很多。国家主义团体、孙文主义学会、南花团、市党部均有少数同学参加进去,不过作侦察他们行动的工作,没有大的活动的可能。这些都完全是大学的指挥。

三一八以前团的对外工作大概就是这些。在这些工作过程中,也得着相当的效果;(1)促进革命势力的发展。(2)提高了民众对政治的兴趣,并且建立民众在政治地位上基础。(3)充分表现出民众的力量,迫着进步武力的左倾。(4)帝国主义参加国内战争的种种阴谋,正是民众势力发展之反映,更使民众认识帝国主义与革命势力之不相容。(5)在各种形势的组织中,团结左派学生,给他们不少的革命的训练。(6)领导民众,渐渐的知道要团结在民校左派旗帜之下,才能完成国民革命的工作。(7)在各种运动过程中,各同学由实际工作,得着许多经验,而增高革命的能力,同时群众也得着政治的训练与革命的宣传。

可是因为我们平时训练工作的幼稚,在这些实际运动中,总觉得有许多缺点,应该注意的:(1)不知道怎样的去运用联合战线的

政策，所以没有一个巩固的联合战线的组织，常有陷于孤立地位的危险，使革命力量不能集中，不能扩大。(2)在社团活动中，偏重于上层的煽动工作，没有注意到怎样作下层组织基础的坚固，所以各种工作，在我们认为是很不切实，并且很危险的。(3)在这些运动中，每容易忽略本身组织的发展，这完全是不懂得我们的整个工作是什么，并且有时在客观上还表现只是团的分子活动，而不是整个团的工作。

三一八以前内部工作的情形：

(a)关于组织方面的工作

三一八以前地委本身组织并不健全，能以全副精神完全作内部工作的，实际仅二、三人而已。如组织学委，大半皆有对外活动牵制，所以地委的全部工作并不十分周到。各种委员会的指导工作，虽然在会议中有详细的讨论和计划，总是议论多，而成功少，这完全是只有上层机关的动作，大部分同学不明白团体工作的重要而能全体动员的努力去干。学委组织与大学合会议能按期召集，开会精神也好，可是他们工作偏于学总会的指导，对于各校学生会的组织与训练工作缺乏注意，所以工作表现偏于大学方面的政治活动，很少指导各校学生会，引导学生群众作日常利益要求的斗争，这固然难于使学生组织的坚固而使我们的努力深入群众。

经委：经委会的组织仿佛是一个工作的团组。这样组织本有很多的毛病：(一)与以前的工农部并无差别；(二)缺乏整个青工的工作，几乎成为个训练工人同志的机关，这完全是北京团的基础大部分建筑在学生身上，同学很不愿意接近工人，骤然要他们全体注意青工的工作，事实上有多少的困难。所以只有在各支部指定一人负责把他工作中所得的经验和方法，在会中详细报告，慢慢的提起普遍同学的注意，来医治过去的毛病。

妇委：与大学合组工作没有成绩，也不能按期开会。一方面是北京的女学生都带着浓厚的小姐气味，一方面是女同学太少。在女学及各种女子团体中，都没有我们的基础，所以活动起来非常困



难。

童委：儿童运动以前没有注意，三月份才开始工作，刚一礼拜，在东城一隅也就有了五十人的组织，都是十一二岁至十四岁的童子。群众运动，他们还能整队出来，参加各种示威运动等大会。

支部情形：各支部均能按期开会，对工作和主义的讨论都很周到，开会时间至少在三小时以上，到会人数十分之八至十分之十。这可见同志对会议已有相当的兴趣。可是普遍支部，同学有极大的毛病，是我们应该极力设法补救的，就是各支会必要地委派人参加，会场空气特别浓重，会议情形也比较好。这完全证明同学对主义没有深刻的认识，没有长期的革命训练，也是证明我们组织的幼稚与不切实。

部委工作：部委分东、南、西三部，各部组织五人（的）委员会，其职务的分配如下：

书记、组织、宣传、交通分配，他与地委关系与学委、经委完全相同。各部书记均系候补地委，以便参加地委会议，得悉地委之一切关于团务的决议。因为北京太大，人数增加，地委对各部及各同学的考察要十分精密周到，在事实上是很困难的，所以部委的工作完全是补救的方法。可是因为人才的缺乏，部委本身组织十分薄弱，对各支部的训练与考察当然不能完全满足同学的要求。现在我们特别设立部委训练班以资补救。

组织的发展：北京工作的最大缺点，就是各同学不知道怎样去作下层组织。在各种运动中，每每偏重于群众煽动，而忽略个人宣传，这对于组织的发展大有妨害。因为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尤其是初由宗法社会脱胎下来的群众，要他自动的觉悟起来，投降无产阶级而加入革命的组织，总是一件困难事情。我们的煽动，至多只能作到唤醒群众去参加革命工作，而整个系统的革命策略与理论，不经过我们的继续不断的宣传，群众是不会懂得的。那么终不能勇往直前走到真正革命途程上来，有时且有误入歧途，倾向反革命的危險。国家主义中间的青年分子绝不是他主观上愿意反革命。

同学们的工作总易忽略这点，所以在继续不断的广大群众运动中组织发展，反觉迟缓，这是去年五卅运动以来的大毛病，现在还是保留着。统计三月一号至三月十八号组织发展的数量，仅得预定计划的七分之一。我们认为这样的结果，完全是我们工作不好，没有什么旁的原因。

#### (b)关于宣传方面的工作

宣传工作在北京，我们素来就感觉到没有系统的出品。在三月，我们极力想整顿恢复所有刊物，如《宗教与科学》、《社会科学》可作为我们的教义和系统宣传的社会刊物，可是终于因事实上之困难而归于停顿。不过中青的销售是略有进步（由一百增至七百份）。

《北京学生》亦因经济上关系不能按期出版。社会刊物如《京报副刊》、《国民新报副刊》、《新世纪》、《革命青年》、《革命周报》，都是很接近我们的。每次都有同学的高论，尚还可以成为我们好的宣传品。其他如各校的刊物，无论学校当局与学生会办的，只要有我们同学，都是尽量去投稿。在群众的煽动工作，三一八以前的确有很大的成绩。每次群众运动及纪念会中，只要有我们同学参加的社团，都发有依照团体的主张的宣言与传单，并且大多数都组织讲演队。这在上层群众活动中已大概说明。至于同学的个人宣传，在每次支会都要严厉的督促去实行。总结上面所说的，觉得有几点是要极力补救的：(1)没有想法去切实指导同学怎样实行我们宣传的计划；(2)仅有群众的煽动很少系统的宣传，这一方面自然有经济上的困难；而人才的缺乏，也是重大的原因，所以要扩大对外宣传是与内部教育工作有密切关系；(3)中青内容太单调，总觉干燥，尤其不适合中学生口味。

内部训练工作在三一八以前是督促得很紧严的，尤其是关于主义上研究，特别重要由部委会至小组会，每次都是必定举行。其他如政治问题、团体刊物、各项通告，在每次支会内，都有详细的讨论。同学工作的批评，相互间也还能切实地严重指出，所以各种会

议,都能增加同学革命的精神和兴趣。可是有很少数同学,因此反觉得看轻实际工作,总以为要专注意义的研究和多方面知识之求得,有充分的学识才能担任革命工作。这种倾向,实在是中了学院式的毒,如果不想法补救,非常危险。这在工人同志中,自然不会发生的。

从前(的)教育宣传委员会,自部委成立,已经没有了。只有地方宣传委员会,内部教育工作,完全包含在部委工作内。

### (B)三一八至四月末

反奉战争,自郭松龄失败而受以重大打击。于是帝国主义更勾结反动的奉直军阀。迭后反对反帝国主义的大联合,一方以反赤口号相号召,借以威胁国民军,一方更公然采用武力的干涉,炮击大沽口,就完全证实了。素来没有固定的坚强意志,和没有了解民众力量的国民军,在这样一个恐吓压迫的情况中,当然很容易屈服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因此反赤大联合,就成为三一八惨案,卫队屠杀民众之武器;而张之江的整顿学风,至少是助成三一八惨案的导火线。北京民众,经此空前的大屠杀,在革命工作上,自然受重大的打击。在国民军几无人不公认其投降于帝国主义;虽然我们在群众中,还继续作抓住国民军,建立反直奉的联合战线的工作。可是第三院的反张讨吴大会还未终了,而奉军大踏步来北京矣,枪决邵飘萍,继之以“宣传赤化……一律处死刑”的告白。于是北京顿成了恐怖时代,我们各方面的工作,日在风雨飘摇之中。因为北京同学从未经过秘密工作的训练,这样以(一)来,当然是很危险的。

地委。地委工作还是能积极的进行,可是没有公开接头的地方。地委与同学的关系,没有从前那样密切、直接,只能与部委常常直接接头,所以对于各支及同学指导,自然有所迟缓不灵敏的毛病,各支及各同学的工作,因之也渐趋于消沉。这里我们承认有许多客观的原因,但是我们由此看出以前内部训练工作,太不切实。团体工作只建筑在各级少数负责同学的身上,普遍同学还未十分明白自身的责任,努力的切实地去担负工作,当着压迫的时候就明

显的证明,我们组织的涣散。这些主观上的缺点,我们丝毫不能否认。

部委。部委组织,因大学工作牵制,常有更换,所以他的组织总难健全,工作也难紧严。部委员确是能负责的努力干去,可是他们中间大半都是新同学,没有经过长期的训练,对于教义的了解非常薄弱,因之对于支部的整顿和指导当然不能十分周到。我们现在的计划要极力健全部委的组织,加紧他们的训练。因为在秘密工作时,部委工作特别紧要。一方面因为他们是地委与支部组织中间的枢纽,两方面的关系,都是非常密切;一方面他是负有考察训练指导各支及同学的责任的。

支部。北京组织的不坚实,我们早已感觉。尤其最近我们为团结青年起见,把旧的同学尽量的送入大学去,所有的纯粹中校同学大都是新近分子,自然缺乏训练,更不知道什么秘密工作,镇静功夫,并且从来团的活动总觉以地委为核心,所以一经反动局面,各支部的工作就表现得很散漫。如中俄大、北大、民大、师大、工大,以及工人支部,不惟各项工作停顿,就是会议也不能召集。其余的如中法大、艺专……各支部,平时组织略有一点,基础比较好,会议能按期召集,到会人数十分之八到十分之十,支部工作均能进行下去,并没有受什么大的影响。

各种委员会。学委与大学合组,宣委与区各组,均能按期开会,到会人数与精神都很好,不过许多工作因事实上的困难而归于停顿。经委组织原来有许多毛病,因地方;召集的各种困难,会议曾有两礼拜的停顿。自从依照组织改组委员会后,会议已能按期召集,工作尚还没有什么表现。至于童委、妇委,现在还未整顿起来。

组织发展。组织发展有两点困难的原因:(1)各校小的灰色团体无法整顿,同学失却接近群众去作宣传的机会。(2)国务院的惨杀,枪决邵飘萍,肃清赤化,大部分群众都很惶恐,而不敢接近我们。可是我们主观上的缺点,有下列两点:(1)同学平时参加社团,没有注意到组织群众,坚实群众组织的基础,所以一经压迫,即限

于无法整顿；(2)同学恐怕太甚，不敢去找群众作宣传。

宣传与训练。宣传工作，除要各同学尽量在各校刊物上发表文章外，本校的中青、北工……等都不能公开的赠卖、散发。《烈火》在四月业已出版，内容本拟照《洪水》办法，但因同学们的能力太差，总不如《洪水》那样精粹，受人欢迎。经费已成问题，一二期几乎完全靠本校帮助。现已要他们另自设法，对内容亦尽量刷新。至于训练工作，几乎完全集中在部委身上。因地委不能如过去能够参加支部及小组会，对各同学的训练指导，当然不能照前那样密切。而支书联席会，亦以事实上困难，不能照前按期召集，只能分别开会。训练工作也不能如从前那样周到。因此各部委支书因自身能力的关系，在各小组会中，关于一切问题的解决，自然也不能十分圆满。

对外活动，惨案以后的两礼拜，我们所领导的社团如学总、济难、非基、新军社、共进社及各校学生会，还有公开的活动；组织惨案善后委员会、起诉委员会、公葬筹备处、各团体反张讨吴大会及各校团体的追悼会，无不积极进行广大普遍的宣传。在段氏滚蛋的时候，各项工作正期作新的发展，继续不断的提高群众革命的热潮。群众经过一次严重的刺激，痛恨帝国主义与统治阶级的心理，自然深刻，革命的热潮实在可以因此而更澎湃起来。所以岁时的运动，无论在哪方面都有重新号召起来的可能。可是自奉军入城，枪杀邵飘萍以示威，而各项工作，当然无形停顿。不过学总还是继续不断的秘密进行。

我们比较这两个时期的工作，完全看出北京组织的病根：(1)只有少数负责同学在活动，普遍同学并不了解实际工作的重要；(2)支部失却活动的核心，工作基础只能建立在地委或各种委员会身上；(3)社团活动忘却怎样去组织或训练群众，工作过于浮夸而不踏实。以后我们认为应该根据这些缺点，计划我们的工作，一步一步踏实作去，把我们(的)基础建立巩固好，你们以为如何。

书记 唐洪周

注：柏经狄是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代称，大学的隐语是共产党，大

学同学是共产党员，中学的隐语是共青团，中学同学的隐语是共青团员。在这篇报告中，柏经狄对“三一八”运动前后的工作，作了认真的总结和反省。

“三一八惨案”的发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1924年10月，正值第二次直奉战争激烈进行之际，直系冯玉祥部在北京发动政变，一举推翻了直系军阀曹錕、吴佩孚在北方的反动统治。冯玉祥一向同情并向往南方的国民革命，故政变后将所部改名为国民军。冯自知自己资望不足以组阁，一度推着孙中山先生到北京来主持政局。后来，由于反直同盟中（指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国民党之孙中山三方）最大实力派奉张的反对，奉张还以大兵直逼关内，段祺瑞才作为国民军与奉张相互让步而又为反直各方都能接受的人物被抬上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的位置，主持北京中央政府工作。

当时，国民军、段政府与国民党三者之间关系很微妙。段一向反动、国民军与国民党对他是不满意的，但由于反直同盟关系，且段又有奉张的支持，所以还不能公开反对他。在段执政时期，国民党虽然不公开反对段，但一直组织并鼓动北京民众在善后会议、金佛郎案、关税会议等事件中猛烈冲击段、国民军则“采取了消极不干涉”的态度。段并无实力，远有奉张撑腰使他欲退不得，近有国民军冷淡使他欲进不成，所以他一直对国民军和北京民众恨之入骨，只恨没有机会进行报复罢了。

1926年初，国内政局急剧变化，直系吴佩孚东山又起，并与奉张化敌为友，从南北夹攻国民军，原与国民军有约的直鲁联军、山西晋军也反叛从东西夹击北京，国民军处境危急，冯玉祥被逼往苏联“休养”。3月，日本军舰炮击国民军大沽炮台，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就不是革命队伍的国民军，步步向中外反动派妥协，并求助于段祺瑞从中斡旋，段也正是利用了这一时机，对北京民众进行报复，制造了“三一八”惨案。

这篇报告中，柏经狄叙述了对上述形势的认识过程。同时，对党组织自身的工作作了深刻的总结和反省，认识到“三一八”惨案的发生，固然有其客观上的种种原因，但党组织自身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 资料(五) 柏桂中学三、四两月校务活动(庶物部)

自从三一八惨案发生以后，各方对于我校压迫日益加厉。在那惨案刚发生的后两星期中，几乎完全是筹备传染，关于卫生是极力讲究，总算还好。直到国民军退守南口，北方的季(气)候完全转变

了,并且雷厉风行的要搜查赤化党人,所有宣传品,更是犯危险性,假(如)有人要是将他放在家里。学校的检查实现了,并且还要检查住家的,因此我校一切文件,诚恐稍有失落,不得不送到保险箱暂存。我们做(的)试卷,各地方送来参考书,都是锁着的。这可是我们在近数月以来未做试卷的最大原因。现在气候是好些了,不过所有的文件,仍旧没有(去)拿出来,如果要出来,那是随时有上零(的)可能性。

还有在几个月之中,起初是京汉不通,山西及保定一带的信不得来,我们也没法去信。后来京奉也不通,而今京绥还是不通,因此各地方的学生和我们的关系都断绝过一些时间,除北京而外,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在这两月以内,派出的人特别多,或者是巡视,或者特派短时间驻于某处,直到今天,还三个人在外面呢。这是我们救济上面,所说弱点的一个方法(面)

在这几个月中,因天气不正的原故,各地方自然都受影响。我们预定在本月底以前能够筹备到五千元的事,也不能实现了。大同、丰镇、丰台的分校都关了门,石家庄的分校也关门关了一些时候,最近有人去,总算恢复起一班来。这是就减的方面说,在增的方面说起来,大连和乐亭已正式成立地方分校。新成立的支校,也有七处,如长辛店,瓦房店文、潞、定(这三个是在山西),磁县、固上(保定附近)等处。至于陕北的一个分校,四个支校,那是新划归我们的。

总共统计起来,现在有十一个地方分校,廿七个特别支校。学生一千一百六十九人。

组织方面,在区校无大变动。仍是曠长教务,南长总务,棚主训育,才一主经科,余一人则为唐从周。在各地地方,京□弟教长改任唐从周。训育李耀奎;李继岳助理总务。田锦弟则教长,仍旧瑞并兼训育,总务则为晓天,学生改任汪犹春,妇科江韵清。汤祥教长改任刃光。保校教长改任彭桂秋。总务丁春兄,训育秋兼,学生郝培年,经科李经文。乐亭校教长徐云步。习隶校教长改任杨应举,总务杜

振庭，训育罗百福、学生栾木林、经科叶玉云。邵元教长改任周玉麟，武子群改任总务，训育王性善代，经科李奎英，学生郭瑞。支校更改者：渔德教长仍属秦金翰、总务范志鲁、训教范志周。经科王治汉。隆平教长改任张玉清。元氏教长改任魏哲甫，其他则无大变动。

在最近发展较速者，首推渔德，次及廉德。□田锦、振德、冯良等只有减少耳。其他各校亦仅得保持原状，即有增进，亦少数也。关于此类已另列详表，此处不赘。

各委员会近来亦无多大进行，环境关系使然也。京弟学委及经委虽照常上课，亦无成绩可言，

对外方面，京中各团体临时性质者，自是取消，其他如教会联合会亦因以前全属表面工作，时局一变，遂不振矣。学生委员会亦只能维持现状。余则无可述。锦弟处，学生为读书运动，曾有进行，较前自是略有进益。汤禅迪自清久在病态中，妇会解散，儿童虽有五六十人，亦无进行。葆弟户外运动向不注意。镇弟农科已停，惟学生则在开始。邵元教会联合会，在开始组织中。渔德工校已成立。廉德有罢工事件，另有才一报告参考。习隶芳学生委员会已成立，现正进行陕北整个组织，工校已亦成立。

在京案后各地大规模举行追悼会者有北京、张家口，绥德、隆中等数处。

上两月大概情形如上所述，另附统计表。五月份或可较详，晰现已严促各处报告矣”。

#### 柏 桂

注：柏桂是共青团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代称，庶务部为组织部，试卷为“报告”，训育指宣传，这篇报告叙述了“三一八惨案”后，共青团北京支部的活动情况。

有关“三一八”运动的资料，对党史研究也是很有意义的。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特别会议，会议决定“如北方国民军地位稳定，则中央即移往北方”，而“三一八”惨案的发生，不能不是我党发展中的一个挫折。



# 刘伯承与中央教导师的组建

裴 周 玉

刘伯承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始者与组织者之一，是中外著名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本文重点介绍 60 年前，刘伯承组建中央教导师的那一段艰难斗争历史，以资纪念他在建军史上的卓越贡献。

## 一、在乌云笼罩下接受组建任务

1934 年夏季，正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最紧张激烈的时刻，也是党中央“左”倾路线领导者排除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全面推行单纯防御的错误方针，造成反“围剿”战争失利、苏区缩小、人民思想动荡等极端困难时刻，党中央决定由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在三个月内完成组建一个坚强的战斗师——中央教导师的任务，以保卫党中央机关转移时行动的安全。他接受任务后，就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地进行筹组工作。他召开座谈会，征求各方对组建教导师的具体意见，以及解决兵源，武器弹药困难的措施。讨论中大家认为当时苏区兵源武器奇缺，且不能从前方抽调部队，于是刘总长决定选调各县独立营团，补训营团与游击队等整编为教导师，既解决兵源困难，保证按期完成组建任务，又能保证部队具有战斗力。

中央批准这一方案后,刘总长就于7月上旬,召集各军区、分区领导干部开会宣布这一方案,说明组建教导师的重要性,得到同志们热烈拥护,但讨论中也提出许多问题,刘总长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决定:

(1)各县调出的武装部队之枪支、弹药、服装等,调出多少补充各县多少,以满足各县扩大武装之需要。

(2)凡敌人已占领的县份,调出地方武装时,允许留几十人枪作为扩大本县游击队基础,以便开展游击战争。

(3)敌人未侵占的三个县,调出的武装部队。由总部按数补发枪支,弹药与被服等。

刘总长的上述决定,为组建教导师解决了兵源这一最大难题,也是按时完成组建任务的主要条件。

刘总长又召开总部各部门领导人的会议,研究解决干部,装备等问题。因战争激烈残酷,部队伤亡大,干部武器弹药奇缺,从前方部队抽调干部与装备根本办不到。因此,讨论后,刘总长决定干部来源:①从总部各部门与后方各机关抽调;②从后方医院选调已治好的伤病员中的干部;③从地方部队中自己提拔解决。并向各部门提出提拔干部的条件和要求。这就为教导师解决了第二大难题。

刘总长选调军委第五局张经武局长任该师师长,这是一位对党无限忠诚,作战勇敢与指挥艺术灵活的优秀共产党员。他是个知识分子,在军委作参谋工作多年,具有丰富组织指挥与参谋工作经验。尔后,又选调军委由前方调回后方,同广东军阀陈济棠进行停战谈判的代表,原八军团政委何长工任教导师政委。虽然何长工职务上由正军降成师级,但为了工作需要他没有任何意见,也是当

时干部能上能下的一大特点。何长工是一位智勇双全，战斗经验与工作经验丰富的坚强领导者。教导师有了这两位领导者就能使教导师保证在党的绝对领导下，成为一支坚强的革命武装。尔后刘总长动员总部，派人深入各仓库进行清查库存武器弹药。结果从库存中清查积压多年大批缴获的武器与服装，解决了教导师 7 千余人装备的需要，使各县调来的地方武装部队各种杂牌武器，杂乱服装，换成清一色的六五步枪，每人补齐 50 发子弹，每人发了新式灰色军装，夹被与挂包等，使教导师成为整齐划一，面貌焕然一新的步兵师，有效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

## 二、教导师的组建工作

刘总长命令张经武局长率领几个参谋人员到瑞金县的高围镇进行具体组建工作。经武于 7 月中旬，就进入高围镇，马不停蹄地进行筹备粮草，选择驻地，准备抽调干部等工作。并选刘陈村为教导师部的驻地。我是三军团补充训练三师的师特派员，由国家政治保卫局下令调来教导师任师特派员的。我持国家政治保卫局邓发局长的委任令，于 7 月底到达刘陈村向张师长报到。张师长一见我就喜出望外地高兴地握着我的双手说：“你来的正好，目前教导师组建工作量很大，任务极重，人手奇缺，许多想做的工作无人去办。”又说：“你是来我师任师特派员、做保卫工作的，但目前我们的紧要任务是迅速把部队组建起来，你就负责部队的组建、干部分配、物质保障等。你现在要做为我的副手，一切工作能办的都要办，不能等待别人来办。”

我刚到教导师时,可以说教导师有其名而无其实。师政委何长工没有到职,师长张经武是个“光杆司令”,手下仅有三个参谋人员,所以组建工作重担都落在张师长肩上,他整天忙得不可开交,一天到晚也见不着他的面,我常常在深夜时才能向他汇报工作。

刘总长是我心目中崇拜的了不起的英雄。他传奇式的经历给我极大鼓舞,他的军事著作经常在瑞金的许多文件及刊物如《斗争》,《红色中华》等刊登,我忖思着:有这样的总参谋长,亲自关心和主营组建教导师的工作,教导师一定会组建成党的政治、军事“大学校”。

教导师的兵源解决后,张师长就派人员分头到各县调查了解这些部队的情况。首先张师长决定以瑞金独立团为基础组建为教导师的第一团,并派我前去了解情况与宣布师部决定。当我赶到瑞金独立团时,团长文年生热情地接待我,并向我介绍了这一个团的政治素质作战等情况,文年生是一位经验丰富,对党忠心耿耿,工作极端负责的老同志。他对该团的前途非常关心,他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特派员,我来这团工作时间不长,但部队都是翻身的工农子弟,打起仗来像猛虎,今年春天,我们用土枪、土炮和手榴弹打垮了敌人一个营缴获长短枪 80 多支。”

接着,文团长集合全团,要我宣布中央军委的命令,我宣布武器全数换发六五式步枪,每人配发自己制造的土子弹 100 发。还发给 6 挺机关枪。同志们听到我宣布后说:“只要有了这样的好武器,我们一定能够多杀敌人,多打漂亮仗。”

第一团组建原则确定后，张师长就命令我负责筹组师机关——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处、以及直属队等。同时总部这时已决定孙毅为师参谋长、李熙为政治部主任，虽然这些同志还未到职，但有了头头就好组建各部门工作机构。师参谋长孙毅是江西宁都暴动时的团长，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和很强的指挥能力。他当时正在前方作战还来不了。作战科长陈奇涵是江西兴国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担任南昌军官教育团的教育长，参加过南昌起义、赣南特区的军事部长及红三军和一军团的参谋长。因遭受“左”倾路线的打击，被降职到教导师当了参谋。毕士梯是朝鲜族，曾是东北的流亡学生。这两个同志都是有参谋才能的干部。在他们二人的积极努力下，司令部的架子很快搭起来了，不久通讯科与管理科也都逐步建立起来。从此，司令部机关的工作开始走向正规。

师政治部李熙主任未到职前，8月到职的组织科长刘汗和宣传科长段德彰负责组建政治部。这两位同志都是经过考验，在部队一直从事政治工作，有丰富经验的老干部，他们组建政治部后，很快地开展了工作。

师机关还设有隶属师首长的保卫部门与司、政一样同属独立部门，但保卫机关也只有我一个人，后来才选调了几名干事，使保卫机关建立起来。

我们完成师机关组建工作后，就着手忙于各团的组建工作，并决定将各部队迅速调到瑞金附近集中。第二团政委陈仁麒是江西兴国人，是经过战争考验的老同志，该团于8月底赶到瑞金，第三团约1400人。三团政委李汉民是广西人，二、三团及师直属队组建后，也同一团一样，换

上了新的服装与武器,战士们都兴高采烈精神抖擞地唱起了兴国山歌:

哎呀来——  
教导师来真正棒,  
新式衣服一个样。  
枪支弹药数不清,  
打起仗来逞英雄。

### 三、向刘总长汇报,聆听刘总长指示

8月中旬有一天上午张师长接到刘总长要他去汇报工作的电话,他马上找到我,并向我说:“刘总长要我去汇报工作。最近我跑外的时间多,部队组建中许多具体情况我不大清楚,请你马上准备,晚上同我一同去总部汇报。”

他又说:“你注意啦!汇报材料要准备好。刘总长总爱打破砂锅问到底,可不能有半点虚假或道听途说的问题。”

我同张师长当晚骑马向瑞金沙洲坝总部出发,当我们赶到总部时看到刘总长精神抖擞地正在打篮球,他邀请我们一块玩,我立即上场替换另一位同志参加打篮球。打完篮球,刘总长和我都汗流夹背,他笑着说:“你打篮球的猛劲不错啊。”我望着刘总长笑了笑,刚才拘谨紧张的心情已吹得无影无踪了。

我们走进刘总长的办公室,只见屋里有一张木板单人床,一张四方形的桌,一把椅子,两条长板橙,两个铁皮文件箱子。既是卧室,也是办公室、会客室。他叫我们坐下后,和蔼亲切的询问了我个人的情况。我说我是湖南平江

人。刘总长说：“你参加了平江暴动吗？”我回答说：“那时我年纪小，还未参加军队。只参加了少年先锋队与秋收起义，进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

刘总长问：“你是从哪个部队调来的呢”？

我说：“是从三军团补充训练第三师任师特派员时调来的。”

“啊！就是从兴国那个师，我看到你们‘红五月’接收一万多新兵的一个报告。群众参军的热情可真高啊！”刘总长兴奋地说。

我接着说“今年‘红五月’群众参军非常勇跃，仅十几天，我师就接收了 17000 个新兵”。

刘总长忽然转了话题，用非常严厉的语调问道：“孔荷宠这个家伙是在你们那里逃跑叛变的吗？”

我答：“是的，他是 1933 年 7 月 23 日逃跑投敌的。”

刘总长又问：“你们认识吗？”

我答：“师首长与我都不认识此人，只听到湘鄂赣代表张金楼谈过孔在湘鄂赣担任过师长和湘鄂赣边区总指挥。”

刘总长说：“他也是湘鄂赣的苏维埃的政府的代表，开完全苏代表会后，湘鄂赣省委要求留下他学习，我们也未怀疑他有什么问题。”他又问：“他是怎样逃跑的呢？”

我说：“孔以总部巡视员身分来我师检查工作，驻了五天，突然假借去高兴圩（距师部 30 余里），以看望老战友为名，找司令部刘参谋开了一个通行证，借了一匹马。23 日上午 5 时，他一人骑马去了高兴圩。”

刘总长接着说：“邓发局长同我谈工作时，也谈到孔

的问题。”他还遗憾地说“未将孔的情况告知你们是工作上的一个缺陷，孔的逃跑叛变，主要是他的动摇，贪生怕死，党是没有任何责任的。”

尔后，我向刘总长汇报了部队组建与思想状况，刘总长提出许多疑问，我也都作了回答。当我谈到于都县独立团的一个团长出身成分，男女作风不好，打仗怕死等时，刘总长说：“你这些材料那里来的呢，经过调查核实了吗？”

我说：我听县里同志与该团邱特派员说，此人不可信，还可能投敌叛变。随后，我亲自调查，找他本人谈话，问题属实，他自己也承认了这些错误并决心改正。我不同意作为政治问题看待，也不能肯定他会投敌叛变。

刘总长同意我的看法并且说：“这种人不能来教导师，更不能当团长，但也不能当作敌人对待，还是要教育挽救。”

当汇报到部队情绪饱满，没有发生逃亡现象时，刘总长非常满意地说：“地方部队的的生活与教育都比不上主力部队，只要做好工作，他们是愿意听从党的决定的。”

最后，刘总长向我们谈目前形势与工作问题时说：“国民党十九路军将领发动的福建事变，我们未加重视，也未派遣红军支援福建的反蒋斗争，结果蒋介石用重兵迅速扑灭了抗日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造成了红军粉碎第五次‘围剿’的不利条件。”

敌人第五次“围剿”，我们经过近一年的残酷激烈战斗如北线敌军集中五个师，三万人，向广昌城内我军发起了多次猛烈进攻，每次攻击都有十几架飞机轮番轰炸，几



百门大炮向我守城部队轰击，虽然给敌人极大杀伤。但我方伤亡也很大，最后不得不放弃这个城市。

又如高虎脑战斗，是苏区一次有名防守战斗，红三军团五师十三团，经过几天激烈战斗，坚守的阵地巍然屹立，且击退敌人十几个团的进攻，给了敌人沉重的打击，阵地前沿丢弃的敌人尸首几千具，但我军一千余人的大团，只剩四五百人，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阵地，结果广昌、石城、宁都、兴国等十多个苏区的城市被敌人侵占。但红军战士始终保持着不怕流血牺牲的旺盛战斗意志。

刘总长说：“中央决定组建教导师就是为了应付这种局势，教导师要加快组建，抓紧训练，要在短时期内学会使用手中武器，做到打得准，敢拼刺刀，投弹要投得准，投得远，军队就要像军队的样子。不是游击队，打仗也要讲究战术。教导师担负保卫党中央的光荣任务，组织纪律、军事训练、军人姿态都要求严格，不能松懈。干部必须有不畏流血牺牲的勇气，成员必须纯洁，武器精良，否则就不配为中央教导师。”

尔后，刘总说：“你们警卫工作由国家保卫局邓发局长领导与管理，对部队要进行保卫工作教育。”

最后刘总长提出了三条要求：

第一条：部队完成技术训练外，还要完成单个与班战术动作训练，即便是简单的训练也很需要。

第二条：部队要有严格的纪律与要求，有了严格纪律，才能万众一心，做到军令如山倒，养成部队的良好作风。

第三条：政治上要加强保卫苏区的教育，使每个人懂

得为苏维埃奋斗与牺牲的道理，才能勇于赴汤蹈火，前仆后继地英勇奋斗。

教导师是在中央苏区形势紧张与极端困难环境中仓促组建起来的，但在刘总长严格要求下，进行了短期训练后，就踏上艰难的征途，并在长征的艰难岁月中，同敌人进行英勇顽强的奋斗，以自己的生命保卫党中央的安全，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好后代，它的光荣历史将永载史册。

# 艰难岁月几多事，但留真情在人间

——忆和刘志丹在神府的最后几次会面

王 兆 相

1936年3月初，刘志丹，宋任穷奉中央命令率领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负责打通神府佳榆苏区和陕甘宁苏区联系，为中央红军东征过黄河作准备工作。一路上他们打了几个漂亮的仗，消灭了敌人的部分有生力量。在杨家园子战斗中，他们一举消灭了敌人八十六师两个连，还俘虏了一个副营长。刘志丹带红二十八军打到神府来的消息传得很快，神府佳榆根据地的群众个个喜形于色，奔走相告，像过节一样热闹。当时我正奉神府特委指示，离开红三团带红三支队准备过黄河到山西开辟新区，迎接中央红军的东征工作。听到刘志丹带部队打到神府来的消息后，我急不可待的想见到这位与自己出生入死战斗过的传奇般的老首长。不知他还记得我吗？当天就传来消息，让我立即到红二十八军军部所在地陈家坪去见刘志丹军长和宋任穷政委。

在军部，刘志丹一见到我就一把拉住我的手，高兴地说：“王兆相你好啊，我们又见面了，在商洛山区失散后我们就一直没见到你，后来才知道你已回到神府。”我激动的紧盯着刘志丹说：“我也一直在想你们啊。”刘志丹高兴地问这问那说个不停，而后他把我介绍给宋任穷政委和

唐延杰参谋长，对他们说：“兆相原是我们红二十六军的警卫队长和团党委委员。”宋政委和唐参谋长笑着说：“知道，你们熟悉得很吗，王兆相的大名敌人报上也登过不少了。”我们坐下相互谈了不少分开后的情况，这时，刘志丹突然说：“这次从陕北到神府我们打了几个胜仗，也俘虏了一些敌人，今天让你见一个人，就算我送给你们的见面礼吧。”随后，志丹叫人带进来一个人，原来是俘虏的敌八十六师的一个副营长。志丹指着我问那个副营长“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那个副营长看着我说。

志丹哈哈大笑说“你们打了几年仗，还出几千块大洋要他的人头，现在站在你面前都不认识他是谁，他就是王兆相，你们不是还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什么黑狸虎吗？”那个副营长一听说我就是王兆相，惊奇的直瞪着我。我笑着说“看好啊！我可没有像你们说的那样三头六臂、獠牙利齿，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此时，这个副营长连连道歉，一个劲说对不起。宋政委说“好了，事情都过去了，我们红军对俘虏是宽大的，今后再不要反对共产党、反对红军就行了，要好好做人”。俘虏被带走后，刘、宋首长问了很多神府佳榆苏维埃根据地的斗争情况及几个红军支队、红三团等的成长发展情况，同时对根据地周围敌人的布防也作了全面了解。对红二十八军首长们的各种问题，我都一一作了回答。最后他们对杨和亭说：“王兆相对神府地形、群众、敌情都很熟悉，让他留在我们这儿，给我们当个高级参谋、高级向导吧。”（杨和亭是1936年1月份中央刚派到神府的特委书记）杨和亭问我怎么样，我

说：“没问题，我正想和首长们在一起多呆一段时间呢”。而后刘、宋首长交待说：“兆相主要帮我们提供敌我各方面的情况和解决部队供应问题”。

随即我向杨和亭说“那得派几个助手给我”。他问我“你要谁吧？”我说“搞供给工作离不开王道山、杨孝先（杨文谋的哥哥），把他们调给我”。和亭同意了。

红二十八军到神府时正是 1936 年的 3 月初，天气很冷，还有冰雪，但红二十八军的许多指战员还赤着脚，穿着露脚趾的破鞋，神府群众看到这种情况，村村户户都发动起来，在短短几天时间就给红二十八军做了两千多双鞋袜，还送来了不少白面、大红枣、猪羊肉、鸡蛋等等东西。

不久，红二十八军移驻贺家川，刘、宋首长决定打沙峁镇的敌骑兵部队。我把敌骑兵部队情况向他们作了详细介绍，我边介绍边分析说：“敌骑兵大约有三四百人马，从地形上看，山上敌人修了土围子，山背后和村内也修了些掩体工事。此时窟野河水正在解冻，河上不能行走，部队难以过河。敌人依山傍水，我军大部队施展不开，攻起来十分困难。但敌人是骑兵，这里他们也活动不开，战斗力会明显下降。”刘、宋首长考虑沙峁镇位于苏区内，所以决定必须把这个敌人插在这里的钉子拔掉，恢复、扩大、巩固苏区。红二十八军三个团大约二千人马，有重机枪八挺、迫击炮两门，兵力上优于敌人。刘、宋首长决定二团由贺家川移驻梁家仑，准备占领沙峁西、刘家坡村；一团、军部移住孟家坞村，准备由山上来占领沙峁镇背后山头，三团由王桑塔村顺河向沙峁镇进攻。进攻在拂晓开始，由于

敌人有山上的土围子和工事掩护，大部队一时难以在狭长的河滩和山路上展开来，冲了两次，虽然消灭了一些敌人，但都未能彻底解决战斗。刘、宋、唐研究后认为硬攻是可以攻下来的，但我们的伤亡会更大。他们问我：“如我们暂停不打，估计敌人会有什么行动”？我说：“敌人肯定要跑！一是敌人深入苏区孤立无援，石窑上敌骑兵最近也距此40里，骑兵沿河走不通，走山路也有困难，如来救援也须经一天时间到达，况且一天也很紧张；二是敌人的骑兵在这里发挥不出作用，全是山地，这不是内蒙古大草原，战斗力受影响；三是我们有重机枪、迫击炮，这个架式他们就没见，吓也把他們吓跑了”。

志丹问：“敌人如逃跑，可能会从哪条路走？”我说：“现在河水大，过河不可能，他们只能从北面走石角塔上山到红教寺，从石曹岂爬到红教寺山，再到瓦罗、兰杆堡，除此之外别无它路。如果我们今晚把部队埋伏在红教寺山上，敌人明天肯定从这里逃走，我们居高临下，可全部歼灭它”。刘、宋、唐同意了我意见，把部队移在石绊村，这里是去红教寺的必经之路，吃了晚饭，我请示志丹：“队伍是不是该出发了？”志丹反过来问我：“敌人会不会走？如不走红教寺怎么办？”我说：“敌人一定要走的，他们得不到供应和支援，而且只有走红教寺一条路可以逃脱。”志丹说：“我们刚才研究了一下，部队到神府后连续打了几仗，今天又打了半天，一直没能好好休整，太疲劳了，今晚就不拉上山了，我们静观敌人的变化吧。”

第二天天明后，我和志丹到山头上拿望远镜察看敌人动静，发现敌人正在沙岭山头上做工事。志丹说“你看，

敌人还在修工事，看来是不会走的了”。我们回来吃了早饭，不一会，沙峁镇就有老乡跑出来找我说“敌人开始准备撤退了，很多反革命分子都准备跟着走”。沙峁镇距我们八九里路，听老乡讲后，我们大家都到山头上看。敌人先头部队已由石角塔山半腰向红教寺走去。志丹问我不能赶上，我说不行了，这里距红教寺十来里路，而且要经上洼村，要翻山，还要跳一个很大的石沟，路很不好走。志丹看着远去的敌人说：“可惜，让这股敌人溜了”。

在沙峁镇住着时，老乡们不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不断来找我谈这谈那，热情的很。一天，我正在门口与老乡谈话，听到志丹对宋政委说：“你看，兆相在这一带很有群众基础吗，群众很信任他啊。”我听到后转身对志丹说：“没有根据地的这些热心群众，我们红三团就难以生存发展啊。”第二天，红二十八军就移驻到贺家川，刘、宋让我在沙峁负责整顿秩序，以防大部队走后敌人破坏。随后迅速到贺家川与他们汇合。

我和留下的同志把沙峁镇的老乡们集合起来，召开了会议，建立和恢复了村政权、赤卫队等组织，要他们自己把秩序维持好，严防敌人破坏。村里的群众革命热情很高，青壮年积极报名参加赤卫队，有的还坚决要随三支队一块走。留在村上的人一再表示维持秩序没问题，敌人如有什么动向立即向我们报告，这个镇子原本就是我们神府苏区的根据地之一，村内有许多同志在外参加革命，所以整顿恢复秩序的工作很快就完成了。第二天我就赶到贺家川与红军二十八军汇合在一起。

这次沙峁战斗虽未歼灭敌人，但把驻守在神木城的

敌人可吓坏了。他们听说刘志丹带大部队上来了，装备有机枪和大炮，人数众多，所以把东西都准备好了，一旦刘志丹的部队打到，就随时可以逃跑。趁此大好形势，神木、府谷两地的党组织和红军把不久在敌人“围剿”苏区时失去的地区都恢复扩大了。这次沙峁战斗吓跑敌人的主要原因，是刘志丹领导下的红二十八军北上，造成了极大声势，国民党部队和还乡团、反革命分子对刘志丹的威名早有耳闻，听到他的到来就唯恐跑不及，哪还有什么战斗力。再加上红二十八军北上神府佳榆苏区后贯彻了1935年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沿路打了数仗，经过了许多敌占区，很好的贯彻了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充分发动群众使许多敌占区的老乡们欢天喜地奔走相告说刘志丹来了，不会乱杀人，所以许多村庄群众自动组织起来把地主武装、还乡团赶跑了，府谷地区原被敌人占去的地方也全恢复了。神府特委及时派了各级党组织去领导组织苏维埃政权机构，做好各方面善后工作。在不长的时间里，使原有的苏区得到了恢复扩大，许多青壮年纷纷要求加入红三团、府谷七支队去保卫苏区，整个根据地一派欣欣向荣、生气勃勃的景象。

红二十八军在沙峁战斗结束后，到贺家川进行了休整训练，刘、宋首长每天仍然与我们一块研究分析敌我情况，准备带领红二十八军继续北上府谷，找机会再给“围剿”苏区的敌人一个更沉重的打击。晚上闲时，我们几个点上小油灯，坐在土炕上谈天说地，谈过去，说未来，好像总有说不完的话，想说出来才感到痛快。记得有一次，大家谈到党内某些人的错误给党和红军造成损失时，我突



然问了一句：“军长，听说你被党内一些人抓起来后，也受了不少苦？”志丹说：“是啊，多亏党中央毛主席到了陕北，及时救下我们这批人，把我们放出来，解决了一些问题，个别学生娃什么社会经验也没有，他们加在我们头上的不实之辞，我相信总有一天党中央会搞清楚的，历史将会做出正确的结论！”我听着志丹的话，深有感触地说：“军长，你受苦了，我们这一地区许多同志也曾受过不少打击……”接着我也谈了自己受到的几次不公正的处理。志丹笑着说：“有些问题，时间会做出结论的，现在你看，我们不是都挺好吗，我们现在又见面了，而且还一块儿战斗。”听着志丹轻松愉快的谈话，我深深感觉到，志丹的胸怀是那么开阔，他为整个大局的利益而将个人的得失置之度外。几天来，与志丹、任穷朝夕相处，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不少好的品质。

没几天，部队接到中央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署给红二十八军的电报，命令立即打开黄河东岸山西罗峪口和黑峪口两个重要渡口，接应中央东征部队，把神府佳榆苏区作为红十五军团的巩固后方，准备安置伤病员等工作。接中央指示后，我们考虑，过山西首要是解决船的问题；于是我立即派王道山去黄河岸边他的家乡王家沟了解船的情况，同时军首长与我们一块研究了山西罗峪口的地形和晋军布防情况，并一块到沙峁头后山，下王家坪山头上实地勘察了一下黄河对岸罗峪口的地形。这里正和罗峪口隔河相望，河虽不宽，但水流湍急。罗峪口驻防有阎锡山的一个编制不满的营，沿河构筑了不少工事，整个河面一条船也没有，全被山西晋军给抢走了，晋

军认为红军就是有再大的本事也过不了这个黄河渡口。

回到贺家川，刘、宋首长已下决心打下罗峪口，消灭对岸守敌，但过河唯一的条件就是船，而船必须在三五天内至迟七八天内弄到。此时神府特委书记杨和亭也到了军部，他们都问我怎么办，能否搞到船，我说：“没问题，我已派王道山回王家沟想办法搞船，虽然目前一条船也没有，但只要我们去沙峁头上游二、三十里的王家沟、采林、刘家湾一带动员一下群众就能解决问题，那里村庄多，人口多，全靠黄河，人人都会放船，很多老乡会造船。那一带黄河、村庄都靠山脚，山高，沟多，极好隐蔽，是我们的老根据地，群众基础好，革命热情高，保密安全，利于我们的造船行动。”志丹问我在几天之内能造出三、五条大船吗？我说“行！”刘、宋听了说：“好，兆相，这事就交给你去办了，最多只有七天时间给你。”杨和亭看事情重大，又特别紧急，就说“我和你一块去”。

我和杨和亭当天晚上就动身，一路走一路说话，和亭问我：“兆相，七天之内五条大船有把握吗？”我说：“你放心，你来咱这时间不长（刚到二个月），还不完全熟悉这里的群众，只要红军有事，他们会把自己的命都豁出去的。”走到距采林村二十里的高家山一带时，杨和亭自言自语地说：“红二十八军过山西配合中央红军东征这样重大的任务，我们应该派人配合他们的行动才好，也可以趁此机会开辟一下山西的根据地，并作好接应红军东征部队的工作，这样重要的任务，必须找一个得力的人去才放心。”他一边走，一边反反复复的说了几遍，我知他是对我说的。我就说，“和亭同志，你就痛痛快快把你的想法说出来

吧,我现在跟随刘军长和宋政委,如特委认为我带人去山西合适,我就去,别吞吞吐吐的了。”和亭一听我这么说可高兴坏了,马上就问,“你真的愿意去?”我说,“嘿!看你说的,共产党员,组织上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有什么问题!”他说:“你去,我们就放心了,你把新三支队带上。”(新三支队是刚组建的,只有20多人)。

说话之间,不知不觉已到采林村,找到先期回王家沟的王道山,当夜便召集附近几个村的干部开会,由杨和亭做了动员工作,我布置了任务,各村干部听了都特别高兴,他们说,树有得是,人也有得是,造船没问题。最后大家又共同想出了不少好办法,决定了这次造船任务的具体组织领导者,提出把造船和木工手艺活好的人如何编排,并决定了在哪条沟中造船更加保密,更加安全等问题。大家一致表示,一定按军部和特委指示,保质保量提前完成这次任务。散会后他们回到村内,各自连夜组织骨干、积极分子布置任务,紧张地行动起来。当群众听到刘志丹带红军要打黄河对岸的罗峪口时,个个摩拳擦掌,情绪十分高涨。在特委领导下,几个村的群众都发动起来了,他们日夜三班工作,把7天当成21个工作日。许多群众把自己家的门板都拿来做船板用,经过努力,只用了6天时间就全部完成了红二十八军刘、宋首长交待的任务。刘志丹和特委领导同志专门召开造船工人大会,刘志丹向他们讲了话,还敬了酒,紧接着又向船工作了抢渡黄河的动员。

在造船工作进入正常运转后,我把组织工作交给了王道山等同志,便奉特委指示去作过黄河配合中央红军

东征开辟山西新区的准备工作。

我到二区找到在此待命的三支队，向他们交待了配合红二十八军攻打山西罗峪口，并在山西开辟新根据地的任务，同志们听说跟刘志丹上前线，高兴得都快跳起来了。许多人还没见过刘志丹，都想亲眼看看这个传说中的英雄人物。我带三支队迅速赶到沙峁头镇时，红二十八军于当天早上只用一个多小时就抢渡黄河成功，并把盘踞在山西罗峪口的晋军一个营全部消灭了，还俘虏了敌营长，紧接着三支队和红三团一连连长吴子明奉命过河接受新的任务。我在处理完沙峁头的善后事宜后，把杨孝先留在沙峁头负责后勤供应，便于当天中午过河到达红二十八军军部，进门就看到刘志丹、宋任穷二位首长在那里发脾气，严厉批评一些同志违反政策，把不该没收的商号的财产也给没收了，下令把负责后勤供应、此次行动的负责人王道山关起来，还说要严肃纪律枪毙他。我了解事情的经过后，对志丹和任穷说，“王道山是个好同志，对敌斗争坚决，工作积极肯干，他负责后勤供应，筹款筹粮的工作，到新区政策性不强，这与我们过去政策教育不够有关，他也是为部队供应着急而犯错误的，还是放了他，让他负责把善后工作做好吧。”志丹征求了一下政委的意见，把王道山放了。而后又对我说“好，兆相，这个善后工作你叫人去处理吧，一定要使商号老乡满意才行”。于是我让王道山和红二十八军政治部的几个同志，把没收商号的东西都找了回来还给商号，损坏了的东西全部如数赔了款，并向老乡一再道歉。商号老乡很满意，说“还是红军好”。这次把王道山可给吓坏了，他说，“好家伙，险些把

命给丢了”，我说，“这一次也算对我们每个人的—次教训吧，政策的学习可不能放松”。

第二天红二十八军奉命北上攻打山西黑峪口，此时红十五军团已到山西岚县、兴县一带了。刘、宋命我带队留下，一要尽快把山西罗峪口和神府沙峁头渡口秩序整顿好，维持好，二要保持与神府佳榆苏区的联系，准备接应一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团的东征工作，三要准备转运红军伤病员和后方的物资。

罗峪口是山西省临县、兴县和陕西神府地区商业往来的重要渡口，在军事上有重要地位，人口有两三千，商业买卖很多，是沟通晋、陕地区的一个重要交通要道，因此阎锡山经常派重兵把守，并设了各种机关和关卡。我奉命很认真地整顿了罗峪口的社会治安，建立了以王道山为主席的苏维埃政权和相应的各类机构，为中央红军的东征做好了后勤保障工作。

神府地区自红二十八军打上来后，一派大好形势，当地一些青壮年听说我带红三支队到山西去开辟新区，配合红二十八军东征，都纷纷跑来找我参军。红三支队很快就增加了100多人，编了3个连。红十五军团送来一些替下来的轻机枪、步枪和子弹，迅速把这支部队装备起来了，这比我们原红三团的装备都好。我在俘虏里把打罗峪口时俘来的那个营长找来，向他讲明了政策，要他在俘虏里帮我们挑选两个老实的、懂得机枪性能、会训练部队的人。那个营长满口应承，保证找两个合格人选。他找来了两个人，经过一段时间考验，这两个人确实不错，无论是训练部队，还是教战术技术都可以，后来一个叫尹福善的

还当了副连长，在一次战斗中光荣牺牲了。从红三支队发展起来的这支部队后来被扩充为红四团。

在罗峪口我们给俘虏作了一些教育工作，除留下当教员和自愿参加红军的以外，全部释放。不久，红十五军团给红二十八军运来几万发子弹，要我亲自送给红二十八军，我把守卫罗峪口的任务交给王道山和后来过河的红三团的一个连，带上红三支队押运弹药追赶红二十八军。我们这支 100 多人的部队，步枪齐全，有 8 挺轻机枪，子弹充足，加上几天的强化训练，还很象个样子，一些在神府地区养伤病的原红三团部分干部、战士，听说我要带红三支队走，也偷偷跑到三支队来了，三支队的战斗力和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我们到了桑湾村顶头就碰到红二十八军南来了。正好也赶上阎锡山派飞机来阻挠部队前进，他们一通轰炸、扫射，似乎在庆祝我们会合一样。我把部队分散隐蔽起来后，就直接找到刘志丹、宋任穷、唐延杰等同志，把红十五军团送来子弹的事向他们做了汇报，在交接子弹后，刘志丹笑着突然问我：“兆相，你老实告诉我，你们到底打了多少埋伏？”啊哈，我留下几千发子弹，军长一下子就知道了。于是我笑着说：“军长，我可没打埋伏，我还想向军长再要点子弹呢！”志丹同志笑着对我说：“兆相，我理解你们的困难，我不管你打了多少埋伏，你们守渡口，接应中央红军东征，转运物资伤病员，责任重大，我现在再给你 200 发子弹，加上你打埋伏留下的也不少了。”我马上说：“谢谢军长关心。”接着刘志丹、宋任穷给我简要谈了一下情况，说黑峪口敌人闻风而逃了，红十五军团到了岚县一带，红二十八军奉命南下和中央红军主

力汇合,准备集中主力歼灭阎老西几个师,他们说:“如果这个战斗任务完成的好,对我们今后在山西与阎老西的斗争和巩固陕北根据地大有好处,志丹和任穷又向我交待:“你不跟我们南下,你负责维护罗峪口,黑峪口这两个重要渡口秩序,开展群众工作,组织地方政权,渡口是我们东征红军与苏区联系的通道,保护好它以利主力红军作战。”志丹又说,“目前阎老西调了几个团在保德县一带集结,企图沿河而下,强占这两个渡口,截断主力红军与陕北苏区的联系,你要加强侦察和戒备,千万不能麻痹大意,注意经常和我们取得联系……”。

红二十八军南下后,我便带领红三支队直到黑峪口镇。原驻守在黑峪口的晋军一个连,听说刘志丹的部队打上来了,早就吓得卷起铺盖逃之夭夭了。我与三支队的同志立即开始整顿黑峪口的治安和社会秩序,建立各种相应的政权组织,并派出部队监视保德一带晋军的动向。

刘志丹、宋任穷等同志带领红二十八军从兴县康宁镇、白文镇、临县、离石县与敌战斗数次,最后打到中阳县,包围了三交镇的敌人,在1936年4月14日视察攻击突破口时,刘志丹不幸中弹牺牲,当我听到刘志丹牺牲的消息后,悲痛万分,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三支队的许多指战员知道后,有的眼睛都哭肿了。这些同志虽然与刘志丹相处时间不长,但刘志丹的胆略以及他高尚的品质、共产党员的博大胸怀,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刘志丹的牺牲使我们党和红军失去了一个优秀的高级指挥员,我也失去了一个好领导、好战友。

他临牺牲前的这次与宋任穷一起率领红二十八军到

神府地区开展工作，一方面打通了神府佳榆苏区和陕北、陕甘苏区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也为中央红军东征做好了后方准备工作，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王廷生 整理）



# 延安时期的“赵占魁运动”

杨 长 春

赵占魁是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特等劳动英雄。党中央、毛主席曾号召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工厂企业职工“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赵占魁爱厂如家、艰苦创业的事迹曾名扬国内外。在他的带动下，陕甘宁边区广大职工提高了工人阶级的主人翁觉悟，发展了工业生产，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1938年10月，我于中央党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筹委会，在张浩领导下工作，同时在抗大二大队（职工大队）一队学习并兼任抗大二大队的联络员。赵占魁当时在二大队三队学习，是我们重点了解对象。1939年3月，我同赵占魁一起调到工人学校，他在建设队学习、生产，我在组织科任科长。同年6月，赵占魁又调到边区农具厂工作。我因曾搞过兵工生产，当1942年边区农具厂扩建为温家沟兵工厂时，被派往兵工厂任厂办公室主任和党支部书记。因此，我对赵占魁同志十分熟悉，现将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期的“赵占魁运动”的情况作一些回忆。

## 一、赵占魁在党的培养下成长

赵占魁出生在山西定襄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2

岁时就同两个哥哥一起当雇工，到十六七岁时他学会了打铁，在太原铜元厂当过壮工，近 30 岁时又到兵工厂当翻砂工，后来被工厂裁减，到同浦铁路介休车站当铁匠。抗日战争开始后，日寇占据了同浦铁路，赵占魁流亡到了西安。1938 年初，安吴堡青训班招收有志抗战的职工，他报名来到设在陕西泾阳县云阳镇的安吴堡青训班职工大队学习。同年 5 月，他随职工大队到延安，在抗大二大队学习。

赵占魁起初的目的是找活干，当他和从同浦铁路同来的崔锁贵一起领到了抗大发给他们的军衣军帽时，以为是叫他们去当兵，便非常伤感地说：“人家都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过去打铁打钉的事让咱们摊上了，如今来到延安，没想到还让我们这 40 开外的人当兵！”他们认为自己命苦，甚至想离开抗大另找工做。这件事让当时中共中央职工运动筹委会负责人兼任安吴青训班职工大队长的张浩知道了，便找他俩谈话，耐心地对他们说：旧社会，我们工人是为了谋生打铁，当牛作马。延安是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是工人的家。这里穿军衣的都是工人、农民和学生，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是为了不当亡国奴而努力抗战，这和旧社会为官僚资本家当兵卖命完全不同。他还说，到延安参加革命的是有觉悟的工农，是新社会的主人，旧社会说的那两句话应当改为：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你们现在穿上军衣，在抗大学习文化、政治、军事，毕业后将根据工作需要和你们的特长分配工作，如到兵工厂去修造枪炮，这也是抗战的需要。抗战胜利后，还要建设新中国，工人阶级要成

为工厂和国家的主人。张浩说服了他们安心在抗大学习。这一年的12月，他们两人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初，党中央在延安东郊桥儿沟成立了工人学校，由张浩兼任校长。抗大职工大队的大部分职工调到了工人学校。工人学校组成了以技术工人为主的建设队，其中有纺毛、印刷、肥皂、制鞋等生产组，赵占魁和崔锁贵等组成了烘炉组。他们自己动手修炉子、安风箱，很快就打出了镢头、锄头、铁勺、铁铲等用具，解决了农业生产、教学和生活的需要。

1939年6月，赵占魁和崔锁贵被分配到边区农具厂工作。临行前，张浩又找他俩谈话，语重心长地说：咱们是老熟人了，现在调你们去边区农具厂，你们一定要以厂为家，要把这个家当好。你们已经是共产党员了，是受过教育的工人干部，但不能把这些当成金字招牌，要做实际行动的模范。你们首先要坚持参加生产、管理生产，把工厂的生产和生活搞好，要做到名副其实的为工厂当家做主。这些话给赵占魁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后来经常感慨地说：我在工作上做出些成绩，都是党的培养和张浩教导的结果。

赵占魁在农具厂，先当化铁工，后来担任了翻砂股股长。他不论大事小事、别人的事自己的事，都以极大的热忱努力干好。由于他以厂为家，艰苦创业，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成绩卓著，多次被评为本厂和边区的模范工人和“特级劳模”。1943年他被选为代表工人的参议员，出席了边区参议会，1945年出席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1948年夏天，赵占魁作为西北工会代表团成员出席

了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由于他是抗日战争中著名的劳动模范，影响很大，新华社曾专门发表社论。号召全国工人向他学习。此后，赵占魁多次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他还是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劳动部副部长，西北总工会和陕西省总工会副主席，为我国的工人运动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 二、延安大生产运动中的温家沟兵工厂

1941年到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寇集中主要兵力对我党领导的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国民党顽固派也加紧反共活动，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我党我军面临极大困难。为了坚持抗战，党中央、毛主席号召边区军民自力更生，开展大生产运动，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这时，中央决定将原边区农具厂与原来红军的兵工厂、陕北红军修械所、延安何家岔的枪厂、安塞茶坊的手榴弹厂合并，扩建为延安温家沟兵工厂。兵工厂当时的任务很重，要承担复装子弹，制造手榴弹、掷弹筒，修理枪炮等任务，而工厂的设备又极其简陋。兵工厂由于是几个工厂合并起来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有的是老红军，有的是从敌占区沈阳、巩县、太原兵工厂来的，有的来自各抗日根据地，有的来自大后方，还有的是海外归来的华侨。大家的思想觉悟和生活习惯都不相同，但绝大多数职工能够为了抗战大局，艰苦奋斗，不计报酬，服从分配，为抗战做出自己的贡献。其中赵占魁就是具有工人阶级主人翁态度和先进

思想的典型代表。

当时为了适应战争需要，上级决定把刚合并到兵工厂的原茶坊手榴弹厂迁往黄河边的葭县去，那里接近前线，既可减少运输又便于分散机动。可是当时担任厂工会主任的狄建德却不顾大局，利用修改集体合同的机会提出无理要求，煽动部分职工闹事，致使工厂中一些职工思想混乱，严重影响了支援前方作战的生产任务。这时，赵占魁与那些闹事的人截然不同，他带领工人按时上班坚持生产，给青年工人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并主动团结那些跟狄建德跑的落后分子。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邓发派李颀伯和边区总工会章萍等到兵工厂深入调查研究，处理问题，及时表扬了赵占魁的主人翁思想，批判了狄建德的落后思想，并对其做了组织处理，使广大职工提高了觉悟，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手榴弹厂由梁平带领顺利地迁往葭县，延安温家沟兵工厂也稳定下来，逐步扩大了生产。

为了加快和扩大军工生产，上级领导机关非常重视兵工厂的工作，扩充了职工队伍，加强了材料的供应，加强了行政技术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从中央机关、学校、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到兵工厂工作。任命徐驰、汤钦训为正副厂长，许云峰、王立为工务科长，罗坦为总务科长。工科大学生佟浪、徐继刚、萧淦、余侠平，以及李震、陈传标、杨硕昆等专业人员都成为厂里的技术骨干。此外还从党校、抗大、工人学校的学员中选调了一些干部，从胶东、晋东南来的一批青年充实了工人队伍。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派章智、梁平、骆鹤士和我到兵工厂加强了党务等各部

门的工作。由我兼任支部书记。在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军工局、边区总工会的领导下，兵工厂的领导和党组织收集和总结了赵占魁爱厂如家、艰苦创业的主人翁精神与模范事迹，逐步开展了向赵占魁学习的群众运动。

### 三、赵占魁的模范事迹和赵占魁运动的开展

延安《解放日报》等报刊先后报道了许多赵占魁的模范事迹，这些事迹给人感触最深的是：他以实际行动坚持抗战到底的大方向，勤勤恳恳，埋头苦干，艰苦创业，参加生产和领导生产，大公无私，舍己为人，始终如一。

赵占魁以厂为家，具有新的主人翁劳动态度。他多年如一日，坚持早上班、晚下班，没有假日，有时还连续上两个班甚至三个班。他长期安心干最苦最脏最累的活。他常在上千度高温的化铁炉旁工作，终日汗流浹背，还得穿上湿棉袄代替石棉工作服。日晒火烤把他的脸变成了紫黑色，他从不叫苦叫累。有一次，他左手指受伤，医生要他休息，他仍坚持用一只手干活。有一次，一个工人违反操作规程打翻了铁水，他为了抢救别人被烫成重伤，住进了医院。他把上级和老乡慰问他的食品送给别的病号，自己刚能下床就拄着拐杖上班。他说：“前方战士打鬼子流血牺牲，轻伤不下火线，我这点伤没什么了不起。”

赵占魁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他用心钻研技术，能虚心向大学生、技术人员求教，并经常主动提出改进生产的建议。例如他曾建议用大飞轮带动的鼓风机代替人力拉的大风箱，后来又改为用汽车发动机烧木炭来带动鼓风机，解决了当时生产上的大问题。

赵占魁以身作则，努力培养青年工人。他培养教育人的特点。一是凡是叫别人做的首先自己做到；二是在生产上以及生活上，随时帮助青年，并且诚恳、耐心、从不训斥。有的青年工人怕苦怕累不安心，他就带头苦干，教育青年工人树立为了抗战胜利，为工人求解放的信念。他手把手地教青年学技术，告诫他们节约。一个青年因嫌熔炉太烤用凉水浇身以致感冒，他就为他找医生治疗，并亲自送水送饭，关怀备至。因此青年工人都很尊重他，愿意向他请教，说他是亲如兄长的好师傅。不少后进青年在他教育下变为先进。

赵占魁担任工会生活劳保委员、伙食委员会主任和农业生产指导员，关心改善职工的伙食，经常征求职工对伙食的意见，利用业余时间帮食堂干活、研究改进伙食的办法。他还抽空指导养猪、种菜。他很注意搞好工厂和附近农民的关系，他常用自己节余的钱帮助农业合作社发展生产，逢年过节请乡亲们来工厂看文艺演出，组织工农联欢。他在调解附近农村发生的民事纠纷方面很有些名气，附近大人小孩没有不知道他的。他说：“我是参议员，应当为大家多做点事。”

赵占魁在荣誉面前谦虚谨慎，从不骄傲。他常说：“这都是党的教导和大家努力的结果，自己为工农大众做点事是应当的。”

赵占魁的事迹都不是什么非常惊人的事，但他确实是“寓共产主义精神于平凡的工作中”。他也有弱点，如文化水平低，开会不积极发言，缺乏斗争经验等，但他正视自己的缺点，并制订出个人计划，提出改进措施。

兵工厂的党、政领导和工会总结和宣传了赵占魁的模范事迹。他的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事迹确实值得大家学习，而且人人都可以学习。向赵占魁学习的群众运动首先在他所在的班、股，进而在全厂逐步开展起来。军工局、边区总工会、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也都相继发出号召，在延安和全边区的职工中开展赵占魁运动，并派干部到中央印刷厂、茶坊机器厂、延安被服厂等工厂广泛宣传赵占魁的模范事迹，组织推动开展赵占魁运动。1942年9月11日，边区总工会正式发出《关于开展赵占魁运动的通知》。同年12月，毛主席发出指示：“应改善职工会的工作，发展赵占魁运动于各工厂。”《解放日报》记者穆青、著名音乐家贺绿汀以及鲁迅艺术学院的作家、诗人们纷纷来兵工厂采访，编写了“学老赵、唱老赵，老赵是工人的好代表”等歌曲和文艺节目，在边区广泛宣传赵占魁的事迹，从此，全边区各公营工厂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学习赵占魁运动。

1943年初，邓发在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召开座谈会，请兵工厂的党、政、工会干部以及赵占魁本人参加，分析了赵占魁运动开展的情况，讨论制订了进一步广泛深入地开展这个运动的措施。邓发指出：“开展赵占魁运动就好比开动一部机器，所有的部件、各个环节都要动起来，行政管理部门、技术部门、生活部门、党支部、工会、青年等都要动起来，既要抓生产技术，又要搞好生活，生产才能持续地发展。”会后，兵工厂的各车间、各部门以及党群组织研究了存在的问题，找出薄弱环节，制定了进一步开展赵占魁运动的计划。厂领导先帮赵占魁制订了生产和



群众工作等方面的具体计划,然后带动全厂职工制订出向赵占魁学习的计划,并在全厂公布,以便相互监督。从此,赵占魁运动在兵工厂更深入扎实地开展起来。

1943年4月,赵占魁和兵工厂工会向边区各工厂发出挑战书,各工厂纷纷响应。接着,党中央号召各抗日根据地国营企业的职工都要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各根据地也先后掀起了学习赵占魁运动的热潮。同年7月,邓发到兵工厂蹲点调查研究,检查深入开展学习赵占魁运动以及落实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座谈会精神的情况,帮助赵占魁修订了个人计划,进一步总结了赵占魁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劳动模范的基本标准,并把生产数量和质量提高到新的水平,为使赵占魁运动全面持久地开展,提供了具体办法和措施。这些经验很快传播到全边区以及各抗日根据地,推动了赵占魁运动持续不断地深入发展。

1944年3月,陈云派主管工业的陈郁到温家沟兵工厂了解武器生产质量和赵占魁运动情况。4月,陈云在西北财经办事处召集兵工厂主管生产子弹的行政和技术干部孙云龙、龚家宏和厂长、党支部书记、工会干部及有关领导开座谈会。陈云严肃又风趣地说:前方战士反映你们厂生产的子弹有“神经病”,一出枪口就翻跟头,打不准。请你们来会诊,把“神经病”治好。到会同志认真研究提出了改进弹头壳铜的质量,增加弹头壳的厚度和匀度等具体措施。经过组织技术攻关,反复试验,终于解决了子弹翻跟头的“神经病”问题。兵工厂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为了前方山地作战的需要,还在军工局李强局长的领导下,用土办法试制成功了掷弹筒。兵工厂全体职工在学习赵占

魁运动推动下,日夜奋战,有力地支援了前方部队的需要。

#### 四、赵占魁运动的成果和影响

陕甘宁边区通过开展学习赵占魁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果。首先,推动了兵工厂以及边区各公营工厂工业生产的发展,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年代,不断克服了战时供给的困难,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其次,提高了职工的思想觉悟,爱厂如家、自觉遵守劳动纪律、努力生产、不计报酬的主人翁精神得到发扬,在运动中涌现了一大批赵占魁式的劳动模范,培养出一批技术熟练的工人、技术干部和管理人才。全边区 80 多个工厂,12000 多职工在运动中经受了锻炼,绝大多数人后来在解放战争和解放后成为各方面的技术骨干与党政军领导干部。仅温家沟兵工厂在解放后就有 6 人担任省部级干部,50 多人担任厅局级干部,而担任厂长、书记、工会主席的处级干部就更多了。第三,赵占魁运动树立了人与人之间新的关系,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尊师爱徒,增强了职工队伍的团结。第四是工厂、企业、党政部门与职工会的工作作风有了转变。党、政、工会精兵简政,深入基层,带头劳动,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建立了正常制度和责任范围,提高了工作效率。

赵占魁运动不仅在各根据地内,在全国以至在国际上也有相当影响。1944 年 6 月,由苏、美、英及国统区的记者 20 多人组成的中外记者团来到延安,为了使他们深入了解我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坚持抗战的真实情况,周恩来亲自安排他们到温家沟兵工厂参观。厂领导向他们介

绍了赵占魁的模范事迹和开展赵占魁运动的情形。一个英国记者说：“我们这次亲眼看到工人们都像赵占魁一样艰苦创业，生产军火也用了人民战争的办法。中国人民真是不畏强暴的英雄人民，中国共产党一定能领导抗战取得胜利。我们要如实报道你们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生产武器，宣传你们艰苦奋斗坚持抗战的精神！”外国记者对我们用土办法炼铁、用简陋的工具制造武器弹药感到非常惊讶，说：“真是世上罕见！”有个国民党记者挑衅地问赵占魁：“你为共产党立了功，共产党为什么不把你妻子接来？”老赵回答说：“不是共产党不接我老婆，是日本鬼子的侵略造成我们无数同胞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中国人要不当亡国奴就得一条心打日本！”最后，美国记者期坦茵紧握着赵占魁的手说：“你们是不可战胜的英雄人民，你们一定会胜利，我们在南京再见！”

1945年9月，邓发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工联成立大会，他在大会上的讲话说：“我们各解放区的工人，正在广泛开展一个新的劳动者运动，也就是1942年首先在陕甘宁边区开展起来的改造劳动态度、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赵占魁运动。赵占魁是一位特等劳动英雄，他不仅在生产中积极努力、有创造精神，而且大公无私，舍己为人，埋头苦干，始终如一。因此全边区的工人公认他是自己的旗帜，都向他看齐。”

总之，赵占魁运动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怀下，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和边区总工会等直接领导下开展起来的群众运动。广大职工通过向赵占魁学习，改变了许多工人群众存在的雇佣观点、行会观点和保守落后的思想，发

扬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提高了解放区职工的阶级觉悟,增强了主人翁的责任感,从而推动了生产发展,有力地保证了抗日战争敌后战场的物资供应。

(韦华、永康整理)

# “大跃进”的序幕——南宁会议

李 锐

南宁会议于1958年1月11日开始,到22日结束。我是在17日以后,因讨论三峡问题参加会议的,竟意外地被任命为毛泽东的兼职秘书,从此就卷入了“大跃进”的漩涡之中。

南宁会议可说是当年“大跃进”的序幕。参加这个会议的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外,还有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和各大区并中南各省负责人柯庆施、李井泉、欧阳钦、张德生、刘仁(代林铁)、史向生(代吴芝圃)、陶铸、王任重、杨尚奎、周小舟、刘建勋,中央工业各部有王鹤寿、赵尔陆、黄敬、还有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这26人中,健在的屈指可数了。现在来回顾这段历史,对于当前和今后的经济建设,怎样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无疑还是很有意义的。

## 反冒进问题的前因后果

南宁会议主要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错误”,从而为“大跃进”作了思想先导。

1956年反冒进是怎么回事呢?这主要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速度问题上,而实际是经济建设方针上,由于

毛泽东跟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意见不一致而来。这就需要回顾一下1956年到1957年的一些情况。

由于缺乏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只能照搬苏联的一套，156项骨干工程由苏联援助，整个计划也是基本上依靠人家拍板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得很好。这些做法，虽然当年只能如此，但毛泽东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sup>①</sup>。三大改造已经不同于苏联，尤其在农业改造中，大加批判实际并不存在的“小脚女人”右倾保守之后，农业改造一马当先，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改造急速加快，敲锣打鼓，3年完成了原来15年设想之事。根据“广大农民群众中存在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种某些表面现象的认识，以及当时国际形势的趋于缓和，毛泽东认为应当不按常规走路，以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他首先考虑的是农业，1955年11月，他主持制定了《农业十七条》。随后于1956年1月出台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最主要的一条即到1967年，每亩平均年产量达到黄河以北400斤、黄淮500斤、淮南800斤。按此计算，1967年粮食年产量为1万亿斤，超过过去设想水平的80%，棉花为1亿担，更超过1倍多。同时，又认为应趁此良机加快工业的发展，工业不能跟农业脱节，中国工业化以及科教文卫等事业的规模和速度，都应当扩大和加快。

早在1955年夏，国务院曾根据各部的设想，讨论并编制过15年（1953——1967）远景和二五计划的轮廓：

---

<sup>①</sup> 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谈话。

1967年，粮产量达到6000亿斤，棉花5600万担，钢1800万吨，工农业总产值15年平均年增长9.5%。毛泽东对这个设想是不满意的。他批评领导机关的思想严重落后于实际。在1955年12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毛泽东这样明确说道：“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许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必要了”。

《高潮》一书正式出版，毛泽东上述思想在党的会议上传达，立即在全国上下产生了广泛影响，关于工业建设应力求多快好省作为一个方针，这四个内容不同又相互联系的字，是由周恩来、李富春、毛泽东先后提出并最后形成的。但他们提出时着眼点不同，毛泽东强调多与快，周恩来则强调全面掌握。1956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正式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从而使得各级计划部门和经济部门出现了冒进的偏向，大上基建项目和增加基建投资，职工一年增加200多万人，造成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的紧张。1956年1月中旬，在党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谈到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计划必须是实事求是的，而不是盲目冒进的。随后2月间，在国务院的有关会议上，由周恩来主持，几次压缩指标，压缩年度基建投资，反对盲目冒进。他还这样谈到：“领导者的头脑发热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

实事求是”<sup>①</sup>。经过这样“促退”之后，1956年的基建投资仍比上年增长60%，当年基建多用了20亿元，市场多售粮110亿，财政和信贷多支出30亿元（占财政支出1/10），不得不多发了10多亿元票子，造成国家财政的紧张。

由于周恩来和陈云、李先念等的努力，国务院向6月间召开的人大会议的报告中，写上了急躁冒进是经济建设中最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为配合党中央、国务院开展反冒进，刘少奇指示中宣部起草一篇社论刊《人民日报》，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关于坚持两条路线斗争，有什么倾向反什么倾向，作了深入阐述。由此，反冒进在全国上下引起了广泛的重视。从而为向党的八大提出一个合乎实际情况的二五计划的制订，创造了有利条件。后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这样谈道：“1953年小冒了一下，1956年大冒了一下”。因此，经济建设必须坚持“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方针，成为党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的共识。在压缩指标，反对冒进上，毛泽东在党的会议上，或同有关人的谈话中，都没有提出过不同的意见。但由于已经有了工业速度应当加快乃至可能加快的想法，以及中华民族应当有点雄心壮志的气概，他只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讲话中，讲过这样的话：美国那点东西，1亿吨钢，几百颗氢弹，不大算数，中国要超过它，首先是接近它。关于发展速度，他当时认为中国应当比苏联快一些。

从1955年12月到1956年3月、1956年2月到4

<sup>①</sup>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1页。



月,刘少奇和毛泽东先后听取了国务院所属 34 个部委(主要是经济部门)的汇报,为党的八大和二五计划的制定,作调查研究准备。在汇报中,除了各业务部门本身的具体问题外,涉及到经济建设中许多全局性的问题,当时适逢苏共二十大召开,期大林的盖子揭开。在经济建设上苏联片面发展重工业,轻视轻工业,农业长期停滞,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等等,问题甚多。他们两人在听取汇报时,都有许多重要的精辟的插话,说明他们根据中国的国情,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有许多新的设想,在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的新的发展道路。这样边听边议,最后毛泽东总结为十大关系问题,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之后,随即于 5 月间的最高国务院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这个报告说明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几个重要的原则问题:首先必须正确处理积累同消费、重工业同轻工业、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必须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三者之间利益;优先发展生产资料时,必须同时注意生活资料尤其粮食的生产,提出农业与工业并举的方针等。其次,合理解决经济建设的布局,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同时充分利用沿海老工业基地以支援内地。第三,经济管理体制上,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扩大地方权力,给地方更多独立性。同时给企业必要的自主权。第四,在中国同外国关系上,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必须有分析有批判,不能照抄照搬:“过去我们就是鉴于苏联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要引以为戒”。《论十大关系》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作了正确的思想指导,也是八大文件中经济建设方面的理论依据。

在三大改造已经完成,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国内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以后,同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扩大党内外民主生活,改善有关制度,已成为突出问题。毛泽东在听取各部汇报时,介绍了刘少奇说的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哇哇叫,二怕民主人士发议论)之后说,我们搞两个万岁,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万岁。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还谈到:“一个党,就是一鼻孔出气,呼吸就不舒适,会使思想僵化,社会发展停滞起来”。鉴于文化科学领域内,存在着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左’倾思想,也曾受到苏联在这方面粗暴干预等不良影响,毛泽东在研究十大关系过程中,提出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个著名的“双百”方针,也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郑重作了说明: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有许多学派,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样办。在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李森科,非李森科,有那么多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这一派,那一派,都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随后,5月26日,陆定一向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对这个方针作了全面的系统的说明。双百方针不仅在文艺界和科学界,也在全国文教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人们眼界顿时开阔起来,思想顿时活跃起来。1957年1月间,在党的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

上,针对党内一些同志对此方针的怀疑和某些消极的现象的出现,毛泽东先后两次谈到: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双百方针很不理解。这个方针是合乎辩证法的。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香花也是跟毒草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同时,他也指出:“统一物的两个相互对立相互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有个次。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随后在2月和3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进一步系统地论述了“双百”方针,明确宣布,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以上引述有关双百方针问题的情况,可以说明毛泽东当时的主导思想,是为调动一切社会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全面服务。

总之,新中国刚刚成立7年,在抗美援朝,三大改造、经济建设等方面,取得一系列胜利之后,在国内外有利条件下,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人,都在探索有别于苏联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都认为国家任务已由阶级斗争转而向自然开战,即发展生产力的斗争,同时也要在文化科学技术方面更加开放,同生产力同步发展。

像我们这些当年在经济战线上做具体工作的人，从自己日常业务中，更是理所当然这样认识 and 理解的。

1956年9月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少奇的政治报告，邓小平的修改党章报告，周恩来的二五计划报告，都是经过中央集体反复研究并经毛泽东审定的。这三大报告和有关决议，说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上，我们党作出了一系列的正确决策。

首先，是党的工作重心已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由于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这就是说，新中国已经开始进入了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是整个八大路线的基础和核心。这是对中国国情实事求是分析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也是戒鉴苏联的经验教训的结果。

其次，关于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总结了“一五”期间的成功实践，以及1956年坚持反冒进的经验，认为应当继续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周恩来在报告中特别指出：“应该根据需

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同时，要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要正确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规定好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要注意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等等。薄一波在大会发言中，根据1953年到1956年的跟踪经验，提到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在今后若干年内，在通常的情况之下，我国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的比重，不低于20%，或略高一点；我国国民收入中国家预算收入的比重，不低于30%，或略高一点；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不低于40%，或略高一点。”

第三，为适当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将一部分职权分给地方，以便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关于经济体制作了一些改进的规定，陈云在长篇发言中，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新格局：工商业的经营，除国家和集体为主外，应允许个体经营为补充；市场调节为辅，应允许企业有一定自由，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流通管理方面，以国家市场为主，统一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为补充，允许某些商品价格在一定范围内波动。

第四，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继续巩固人民民主的统一战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正式写入了八大文件。“党对于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问题，不应当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

艺术的发展”。“用行政的方法对于科学和艺术实行强制和专断是错误的”。为健全国家的法制，要逐步制定完备的法律。只要没有违反法律，要保障公民的权利，不受任何机关和任何人的干涉。

第五，关于党的建设，强调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偏向。鉴于国际共运和党的历史教训，强调了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突出个人、为个人歌功颂德，全党要健全集体领导，避免个人专断。

八大开完之后，在编制 1957 年经济计划过程中，在周恩来主持下，国家计委和经委继续贯彻反冒进的方针”。鉴于东欧的教训，大家在讨论中提到毛泽东常说的，“既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话。从而确定 1957 年实行“重点发展，适当收缩”的方针和积极而又稳妥可靠的发展计划。周恩来说：“不适当收缩会影响货币、物资、各方面的平衡。也可能出现中国的波兹南事件。”11 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中，议论了这个方针和计划控制指标。毛泽东在会上还这样说道：经济建设不是一点没有进退地，四平八稳地前进着，有时多一点，有时少一点，有时快一点，有时慢一点，有时上马，有时下马，这种情况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承认了这一点，那么今年冒进点就不是不得了，明年少搞些也没有什么。1957 年 1 月下旬的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陈云提出“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观点；以及经济建设必须保持财政收支、银行信贷和物资供应三大平衡的著名论点；并强调基本建设规模必须瞻前顾后，避免陡升陡降，造成损失。这些方针和论点，当时为我们经

济战线的工作人员所深刻体会。由于及时批判了冒进的思想作风,坚持了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经济建设方针,1957年的计划完成得很好,是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工业总产值仍比上年增长4.5%,钢和煤的增长都在10%以上,基建投资比上年减少20%多。1956年国家财政、物资等紧张的局面,缓和下来了。

针对苏共二十大出现的问题,波匈事件的教训,以及国内几处城乡学生请愿、农民闹退社的情况,毛泽东在这段时间内,主要考虑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内部矛盾这个大矛盾。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即根据党中央会议讨论的结果写成的,第一次从国际共运范围内提出两类矛盾问题。在1月下旬的省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关于这个问题的更进一步展开论述,是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所讲12个问题中,有一半是与这个问题直接有关的,如两类性质的矛盾,肃反问题,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如何处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等问题,人民闹事出乱子是坏事还是好事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也是与此有关的,这个讲话随后向广大干部传达了,有着广泛的影响。随后三四月间毛泽东经天津南下,一路在济南、南京、上海的党员干部会上虽然都谈到这个问题,但每次反复强调的还是以下观点:全党面临的新任务,就是建设,全党要学会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作斗争;现在阶级斗争,这件工作已基本结束,这是八大作

了结论的；我们在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随着敌我矛盾在国内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开始比过去显露了。这时刘少奇也沿西线南下，也在一些省市讲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说人民闹事，罢工游行请愿，多由于领导机关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并且谈到如出现下述四种情况，中国也可能发生匈牙利事件：1、党犯了长期路线上错误；2、处理方法错了，如用镇压等；3、反革命利用；4、党内有人领导。4月27日，刘少奇在上海党员干部大会上说，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主要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了，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这种非对抗性矛盾，可以用小民主办法，和风细雨来解决；我们没有必要去强调斗争，故意地、人为地使斗争激化，使斗争紧张起来，好像我们就有那么一种嗜好，不斗一下就不过瘾。可见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人的观点，这时是比较一致的，都反映了八大的正确路线。

还在八大的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就谈过要继承党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期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现在我们的工作中还经常有许多这样的事情。”反对宗派主义，是要讲团结的。“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sup>①</sup>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

<sup>①</sup> 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6年8月30日）。



泽东宣布：“我们准备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sup>①</sup>。随后在3月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谈到这个问题，强调指出：要通过整风，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任务<sup>②</sup>。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党内党外积极批评共产党在这三方面存在的缺点和错误。方针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是延安整风的宝贵经验。文件强调，用和风细雨实事求是的方法，开展批评。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要求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方面的矛盾，对高等教育、普通教育、文艺、科学、卫生等方面，“切实改一下”，不然官僚主义等永远不得解决。并且提到党外人士有职无权，学校党委制，以及好大喜功等问题。这样，一年多来，党的一系列决策和号召，毛泽东的多次重要讲话，确实如和风细雨，浸润着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心田。

关于帮助共产党整风，整风运动怎样从小民主的小

---

<sup>①</sup>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

<sup>②</sup>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27日）。

鸣大放转到大民主的大鸣大放？和风细雨怎样变成疾风暴雨？早春的天空为何黑云乱翻，乃至“黑云压城城欲摧”？“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忽然变成“惊涛骇浪”？“大多数是正确的善意的意见”<sup>①</sup>，怎样被视为“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为何从欢迎批评转到“引蛇出洞”？总之，为何整风运动突然变成反右派运动，最后导致反右派严重扩大化及其严重后果？等等，这些问题都不在此探究评述，这里要谈及的，只是同南宁会议反冒进一事有关的思想来源，看来，从1956年到1957年发动整风运动时，因受苏联、东欧形势的影响（认为中国也有发生匈牙利事件的土壤），毛泽东对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即所谓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阶级斗争形势，不论在量的方面和质的方面，都估计得过于严重，从而把许许多多善意批评、肺腑之言甚至稍不顺耳的正确建议，统统视为右派进攻，把刚刚讲过的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了。而且开了以言定罪的先例，以思想意识作为划分阶级成分的界标。同时还以政策代法律，以群众斗争代司法程序，使八大规定的法制建设渺无希望，人治代法治更加合理升级。

由于“右派言论”中有“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这一类的语言，有许多批评冒进的意见，于是毛泽东从此将“反冒进”同“右派进攻”联系起来；将冒进与保守同左与右、同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总之，将政治意识与政治斗争引入经济思想与经济领域，从而经济生活必须以政治挂帅，无处不存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了。于是，

---

<sup>①</sup> 李维汉：《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工商界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1957年6月3日）。

八大的正确路线，从政治思想、经济政策，到党的建设，民主法制等等方面，逐渐为另一种“左”的思想、政策和路线所替代了。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著名的报告，本来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从理论上阐述和发展了八大的正确路线，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在理论上的一个贡献。报告中再次阐述了“双百”方针。希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造成一种更加民主自由、生动活泼的局面。在讲话时，本来想强调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今后应该向科学技术进军，开展技术革命。可是，1957年6月19日，此文作为正要开始的反右派斗争的指导文件发表时，毛泽东加了这样一段很长的话，从而改变了八大对我国社会情况和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这种同八大相背离的思想理论，成为以后阶级斗争的实践和理论步步升级的嚆矢。同时，在文章中增加的区别香花与毒草的6条

标准,显然是为了适应反右派斗争的需要。这样就导致以政治标准作为统率一切争论,包括思想、理论、科学、文化、艺术等方面不同观点的是非标准,不仅难以真正辨别是非,而且以政治手段、阶级斗争方式解决思想领域中的种种问题,开了方便之门。接踵而来的反右派斗争,即是将许多从善出发向党提建议的人,当作敌人,打成政治上的右派。至于“文化大革命”中泛滥起来的“思想战线的大革命”,就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从历史经验来看,判断是非的标准应当以宪法和法律(共产党员加上党章)为准绳,不能离开这个准绳,而随意“以言定罪”。这个历史的教训太沉重了。

1957年10月,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郑重表示,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是不对的,还是七届二中全会的提法正确:“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sup>①</sup>。同时,从1957年工业发展速度(10%)远不如1956年(31%),农业因水旱灾害较大而没有达到计划指标(仍比上年增加50亿斤),这种很不恰当的背离实际的估计。对反冒进提出了错误的批评:1956年经济文化有了一个很大的跃进,可是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说冒进了,刮起了一股反冒进风。因此,“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哪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

<sup>①</sup> 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

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还扫掉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认为党的委员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我看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sup>①</sup>。毛泽东认为反冒进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而且给右派的猖狂进攻以影响，因右派是促退派，共产党永远是促进派，因而影响了1957年经济特别是农业的发展。他认为发动全体农民讨论农业发展纲要是非常必要的。“要鼓起一股劲来，去年下半年至今年上半年松了劲，加上城乡右派一闹，劲就更不大了。现在整风反右又把把这个劲鼓起来了”<sup>②</sup>。他还预料，反右斗争的胜利，“将使我国社会面貌一新。将使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将掀起一个规模宏大的高潮”。他还谈到中国的建设道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的速度更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sup>③</sup>。由此可见，这种对反冒进的批评，不是工作成绩上多了点少了点的问题，而是对有关经济发展方针的批评，对社会主义建设快慢的批评。1955年以来毛泽东一直在追求一种较高速度的新的发展经济的办法，来代替积极稳妥、讲究综合平衡的苏式道路（或者认为这是一种四平八稳、缺乏革命精神的旧历书）”

经过几年的反复变化，毛泽东终于放弃了一度同中

① 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

② 毛泽东：《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1957年10月13日）。

③ 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

央其他领导同志达到的正确共识，而不同意八大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回到自己这样一种对中国当时社会政治情况的错误看法，据此来探索一条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于是，从反冒进入手，首先力求以多快为主加快经济建设的速度，并以自己的崇高威望和无畏精神，动员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而促成“大跃进”的到来。

### 柯庆施的“乘风破浪”

1957年11月，庆祝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时，64个国家共产党的负责人云集莫斯科开会，毛泽东亲率中国代表团前往参加。这时，赫鲁晓夫提出“15年赶超美国”的目标。“或是灭亡，或是在经济上也超过先进国家”，这是从列宁到斯大林的战略思想，斯大林在1939年讲过“10~15年超过”的话。这种想法也影响了毛泽东。1955年他谈过用10个到15个五年计划赶上并超过美国的设想；《1957年夏季的形势》中提到：“准备以8个至15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赫鲁晓夫提出了这个口号之后，毛泽东在莫斯科各国党的代表会上说：“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他是以钢为标准说的：“我们今年有了52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1000万吨到150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3500万吨至4000万吨钢。”“以钢为纲”的思想，可能于此萌芽。

关于毛泽东批评反冒进和改变八大路线方针的思想观点，以及“15年赶超英国”的雄心壮志，当时在言行上跟得最紧，因而很受毛泽东赞赏的人之一是上海党的领导人柯庆施。柯是后来大跃进“万马奔腾”时，“一马当先”，

睨傲一切的人物。1957年11月13日，柯庆施到杭州参加浙江四级干部会议，做了一个长篇报告（1.8万字），主要谈“关于矛盾的问题”（约占一半篇幅），开宗明义就说道：“主席在三中全会指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个矛盾，概括起来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是我们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为了解释这个判断同八大决议没有矛盾，柯是这样说的：“有人说：‘你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的，这与八大决议是不是矛盾了？八大决议没有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这是由于大家没有好好看。八大决议讲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现在又讲阶级斗争，而且讲阶级矛盾是主要的，是不是有矛盾呢？不矛盾的，因为阶级斗争解决的问题是所有制问题，所有制的问题解决了，阶级斗争应该说基本结束了。基本结束了是不是说没有阶级斗争了呢？那谁说过呵！不但没有说过，八大决议还说：‘毫无疑问，我国人民还必须为解放台湾而斗争，还必须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而斗争，还必须为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不坚决进行这些斗争，是决不许可的’。解放台湾是什么矛盾哪？最后消灭剥削制度是什么矛盾哪？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是什么矛盾哪？这不是阶级矛盾吗？八大决议接着又说：‘但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主要是从阶级

斗争结束之后，我们要很好的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生产这个角度来说”。柯庆施这种说法的强辞夺理是显而易见的。下面他仍不能不引用八大决议这一段话：“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柯庆施由此讲到共产党的“斗争策略”：“这里不是说得很清楚吗？第一，基本结束是讲所有制问题解决了；第二，基本结束不等于完全结束了。所以这次的提法与过去基本上没有不同。但有一点，过去是分散提的，这次是集中提的，过去为什么分散的提呢？八大的时候，人家敲锣打鼓、兴高采烈地接受改造，把财产交给国家，你那个时候还说“‘阶级矛盾是主要的’，那个话就不得人心。那么现在呢，我们说：‘你心里还不服气，我们还要来一个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原来他以为‘我把财产都交了，我已改造完了’。他尾巴翘得很厉害，在这个时候，你让他翘一翘，翘得很厉害，然后你可以说：‘你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呢？所有制问题解决了，但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解决’。所以现在集中提一提很需要，这就叫做斗争的策略。在什么时候我们应该着重什么提法，这是要有策略的。”这就是说，共产党讲的话，代表大会作的决议，都是可以随机而变的。说白一点：刀把子总抓在我共产党手上，“尔为鱼肉，我为刀俎”，你什么时候“不老实”，“不服气”，“资产阶级”、“右派”帽子就请戴上；“阶级斗争”这把刀子随时可用，一用就灵，不怕你不服气。



柯庆施的这种解释,即阶级划分的“理论”,不仅是所有制问题,还有更关紧要的“思想战线”问题,要从思想上划阶级。这个报告在起始时,这样谈到人民内部矛盾有两种不同范畴的问题:“一种是属于改造性质的——资产阶级改造、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改造。所谓上层小资产阶级,在农村就是富裕农民。一般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的改造问题不大,但富裕中农的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资产阶级的改造那就需要很长时间了。”他们中间“还包含一个问题,对社会主义道路动摇问题。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上说:他们不服气。不服气怎么办呢?这里就分两种人:一种不服气厉害的人,就成为右派分子,要跟我们较量一番;一般的人不服气,但他也就算了,你今天做一点工作,同他说一说,对他的安排注意一下,他就服气了。明天呢?明天还不服气,这样在那儿动摇。所以政治战线上还要来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因为两条道路问题还没有解决,所谓没有解决,包含两种意思:少数的人坚决抵抗社会主义道路;大多数是动摇。……动摇的就不要打倒他,要慢慢地教育他、改造他。所以大多数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在政治、思想上的两条道路问题就没有解决,他们处在中间状态。为什么会把他们放在人民内部呢?因为他不是右派,不是反革命分子,没有拿刀拿枪来打我们。人民内部叫做什么问题呢?叫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里上层建筑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意识形态。经济基础是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意识中还有个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的残余或者影响。对于代表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请看柯庆施是怎样

说的：“尤其麻烦的是两种人：一种是上层小资产阶级，一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只要工人说几句话，他就缩回去了；他要是说鬼话，要是有什么违法行为，只要随便向他算一算帐，他就受不了。……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第一，他说他有学问，他认识几个字，他尾巴翘得很高；第二，他说他没有剥削人家；第三，学生中他有影响，他还有点群众基础。这个事情是比较难办的。你不能随便把他捉起来，杀掉，所以我们要对他做很多的工作，还是要团结——批评——团结。”然后，他讲到“人民内部矛盾怎样解决呢？毛主席提出的叫做不许压服，只许说服。什么是说服？说服的办法是什么？这就是大鸣大放、大争大辩，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摆事实讲道理。”他还谈到自己的经验：“记得在杭州开会的时候，主席曾经问怕不怕，我说我也怕也不怕。从大的道理上讲，我不怕，因为军队在我们手里，枪杆子在我们手里；可是这么一放以后，究竟放出什么玩意来，闹出多少问题，放出什么结果，放出后怎么办，这么一些具体问题我们摸不到底。……现在呢？我摸到了底，有了经验，我就不怕了。”“这次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毛主席告诉我们：你们负责同志一句话不说，坐在那里硬着头皮去听。”柯庆施介绍了自己的经验：“有的时候实在听不下去了，我就借抽烟的名义，走到后面去喘一口气。为什么要这样？因为让他充分去说，不仅说而且把他在报纸上登出来，这就使得右派分子的面目完全暴露了以后，你就反他的右派。思想问题，让他充分说清楚，知道他问题在什么地方，最后我们摆事实讲道理。”

一个多月后，1957年12月25日，柯庆施在中共上海

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又一个长篇报告(3万字),题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其中的第一部分和第四部分在1958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全部转载,并在文首刊有以下的编者按:“柯庆施同志的这个报告,虽然大部分是关于上海的情况和问题……特别是报告的第一部分和第四部分,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柯庆施同志在报告的第一部分中,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对于国内的主要矛盾,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及其正确的处理,都作了详细的分析和阐明。这一部分中还谈到了对1956年工作评价,批判了那种认为1956年各项工作都‘冒进’了的错误的说法,说明了多、快、好、省勤俭建国方针的正确性。这是值得大家重视的。报告的第四部分分析了党内干部的思想状况,提出了发扬革命朝气,打掉官气,实行劳动锻炼,深入基层、联系群众的制度,以及培养又红又专的红色专家等重要措施。”

关于国内主要矛盾,这个长篇报告在行文方面比浙江的报告显得礼貌些,柯庆施在报告中是这样说的:“1956年初达到高潮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手工业三大改造运动,标志着我国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这方面的矛盾基本解决了。但是,社会主义革命是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最彻底、最深刻、最广泛的革命;所有制的基本改变,不但还没有完成解决经济战线上的问题(所有制还没有完全改变,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的发展还很不充分),尤其还没有完全解决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

命问题。在我们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的总纲里,就着重地指出:党仍然面对着‘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并且杜绝产生剥削制度的根源’的严重任务。因此,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整个过渡时期,仍然是国内的主要矛盾。不过在所有制基本改变以前,这种矛盾突出地表现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即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限制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在所有制基本改变之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就突出地表现在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即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不相适应,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还不承认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甚至还企图夺取这种领导权,从而破坏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

柯庆施在报告中谈到上海的一五计划完成得很好,工业产值超过计划 16.3%;右派进攻遭到严重失败,上海是一片大好形势。可是,“有一部分同志曾经认为我们上海的各项工作都‘冒进’了。对上海工业方针的争论就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点”。“上海各方面的工作发展得这样快,是不是‘冒进’了?”他认为不是“冒进”,而是“正常”。他引用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那段谈“右倾保守思想作怪”的话,“毛泽东同志这段话,值得我们反复地阅读和思索”。认为“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我们有些同志的思

想难道不是这样的吗？”然后关于一定要贯彻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讲了下面这样一大段鼓劲的话：

“我们认为，既然是干社会主义革命、干社会主义建设，干这种前无古人的事业，干这种同帝国主义争时间、比速度的事业，那就必须有一股革命的干劲，那就必须对上海的各种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因素采取积极的态度，并且争取把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根据国家的统筹安排，千方百计地出主意，想办法，充分地利用上海基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因此，在我们看来，凡是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就努力做到，这才是正常现象；不去努力做到，这才是不正常现象。否则，就谈不到革命态度、革命气概和革命速度，就谈不到尽可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因此，我们应该坚决贯彻执行多、快、好、省的勤俭建国方针。这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方针。为了多、快、好，就需要勤，就需要努力，就需要认真；为了省，就需要俭，也需要努力，需要认真。这个方法，是既反对了右倾保守，又反对了急躁冒进。这是一个促进的而不是“促退”的方针，是在现在的国际环境中，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应该采取的唯一正确方法，而且是一个已经在实践中证明行之有效的正确方针。在执行这个方针的过程，也可能发生个别缺点和错误，但是决不能因此对整个方针发生动摇。曾经有些人同党的看法相反，他们把这种革命态度、革命气概和革命速度，看作冒进，看作是‘好大喜功’。他们总是说这也办多了，那也办快了，这也冒进了，那也冒进了，他们就是不看一看到底是社会主义前进了，还是资本主义前进了；到底是社会主义多了、快了，还是资本主义多

了、快了；到底是‘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还是相反。试问，经过一番努力能够使社会主义前进得快一些多一些，这难道是错误吗？难道我们能够说，经过一番努力就能够做到的也不去做，以便社会主义事业前进得慢一些、少一些，才是正确的，才是正常的吗？难道我们坚决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就叫做‘好大喜功’，就要受到责备，而执行相反的方针才应当受到赞扬吗？当然，赞扬的人是有的，但决不会来自渴望早日建成社会主义的广大人民。因此，我们必须批判这种实际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这种思想已经给我们造成了一些损失。去年下半年以后，多、快、好、省方针不大提了，贯彻“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规划也执行得不带劲了，不少人的革命干劲低落了。这才叫做不正常现象。在整风运动中，必须批判这种右倾保守观点，改正各种不正常现象，以便迎接新的建设高潮，促进建设事业的新高潮。”

在报告的第五部分中，柯庆施也比较抢先发表了15年赶上英国的问题：“在15年后，苏联的工业在最重要的产品和产量方面可能赶上和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期间，在钢铁和其它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那样，社会主义世界就将把帝国主义国家远远地抛在后面。”为达到这个目标，他讲到上海的12项任务。第一项是“大力发展工业生产”；其中说道：“一般轻工业，纺织工业、机电工业、化学工业部门要根据具体情况，争取若干质量较低的主要产品，在第二、第三两个五年计划期间，逐步地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或美国同类产品的质量水平。第二项是“争取《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计划

案)的提前实现”。“其中粮棉产量在正常年景下,还应当大大超过《纲要》中所规定的指标,争取在5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达到1500斤到2000斤,皮棉每亩平均年产量达到150斤到200斤”。此外,其他各项任务中,还有这样一些指标:争取在5年内,“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左派和中左分子能占60%以上”,“基本上普及小学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在10年内,大学生中工农成分要达到70%以上,劳动好的青年应优先录取”;“争取3年内,使上海市区和郊区基本上无蚊、无蝇、无鼠、无雀、无臭虫、无蟑螂、无钉螺,5年内彻底做到,并坚持到子孙万代。市区有条件的地方,1958年就应彻底做到”。报告的末尾,写得如此生动,如此富有文采:“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乘风破浪’。我想很可以用这句话来描写我们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我们的前面有浪,这就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所必然遇到的各种困难。但是我们的后面有风,这就是广大的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的日益高涨的革命积极性。这是一股具有无限潜力的风。这是一股不可抗拒的风,只要我们坚决依靠群众的这种革命积极性,我们就一定能够克服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困难。让我们用乘风破浪的革命气概勇敢前进!我们一定能够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定能够加速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一切任务,一定能够在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的事业中作出更大的贡献。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柯庆施的这个报告,当时有其内外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就党内而言,及时地直接地支持了毛泽东批判反冒进准备大跃进的思想,为南宁会议作了先导,可能毛泽东

常自感“曲高和寡”，尤其在北京找不到“知音”，现在在外地、在下面、在“诸侯”们中找到了“知音”，尤其上海是工业的“半边天”。他需要“知音”们的支持，否则孤掌难鸣。因此，在南宁会议上大大夸奖了这些“知音”们，说北京不出真理，真理出在上海出在地方上。就党外而言，柯庆施这种文章为制造全国舆论鸣锣开道，《人民日报》予以转载。而且，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即以《乘风破浪》为题，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极为毛泽东欣赏，在南宁会议上予以表扬，社论说苏联两颗人造卫星上天和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在几十天中间，把整个世界形势改变了”。现在是“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的力量胜过帝国主义的力量，和平的力量胜过战争的力量”。社论宣布：“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大丰收”。“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扫除消极、怀疑、保守的暮气。1955年底至1956年初的干劲，曾经造成1956年的我国经济事业中的大跃进。目前，这种干劲又在活跃起来，显出威力来了。”社论也引用了古语：“乘长风破万里浪”，最后说：“让我们乘风前进！让我们乘压倒西风的东风前进，乘压倒右派、压倒官僚主义、压倒保守思想的共产主义风前进！”

南宁会议上，毛泽东特别表扬柯庆施这篇“乘风破浪”的文章时，对周恩来说：“总理，你看过没有？你能写出来吗？”周恩来只好说：“看过了，我写不出来”；接着还说了上海是我国工人运动策源地这样的话。

由于1956年反了冒进，陈云在南宁会议上也挨了批评，他是财经方面主要负责人，自不免首当其冲，到南宁



时我就听说，柯庆施早就在主席面前攻击过陈云：对下面卡得过死。有一个具体事例，即上海要建一个大煤气工程，没有被批准。1958年我同陈云接触时，陈向我说过这样的话：柯庆施是一个手中随时拿着大棒的人。

从1958年南宁会议到1959年庐山会议这一段期间，根据我的亲身经历，感到柯庆施是大跃进中的关键人物之一。现在将他这两个报告的要害部分摘录下来，对“大跃进”这段历史的研究自是一种重要史料。

## 狠 批 反 冒 进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的南宁会议，有两大内容：一是毛泽东对过去经济工作的批评，主要是进一步批判反冒进；二是关于工作作风与方法问题，产生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会上听取了薄一波关于1958年经济计划和预算问题的汇报，一些省市也汇报了与此有关的情况。毛泽东于1月11日、12日、13日、16日先后4次讲话，并于15日、16日、17日、19日、20日听取汇报时，插了许多话。

毛泽东在三中全会上批评反冒进。形成要加快建设速度首先在农业上突破的想法，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定的，认为1956年公布了《纲要》以后，已经“造成了全国农业生产的高潮”。全国已经有29个县市达到400斤、500斤、800斤的指标；广东和福建有7个千斤县；湖北红安县土地瘠薄，今年平均亩产已达834斤（这些指标是否浮夸，史家应予鉴定）。接着

就批评 1956 年反冒进的错误：“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符合于客观规律的。1956 年的成绩充分反映了这种跃进式发展的正确性。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因为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了解合作化以后农民伟大的创造性，所以他们认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社论最后号召：“让我们展开全民大讨论，动员全国的力量，万众一心地行动起来，掀起一个规模巨大的农业生产建设的高潮吧！”这是通过报纸对反冒进的第一次公开批判，“大跃进”一词也是首先在报纸上出现。毛泽东对此非常欣赏，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发明，这个口号剥夺了反冒进的口号，在社论的批语中写道：“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12 月 12 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这篇社论也经过毛泽东的修改审定。文中再次批评了反冒进，称 1956 年的国民经济为“跃进的发展”，这个方针完全正确，可是，“还有少数有保守思想的人实际上在反对这个方针”。“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来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引起了消极的“促退作用”。社论要求“1958 年的各项计划指标订得尽可能先进些”。这篇社论的精神，可以认为代表了毛泽东最初的“大跃进”思想，即至少应当有冒进的 1956 年那样的增长速度。

这是舆论方面的响应。地方上的响应呢？毛泽东在三

中全会上的两个重大意见：关于八大国内主要矛盾提法的改变，批评反冒进以加快建设速度。首先在上海和浙江得到最积极的响应，两地都在党的四级干部会或党的代表大会上予以热烈讨论，负责人的报告都形成了文件并予发表。其中柯庆施的报告最被看重。因此，趁热打铁，1958年1月3日至8日，毛泽东亲自到杭州召开了华东六省市党的负责人会议，并有两次较长的讲话。会议所涉及的问题以及讨论中形成的十几条工作方法，可视为南宁会议的开端，毛泽东的两次讲话都谈到右派和右派分子处理问题，以及两类矛盾问题；认为如果没有1956年的跃进，工业产值比上年增长31%<sup>①</sup>，就不能完成五年计划。会议中提出讨论的问题，主要是农业纲要中的12项规划（水、肥、土壤、品种、密植、病虫害、农业机械、副业、畜牧、绿化、除四害、地方病）；以及经济和文教12项规划（工业、手工业、农业、副业、林业、渔业、牧业、交通、商业、文教、科学、卫生）。确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都要搞十年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今后一年要开一二次大中型会，小型会下去开。省委负责人要常下去跑跑，走马观花，下马看花，一年用4个月下去。毛泽东谈到的其他问题还有：政治与业务要结合，即红与专的问题；要反对空头政治家，也要反对迷失方向的经济家，科学家；称赞湖北省委领导干部搞试验田，麻城、红安两县经验要推广，要普遍搞试验田；工业部门也可搞试制品，这是领导方法问题。提出不断革命问题，农业改造两三年完成，不能断气，

---

<sup>①</sup>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39页说实际增长为28.1%。

要趁热打铁，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然后再破坏，得花力气，因资产阶级思想扎了根（东欧的教训就是断了气）；思想战线、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整风运动的办法，应长期进行；今后重点放在技术革命，政治家与科学家结合起来。他从事物的相对稳定性谈到订计划、做决议，是相对地平衡，而不平衡、闹矛盾是绝对的；企业与企业间、个人与个人间，是不平衡的。不平衡不仅是社会法则，也是宇宙法则；刚刚平衡，立即突破；刚刚平衡，又不平衡。早在1955年12月，刘少奇在一次有在京中央委员参加的党政军各部负责人的座谈会上，传达毛泽东关于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争取提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指示时，其中就有这样一段话：“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平衡不断被冲破是好事。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的单位就有问题。”这个不平衡的哲学思想，是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经常谈到的观点，后来成为计划工作的理论根据，导致做计划的随意翻番乃至无法做计划，这是后话了。这里谈到的一些问题，后来在南宁会议上又继续谈开或有新的发挥。概括起来，最后形成的《工作方法六十条》，其中有十多条是杭州会议议论过的。

在这次会议上，柯庆施特别提到要有干劲等问题，受到称赞。杭州会议还提出全国按原来大区（中央局），搞成几个经济协作区，有的省可交叉，认庙不认神。八大二次会议后，1958年6月初，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7个协作区。

南宁会议是紧接着杭州会议开的，可以说是杭州会议的继续。由于部分党中央和国务院负责人、各大区（协

作区)负责人和中南各省第一书记参加了,会议时间较长,讨论的重大问题也多,最后形成了《工作方法六十条》,所以史家称南宁会议为发动“大跃进”最初的一次会议。1月11日、12日,毛泽东接连讲了两次;14日,集中讲了二十四条工作方法。之后,在各省和中央财经负责人作关于1958年计划汇报时,毛泽东又有许多插话,这些分散的意见或者即兴之言,还有讨论时的部分众人之言,几条几条凑起来,有分有合,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多年来的经验,也总结了国际共运的经验,最后形成了《六十条》。这个集当年“工作方法”之大成的重要文件,其中有许多光辉的思想,值得永远学习的工作方法,也有不少是推动了“大跃进”狂潮的错误的东西。可以作这样的看法,产生这个《六十条》的原动力,是1956年和1957年这两年发生的国内外重大事件:反冒进,右派鸣放,整风、反右,农业尤其水利“高潮”中出现的最初高指标,以及斯大林问题和波匈事件。毛泽东以“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以“呼风唤雨”的英雄气概,从尽快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愿望出发,想用最短时间超英赶美,使中国迅速强大富裕起来,从而发动了全国轰动也震惊世界的“大跃进”运动。《工作方法六十条》的草稿,1月31日就印出来了。

三中全会批评反冒进,是从经济方针来谈;南宁会议时,前前后后,反反复复,多次谈及此事,主要将反冒进同政治联系起来,同右派进攻联系起来,是大政治问题;认为这个问题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彻底澄清,否则,无法前进。虽然语言上照例生动风趣,但辞锋犀利,甚至偶带挖苦,有时还不免疾言厉色。现集纳如下: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民一泄了气，不得了。十个指头问题要搞清楚，伸出手看看，究竟有几个指头生了疮？不过一个指头有毛病，不过多用了一些钱，多用了些人；就“库空如洗”呀，“市场紧张”呀。只讲一个指头长了疮，就不会形成一股风。吹掉了三个东西：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而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治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了半年不就变了吗？钱多花了，计划大了，要批评，我也批评过，如广东，河北通县专区产量定得过高。我是“抱着石头打泡湫”（湖南土语：游泳），做事历来是稳当的。

——十个指头是关系六亿人的问题。对于我们共产党，对于我们的事业来讲，总是九个指头是好的，不过一个指头有毛病。那就是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搞泄气，使整个工作受到很大损失的问题。这一点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反冒进”。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董”。张奚若（未划右派）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陈叔通也讲过：“我看方针是冒进为主，保守为副”。过去北方亩产一百多斤，南方二三百斤；蒋委员长积20年之经验，只给我们留下4万吨钢（年产）。“好大喜功”，看什么大，什么功，是反革命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的好大喜功。不好大，难道好小？中国这样大的革命，这样大的合作社，这样大的整风，都是大，都是功。不喜功，难道喜过？“急功近利”，

不要功,难道要过? 不要对人民有利,难道要有害?“轻视过去”,轻视小脚,轻视辫子,难道不好? 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青岛、长春的房子就好。我们不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还有什么希望?“偏听偏信”,不偏听不可能,是偏听资产阶级,还是偏听无产阶级的问题。有些同志偏得不够,还是要偏。我们不能偏听梁漱溟、陈铭枢的。“喜怒无常”,常有,也并不好,不能对资产阶级右派老是喜欢。“不爱古董”,这是比先进,还是比后进的问题,古董总落后一些嘛。我们除四害,把苍蝇、蚊子消灭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总是后来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1956年“冒进”,1957年反“冒进”,1958年恢复“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这里举了河北和安徽两个例子,后者曾载《人民日报》社论《乘风破浪》)。河北兴修水利,1956年1700万亩,1957年200万亩,1958年2700万亩。治淮河,七八年共花了12亿元,只做了12亿土方;安徽去冬今春8亿土方已超额完成,决定再做8亿土方(随后报纸公布,去冬今春共搞16亿土方)一共不过用几千万元。双轮双铧犁,浙江发动全省讨论,浙江、安徽、两湖都能用(周小舟发言时,谈到双轮双铧犁推广中确有缺点),要为双轮双铧犁恢复名誉,重新用。扫盲,路上挂识字牌,还要坚持。

——我乃罪魁祸首。1955年12月写了《农业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反了右倾保守,对全国发生了很大影响。是个人崇拜也好,偶像崇拜也好,不管是什么原因,各

地大小报纸刊物都登了。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后来又心血来潮。找了34个部长谈话（大家劲都很足），谈了十大关系，就头脑发胀了，“冒进”了，我就不敢接近部长了。三中全会，我讲去年砍掉了三个东西，没人反对，我得彩了，又复辟了，就又有勇气找部长谈话了。这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进”，什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研究一下，究竟哪个大？（谈到此处，就提出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问题）。

——这是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不是一个指头有了病。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为什么要看？那么恐慌，那么动摇。只有一个指头有病，是9与1之比。这篇东西没有弄清这个比例关系，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像陈叔通、黄炎培、陈铭枢的方法。社论针对谁？是针对我的“序言”提出批评。又引用了我在“序言”中讲的一段话（按：社论引了这一段：“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我的文章重点不在此，而在反右倾保守，要引就应引用全文（引用全文就否定自己了）。文章把我撇开，又要利用我。一不麻烦我，二可利用我打别人。

——我要争取讲话。1956年1月至11月反“冒进”。



二中全会我讲了7条,是妥协方案,解决得不彻底<sup>①</sup>。省市委书记会议,承认部分钱花得不当,未讲透,那股反“冒进”的风就刮普遍了。廖鲁言(农业部长)向我反映,四十条被吹掉了,似乎并不可惜。对此可惜的人有多少?叹一口气的人有多少?一下吹掉了三个东西。有三种人:第一种人说:“吹掉了四十条,中国方能得救”;第二种人是中间派,不痛不痒,蚊子咬一口,拍一巴掌就算了;第三种人叹气。总要分清国共界限,是国民党是促进的,还是共产党是促进的?

——反“冒进”的人为党为国,忧虑无穷,脱离了大多数部长和省委书记,脱离了六亿人民。请看一篇文章,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此文使登徒子2000年不得翻身。宋玉的方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九个指头不说,只说一个指头,就是这种方法。我们就怕六亿人民没有劲。不是讲群众路线吗?六亿人民泄了气,还有什么群众路线?看问题,要从六亿人民出发,要分别事情的主流、支流,本质、现象。

——5月间右派反攻,使得那些有右倾思想的同志提高了觉悟,这是右派的功劳,也是激将法。

认为反冒进的矛头是针对“序言”,是同历史方向背道而驰,挫伤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乃至同右派只差50米远了……两年来,对1956年那篇《人民日报》的社

---

<sup>①</sup> 二中全会上。关于经济问题毛泽东讲了7条意见,认为1956年共多用了约30亿元,其中基建投资多用了15亿元,同意1957年计划安排是稳妥的等等。

论，毛泽东是一直耿耿于怀的，只有到南宁会议时，才将这些看法一一道出。首当其冲的是周恩来和陈云（陈没有参加会议）。在八大之前，最后修改二五计划草案时，鉴于多快同好省之间的关系，人们往往只抓住前者而忽略后者，周恩来曾在一个重要之处删掉了“多快好省的精神”几个字。此事在会上。也被毛泽东一再提出。因此会议形势极其紧张，有的同志晚上睡不着觉。当时，立即从北京把社论原件找了来。原来社论是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先后经过陆定一、刘少奇、胡乔木三人修改定稿，少奇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35年之后的现在，我们重读这篇著名的“历史文献”，会感到这篇文章虽然重点在反对急躁冒进，但也确实处处照顾了题目的另一面：“要反对保守主义”。文章一开头就肯定了1955年下半年以来，“反对保守主义的斗争”已经取得重大效果，即全国已有90%以上农户加入了生产合作社，私营手工业和工商业改造也已基本完成。“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鼓舞下，广大工农群众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引用“序言”中那一段话，也恰到好处。而且在“什么是右倾保守，什么是急躁冒进，这里有一个客观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实际的可能性”，这样一段论正确的工作方法之后，还有以下一段话：“我们应当根据事实下判断，有什么偏向，就反对什么偏向，有多大错误，就纠正多大错误，万不可一股风，扩大化，把什么都反成保守主义，或者都反成急躁冒进。如果反对过火，就会反了一面又造成另一面的偏向，于工作反而有害。”文中关于急躁冒进的具体例子只举了两个，一个是双轮双铧犁，“生产计划定得过高，没有考虑到南方水田的条

件,以致在南方水田区大量积压”。另一个是农村扫盲,中央本来规定的时间是五至七年,可是“至某些县里成了三年,愈到下面定的时间愈短”。以致农忙时也大搞,“个别的地方甚至设立识字岗、拦路识字站,强迫群众识字”,“妨碍农民生产,招致农民埋怨之外,并收不到好的效果”。据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说:“乔木同志加写的双轮双铧犁的例子,定一同志修改突出的扫盲例子,在当时是比较敏感的两件事,因为都直接涉及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为适应农业合作化后的新情况,推广新式农具,纲要规定:‘在三年至五年内,推广双轮双铧犁六百万部’。在急于求成的气氛下,1956年原设想生产500万部,后来计划安排生产350万部,推销270万部,但仍满足不了各地需要,以致中央在4月19日不得不致电各省自治区党委,说明全国钢材紧张,不能按原计划组织生产,要求各地降低生产和销售指标。结果,却因为没有考虑到这种犁根本不能用于南方水田,以致到10月底,虽生产出170多万部,却只销出80万部,还退回15万部;没有退回的也有一部分是只能挂在墙上无法使用的‘挂犁’。”

应当说,这篇社论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完全是从当时客观实际情况出发提出意见的,也就自然要联系毛泽东最近的教导。社论在引出“序言”中那段话之后说道:“现在的情况正是有些同志违背了毛主席的这一指示,超越了客观情况所允许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去硬办一些一时还办不到的事情。”然后,农业方面举了扫盲的例子,工业方面举了双轮双铧犁的例子。特

别引起毛泽东不快的，可能还在下面这两段话：

“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一出来，各个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得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来。”

“为什么反对了右倾保守之后，在有些工作中又发生了盲目冒进的偏向呢？这主要是由于我们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造成的。由于没有运用辩证法的方法，没有从事物的复杂的矛盾和联系中全面地观察问题，只从一个方面，一个角度去看问题，就把许多问题看得太死、太绝对化。又由于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对实际情况了解得不够，心中无数，有盲目性，在这种情况下，处理事情就当然容易偏于一面，发生片面性，在反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之后，在许多同志头脑中就产生了一种片面性。他们以为既然要反对保守主义，既然方针是‘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既然要执行四十条，于是一切工作，不分缓急轻重，也不问客观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废俱兴，齐头并进，企图在一个早晨即把一切事情办好。这样由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当然免不了要犯错误。”关于怎样正确了解多快好省方针，防止片面化，绝对化，社论特加论述。最后说道：“总之，做任何工作，都要善于把上面的方针、要求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

结合起来,从实际情况出发去考虑和确定自己的工作步骤。只有这样,才不至于犯右倾保守或者急躁冒进的错误。”

我们党的漫长历史说明,革命精神与“左”倾急躁总是结缘不解。对于1955年农业改造高潮之后出现的这种积习和传统,这篇社论是触及到了的。同随后而来的“大跃进”那阵十级台风相比,当时冒进之风不过“起于青萍之末”罢了。可是,这样一种及时敲响的小小警钟,并已经事实证明是敲得及时的警钟,硬是听不进去,听进去的人也多连忙“洗耳”不止。对一篇符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精神的文章的错误批判,竟然导致历史的逆向发展,这确实是任何人也始料不及的。

我没有去查证过,不知当年这篇针砭时弊——反对急躁冒进,反对片面性盲目性的社论,是否是1958年至1978年这20年间,《人民日报》敲响的最后——声警钟?然而,历史确在嘲弄这篇社论。既然是冒进的“罪魁祸首”,南宁会议后发生的事情,似乎是理所当然地要按照它所指责的反其道而行之:你们不是反对急躁冒进吗?请看我们急躁冒进到何种程度吧;你们不是反对片面性吗?请看我们做到怎样的片面性吧;你们不是反对盲目性吗?请看我们达到何等的盲目性吧;你们不是说不要只顾多快而不顾好省吗?请看我们的各种“卫星”是怎样上天的吧。

除开批判“反冒进”之外,南宁会议上受到批评的还有国务院尤其经济系统的工作作风问题,主要是报党中央主席的重要文件只拿最后成品,逼着签字,这实际是一种“封锁”。又附带批评了分散主义,说这回是攻击部长以

上的人，攻击“下倾盆大雨”的人。在谈到这方面问题时，提出“务虚”与“务实”的问题，“虚业”与“实业”即思想政治和专业实务如何统一结合的问题，其中有具体的中肯批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在“大跃进”时期，是广大干部经常念道，却又难以结合好的一种苦恼。这方面的批评也是令人极其紧张的，仍集纳如下：

——会议的开场白即说道：向人代大会的报告，我两年没有看了（为了照顾团结，不登报声明，说我不负责）。章伯钧说国务院只给成品，不让参加设计，我很同情。不过他是搞资产阶级政治设计院，我们是无产阶级政治设计院。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会，等于强迫签字。平时不给一点情报，不下一点毛毛雨，四时八节要开会了，一个成品拿来了，倾盆大雨下给我们。我们都是如团粒结构不够的土壤，怎么能吸收得了呢？水都从地表流走了。你们平时就不跟我们通气，不拿一点半成品、原材料来，一定要等到你们把什么都搞好了，才拿给我们，这实际上对我们是一种封锁。很多文件是闭着眼睛强迫签字的。大概你们像那个茶花女一样，见爱人时总要打扮得漂漂亮亮，临死之前还是如此。你们为什么不能像农家姑娘一样，可以蓬头散发见面呀！农业纲要40条，最初是8条，后来是17条，同地方的同志多次交谈议论，最后才形成40条。这回先到杭州，同华东同志谈了十几条；在这里又谈了20多条。做汇报要离开本子讲问题，把主要思想提出来交谈，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办，不那样办，财经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情报，报告也一般不大好议论，写得不讲考据之学、辞章之学和义理之学、前者是修辞问题，后者是概

念和推理问题。

——党委方面的同志，主要危险是“红而不专”，偏于空头政治家，脱离实际，不专，也就会慢慢地退色了。我们是搞“虚业”的，你们是搞“实业”的，“实业”和“虚业”应当结合起来。搞“实业”的，要搞点政治；搞“虚业”的，要研究点“实业”。搞“实业”的人不同政治结合，脱离了政治，那就会成为灰色的或白色的，就会成为迷失方向的实际家、科学家、经济学家或文艺家。思想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红安县搞试验田的报告，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我读了两遍，请你们都读一遍。红安县报告中所说的“四多”、“三要”、“三不要”，是全国带普遍性的毛病。就是对“实业”方面的事不甚了解，而又要领导。这一条不解决，批评别人专而不红，就没有力气。党委领导要有三条：工业、农业、思想。省委也要搞点试验田，如何？不然，空头政治家也就会变色。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己早以为自己红了，钻到那“实业”里面出不来，义理之学也不讲了。北京工作的同志不下去跑跑，不动脑筋，光在那里罗列事实。于是局长领导部长，秘书专政。北京难出真理，真理常在下面。

——中央只揽了一个革命，一个农业，其他实权在国务院。有人反对党政不分，想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最好的好意也是想将一半大权揽过来。这样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到党委，到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为了反对分散主义，我编了8句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那32个字。

我们打了20多年仗，打仗必须发动群众。土改也是

要发动群众，历来反对恩赐观点。社会主义发动群众应当更充分些。大鸣大放，发动群众。为搞水利，不发动群众不行。冒进是全国人民热潮冲起来的，是好事（只有部分是坏事，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搞工业，搞农业，难道比打仗还厉害些？我就不相信。搞经济就那么复杂，那么多学问？

有一次插话中还谈到：唐朝诗人三李（李白、李商隐、李贺）有点幻想，令人喜读；光搞现实主义这一面不好。

在南宁会议上，形势当然是一边倒。与会者都程度不同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教诲：“头脑大大清醒起来”，都表示要当促进派。记得三峡问题谈完后，周小舟向我介绍那几十条时，说大家都希望主席多谈一些，多受到一些启发，甚至表示他也想将英文捡起来。李井泉等人还从自己的工作出发，说明“反冒进”受到的损失；有不少人汇报时，谈了反省性的意见。批反冒进首当其冲的是周恩来、陈云，以及国务院财经方面负责人，他们曾是反冒进的主角。周恩来除在会议上表态外，还单独向毛泽东作了检讨。事实上，凡犯有“反冒进”错误的人，都得一再检讨下去。后来在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和陈云等都为此又作了正式书面检讨。

在南宁会议上再次受到表扬的是柯庆施，以及湖北的王任重等。1月15日，毛泽东在会上说：上海对内部矛盾问题的讲法，有所发展，他们搞了两个月；浙江对此也有创造。各省理论怎样？没有理论，领导困难。中央工作同志不动脑筋。这一下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1月16日，毛泽东在会上又说：柯庆施“乘风破浪”的文章很好。



上海有 100 万工人，也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才能产生出这篇文章。北京不是没有也，不多也。任何一省委、部委，特别《人民日报》，主要东西，宁少勿多，认真搞，是并不难的。省委、各部都忙得要死，昼夜奔忙，不搞考据之学，辞章之学、义理之学。1 月 15 日，湖北汇报时，毛泽东赞扬说：真理在湖北，为什么不在别处？他们十年计划能六年完成，农业能如此，工业为何做不到？问题是过去没有抓。在南宁会议上，柯庆施成了头号标兵。有些人就表示，我们要“赶上柯老，我们要赶”。

在讨论 1958 年计划草案时，大家贯彻对反冒进的批判精神，都尽可能要“赶上去”。会议根据国家经委汇报制定的 1958 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比 1957 年 2 月全国计划会议刚确定的指标，又大大提高了一步（工业总产值增长指标 12 月为 10.4%），主要项目的增长速度为：工业总产值 15.1%，农业总产值 6.5%，基建投资 12%，钢 17%，生铁 22%，煤 16%，发电量 15%，粮食 5.9%，棉花 6.7%。这个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当时正常发展所能达到的高度，但同随后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到北戴河会议所定的高指标，又瞠乎其后了。

南宁会议所开始造成的后果，首先是经济上比 1956 年更严重的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错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八大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以及经济建设上积极稳妥、综合平衡的方针，统统置诸脑后了，而以盲目追求多快、打破平衡的方针代之。

其次，经济问题变成政治问题。反冒进为右派所喜，为右派言论，冒进为左派所好，为革命精神；冒进是发动

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不依靠群众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前者轰轰烈烈，多快好省，后者冷冷清清，少慢差费。党内历史上有过的只能反右、不能反“左”的传统恶习，错误的所谓反倾向的“路线斗争”，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又以“两种思想、两种方法、两条路线斗争”的分野，重新出现。从而不仅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而且对整个政治社会生活，带来日益严重的影响。

第三，党内组织生活开始出现个人专断的格局。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无产阶级政党这一有史以来的基本原则，从此遭到严重破坏。党的八大所通过的一系列正确决策，1956年反冒进以来一系列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包括二五计划的一些主要指标，本来都是党中央常委和政治局集体领导的决策，毛泽东本人也是同意的，但最后在南宁会议这样的会议上，对本来集体决定的正确东西，进行不容反驳的无理指责，如同对待右派一样，过火批判，予以否定。从此，这种中央主席个人专断个人随心所欲的局面，就再也难以改变了。

回顾一下，南宁会议为何形成如此一边倒的局面？除开外部的反右形势和斯大林问题、波匈事件等有关外，当然，这同毛泽东的历史威信和对他的“个人崇拜”有关，也同党内民主生活已经不很正常有关，特别是还同那些极力迎合也敢胡思乱想的人有关。从更广泛的范围或就当时全党干部的认识来看，可不可以这样说，总存在一个同“左”的东西“结缘不解”的问题。多年的历史说明，“左”似乎是共产党员安身立命之处：不怕“左”，不怕“过火”。不怕“冒进”，而只怕被认为“右倾”、“保守”；因为不论怎样，

前者是保险的，是“为了革命”，而后者是“立场问题”，“不想革命”，甚或“阶级异己”、“反革命”问题。这是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存在意识。人们啊，谁不怕戴“右倾”或“右派”的帽子呢！

###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回到北京三四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去看望黄克诚。我们是1952年9月一起调到北京的。来京后，每年总要去看望两三次，有一次还是请他帮助，要部队的转业干部。南宁会议的情况他已清楚，我谈了这次的“奇遇”和自己的担心，也谈到毛主席有如抗战初期的兴奋状态。入党多年来遇到的领导，黄克诚是最能让人随便交谈、可以交心的人。落坐还只有刻把钟，忽然中南海主席处来电话，要我立即去。

从颐年堂的正门进去，来到现在让人们参观的起居工作的菊香书屋，庭院和房屋一仍旧式。毛泽东穿着那件成为文物的旧毛巾睡衣，半靠半卧在宽阔的板床上。见我进来让我坐在靠近床边的椅子上。谭震林正坐在沙发上同他谈话。谭是认识的，1956年新安江上马前，我到上海找华东局要干部，是由他主持商定，让淮委支持，并派人同我去蚌埠找过淮委负责人。这时，谭正在谈淮北如何水网化的问题，说可以变成江南一样的产稻区，办法是搞小型水利为主。我同水利的最早接触，是在延安《解放日报》评论部工作时，分解放区、陕甘宁和大后方三个组，我负责解放区组。除开新华社的电讯外，还经常翻阅华北、华中敌后解放区的报纸。1943年，我写了一篇几年来解放区

水利事业成就的综合报道,附有一份详细的统计表,同国民党当时的水利加以对比,并写了一篇以《敌后解放区的水利事业》为题的社论(“解放区”这一名词也是第一次在《解放日报》上出现),说明烽火连天的敌后解放区,在水利事业上,比国民党的大后方成就要大得多。这篇报导引起毛主席和中央同志的重视,后来在《论联合政府》中曾予提及。因此,我对小型水利的作用印象很深,对几年来水利系统的好大作风,不以为然,当问到我对淮北水利意见时,虽然并不了解具体情况,仍随声附和回答了一句:赞成搞小型水利。引起毛泽东一句话:呵,你也赞成。不久,谭震林就起身走了。

当他俩谈着话时,我注意了一下室内情况:这张大板床的另一半,堆满了种种线装书;远处靠墙是一列书架,上面绝大部分也是线装书;两个大沙发对着床放着,靠床头还有一个较大茶几(这也是就餐时的饭桌)。后来我去卫生间,发现一个方凳上有一本线装《红楼梦》,正打开平放着。原来听说,每逢外出,总要带一大批书。至此,落实了这个印象:手不释卷,置身于书海之中。这个晚上还谈过些什么,已记不清楚;记得最确切的是,我提了这样一个问题:今后您要我注意哪些方面的事?回答真是出乎意外:中华人民共和国。随即将一份打印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给我(封面上有“毛泽东同志”楷体兰色印字),这是他自己用的一份,要我过细看看,提些意见。

我的旧档中有一叠《对六十条的意见》。共25页纸,其中有底稿和有关札记、分类统计。大概是几天之后寄还的。现在将“底稿”抄在下面:

有些小意见写在原件上。这里还有些零碎意见、感想写上,仅供参考:

1)六十条的分类统计,主要是领导和工作方法 30 多条;农业问题 4 条;提出今后要着重抓工业的问题,但工业只有两条,写了抓先进典型、新技术、新产品试制三项。因此觉得关于工业还应多写几句。如要抓些什么,如何抓法,一个时候,围绕一个中心问题开几天会,由中央有关单位主持,参加的人有部长、局长、总工程师(也可以请个别非党、政治好的)、厂长、个别车间主任,基建工程负责人等,包括中央系统和地方系统的人。开会可分大、中、小型三种,到工业集中城市和各省去开。

2)关于计划问题。首先要求年度计划与五年计划如何很好结合,在投资、速度、各部门间比例关系等重要环节上结合得好。这方面第一个 5 年中有教训。现在经委同计委的具体工作部门,也还有些扯皮现象。苏联经验,5 年的叫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0 年的叫现实性远景计划,15 年的叫假设性远景计划(更长远的计划如 20 年、25 年就只能根据更多的假定来考虑)。三者之间,有区别也有联系,须善于区别其间的关系。有一些部门如电力部门,必须有比较可靠的 10 年至 15 年的远景计划。编制得最好的计划,也会由于群众的积极性和许多未能估计到的因素,需要在执行过程中经常修改。远景计划的制定,计划部门要同科学研究部门合作,也可发动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员讨论。一个大的经济单位,要有几个很实际,知识较渊博,又有远大眼光的人,来考虑、研究长远计划,以保证在计划工作中不迷失方向。这样的人只要几个,助手也不要

多,主要是善于利用国内外各种资料。

3)积累问题。研究的方向应当是如何最大限度地积累资金,如何全民勒紧裤带,不惜巨金来发展工业和农业。

4)在各种经济建设中,如何避免力量与资金的分散,是各级领导要经常注意的一个问题。

5)社会主义建设中速度问题的总原则,是只可加快,不可减速。如像长跑运动员一样,很懂得掌握自己的体力和速度,每段距离中如何分配,如何压倒对手,最后如何冲刺(这一条说明,我当时的头脑也是发热的,尽管这种要求主要是从自己本位工作水电出发)。

6)“技术革命”口号如何提法。当然,技术也是不断革命的。但这个口号容易狭隘地理解为,只是落后与先进、新与旧的一种关系。而我们今天提出这个口号主要意义在:为学会并掌握技术,为技术不断进步而斗争,即为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跃进、不断提高而斗争。

7)推广新经验,新技术。如果条件、情况相同,就不能采取自愿态度,而应当用自上而下的适当办法使之执行。

8)老干部、各级领导干部如何从外行变成内行,要作个规划。总结第一个五年中这方面的成绩和教训。总结现在各大学所办老干部班的经验。如何以内行或比较内行逐渐代替外行,这是总的干部路线。

9)干部能上能下应逐渐形成风气。

10)各个部门的领导应帮助一批政治上好的技术干部,懂得做组织工作,有工作方法,善于走群众路线,以便参加领导工作。目前技术、经济部门中,领导干部内行较

少,应当作这样的安排和和长远打算。

11)善于发现新人才,更加注意提拔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到领导岗位上来。经过整风、反右和劳动锻炼之后,更有基础来进行这项工作了。

12)有一些习惯性、周期性的问题,如浪费、贪污等,必须经常注意,绳之以法,年年大反一次。

13)各经济、技术部门必须经常了解世界各国本行业中的尖端,最先进的情况。要有计划地定期地派人出国(苏联、东欧和资本主义各国)考察,考察团人员一般不要超过10人,要都是真正的专家,要有一个政治上很强的人带队。

14)各单位要有一个很好的小图书馆,一个很好的小资料室,要经常注意新书目录,各种新资料。

15)不要害怕反对意见,要重视自己认为是不正确的反对意见,不要去压制坚持反对意见的同志,要容许不同观点的无拘束的争论,要有意识地启发各种不同意见展开充分讨论,以便在决定问题时,能比较全面地反映客观事物的各个侧面,从而作出正确的决定。

以上这15条,似乎并非最后送出的定稿,因为现在抄录的这份底稿只有7页,其他18页还有许多内容未包括在内,草稿是用几种颜色的铅笔写的,可见不是一天或两天之内的构思。现在再摘录出一些,以说明自己当时注意的问题,当时的思想水平,和如何尽“兼职秘书”之责的。

有两页专门写的工业方面应注意事项:

1)国家发展水平与速度关系问题。高度的生产技术,

才能有高度的速度。

2)各经济部门比例关系:农业与工业(寓工于农),轻、重工业,煤、电、铁路交通先行工业,钢铁与机械,民用与国防,骨头与肉(主件与配件)等。

3)国力与基建规模,生产力布局问题(资源分布与经济地理),地区规划。

4)中央与地方的结合。

5)大中小结合。

6)先进与落后结合。洋办法、土办法,机械化与人力。

7)勘测设计,资源勘探,产品设计,基本建设设计等。工程施工问题。

8)新产品试制。

9)产品质量检查。

10)新技术推广。在勘测设计、生产运行和基本建设诸方面,有许多技术规程、规范都是从苏联照抄照搬来的,有些已不完全符合我们情况,应当及时修改,否则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这方面我在几年水电建设中有所体会。

11)专业化,标准化,协作关系。各部门协作的重要。

12)节约问题,投资效益(先进定额,节约材料,减少储备和流动资金。降低成本,等等)。

13)劳动生产率,是综合指标,最后结果。有关技术安全、生产组织管理等问题。

14)工资、福利制度。

15)产供销平衡。

16)资源综合利用问题。



另外还有一些条条，是上面 16 条中没有写上的：

——要善于找帮手，广交各界朋友，各种耳目，利用记者，各种各样群众联系。

——领导部门，要有意识让一两个人减少日常事务，较“清闲”一点，以便保持头脑清醒，尤其计划部门搞长远规划的，要有这样的人，他们当然都是最实际又最能听奇谈怪论的人。领导人定要不被事务洪流困住，重大问题亲自过问，打破砂锅问到底。

——反映意见，定要全面，正面、反面，赞成、不赞成，决不可随风倒。

——不会开会，还是一个大问题。

——选拔干部的德才标准，逐渐转向业务能力。

保留自己这些过眼烟云的资料，也在如实说明，当年如何第一次履行这个“秘书”身分的，以后继续受到表扬也好，庐山会议最终实践了“几不怕”也好，是合乎逻辑发展的。

旧档中标明“1958 年”的一个本子上，记录了《南宁会议 60 条》，当是寄出意见并附还原件时，特意抄下来的。同随后党内公布的《草案》相对照，则出入较大。后者不仅是条目及其次序的调整变动，主要是文字修改和内容的充实，还加了“前言”。篇幅后者大约扩充了一倍。如原件第一条是：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后者是第六、七两条，分写如何检查，如何评比。又政治和经济、政治和技术的统一问题，原来是放在不断革命这一条内的，后者分开写了。增加了农业高产的例子。也有一些内容删除了，如关于人的生到死是辩证法规律，“死亡就要庆祝”；

也删掉了一些具体例子(如“培养秀才”这条,曾将我名字写进去了)。后者的第二条:“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工业工作,这里也有14项”,是原件中没有的。上述我草写的“工业方面应注意事项”的16条,大体都包括在内,也有的不在内。这14项当是国家计委、经委等业务部门参加定稿的。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是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其中提出了许多有关领导经济建设的工作任务和方法。由于当时的主导思想是反冒进,是追求建设的速度,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就此提高全党的认识,这些任务和方法以及某些理论原则,就不能不包含许多错误的东西,而且有些正确的东西在执行时也会走样甚至走到反面。总之,《六十条》和“大跃进”的关系,同反冒进一样,也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六十条》提出了一些正确的原则、任务和方法。例如,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工业,提出14个项目,内容虽然还不全面,确是生产和基建中重要的基本东西。如必须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上去:“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钻研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要破除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八年来积累的规章制度有许多还是合用的。但有相当一部分妨碍了群众的积极性,应加修改或废除(问题在“大跃进”时,群众一发动,规章制度被横扫乱破,造成严重后果)。关于领导干部要打掉官风,实

事求是,如何深入下层,同群众打成一片;每年要有4个月离开办公室,到下面作调查研究,增加感性知识;要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决不可摆架子,等等。这些都是有价值的思想观点,和多年积累下来的正确经验。

《六十条》推动了急于求成的“大跃进”的到来,和浮夸风的出现。首先是这样一些脱离实际的过高指标:“争取在3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在今后5年或8年内“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规定”(原规定12年完成);各地方工业产值,争取在5年或10年内“超过当地农业产值”;还介绍湖北、四川等地,每年总结亩产2130斤、1680斤等“单季高产的经验,各地可以研究试行”;提出生产计划中央和地方共三本帐的办法,助长了脱离实际,盲目提高指标,为层层加码大开“绿灯”的错误作法。“不断革命”的观点和要求,引入经济领域,成为“大跃进”的思想理论武器。《六十条》写道:“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1949年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接着是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于1956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问题还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都要用鸣放整改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1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种“不断革命”的观点,同“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斗则进不斗则退”等等观点是一脉相通的。

这种观点在战争年代、革命时期起过主导作用；但在夺取了全国政权，进入建设的和平时期，经济建设需要按照经济工作本身的规律。持续协调地发展，尤需要稳定有秩序的环境。“不断革命”则鼓吹事物经常处在一种人为的不停止的变化状态之中，“一波不平一波又起”，要求经济生活也像打仗一样由政治挂帅，边建边破，快速而跳跃地发展，及至运用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等等方法。这就不能不造成严重后果了。

同“不断革命”论密切关联的是“不平衡”论。《六十条》写道：“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的内部车间和车间、小组和小组、个人和个人之间，都是不平衡的。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根据这种观点或法则，自然就可以任意打破平衡，搞人为的不平衡；“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事物也就前进了一步”。这样，以“不平衡是绝对的规律”作指导思想，导致“大跃进”时期计划工作放弃了综合平衡的规则，否定了国民经济必须在综合平衡中发展的规律。

此外，《六十条》中的“大权独揽”，第一书记挂帅（“大事一定要问。要有二把手、三把手，第一书记不在家的时候，要另外有人挂帅”），造成了“大跃进”时，从上到下，层层独断专行的不良作风，民主集中制遭到严重破坏。“挂帅”是我国自古以来封建用词，战争中“元帅”是可以发号施令的。经济生活中没有元帅，自然不能用打仗的方法来领导经济建设。

《关于传达和讨论毛主席六十条指示向中央的报告》，河南这回走在前面，1958年2月2日发出，中央于2月7日向全党转发了。河南省委的报告说：“主席不断革命的指示，给我们以敢于理想、敢于向前看的无限勇气，从理论上、思想上解决了能不能跃进、敢不敢跃进的问题。打破了庸俗的“平衡论”，粉碎了‘反冒进’（就是反跃进）的观点，以最锋利的马克思主义的武器把我们武装起来，乘风破浪，跃进再跃进。贯彻执行主席的六十条指示，就能缩短我国的过渡时期，在这与帝国主义比时间、比胜负的时期，中国的大跃进，对世界的命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河南确实这样说到做到，后来放粮食卫星，办人民公社，放炼铁卫星，都走在全国的前列。许多省纷纷表示决心，要在5、6、7年时间内，完成农业发展纲要提出的任务。许多省市的地方工业。在此后5年内不是增长百分之几十，而是要增长几倍。在杭州和南宁会议上，因干劲大受到表扬的甘肃，这时决心在5年内，地方工业产值要比现在增长16-19倍，以赶上或超过农业总值。

接着2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打破旧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的社论。以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法则说明，事物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认为“积极平衡和消极平衡，这是计划工作中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支持新生事物和群众的积极性，不断地提高落后的指标和定额，这就是积极的平衡，否则，就是慢与差的消极平衡。只有冲破旧的平衡，达到新平衡，事物才能前进，社论以此论点再次批判了1956年的反冒进，说当时工农业“显然是一个很大的跃进。但是那时候有一些人被这种跃进所

造成的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中的不平衡状态惊呆了。他们只看到这种不平衡所引起的某些在进步中不可避免的暂时的困难,以为这也困难,那也困难,惶恐得很。这就是因为他们对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缺乏正确的了解,对党和广大群众克服困难的力量缺乏足够的估计。因此就错误地提出了‘反冒进’的口号,给当时正在蓬勃发展的群众高潮泼了一瓢冷水。”社论认为工业农业的“大跃进”局面已经到来。最后号召:“我们必须反对庸俗的平衡论,或均衡论,反对消极的平衡方法。从庸俗的平衡论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我们也就敢于跃进了。”从此以后,计划工作中不断地出现层层加码高指标,“打破平衡”、“积极平衡”成为计划工作的理论;从此高指标风漫天而起,一发不可收拾。

# 中国共产党民族自治政策的成功尝试

——记 1936 年红军西征期间建立的  
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

孙 国 标

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是 1936 年红军西征期间在宁夏同心和海原县东部地区建立的革命政权，曾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一个组成部分。

## 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的社会历史条件

### 一、红军解放豫旺县

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围攻和包围，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1936 年 5 月，党中央决定以红军主力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等部组成西方野战军，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刘晓为政治部主任，聂鹤亭为副总参谋长，向甘肃、宁夏挺进，进行西征作战。

红一军团为左路军，在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率领下，从延川出发经保安、吴旗南下，连克麻岭、曲子、阜城等城镇，歼灭马鸿宾部一个旅，红军军威大振。此后，又挥戈占领环县，直抵宁夏的七营川、清水河和海原县李旺堡。6 月 16 日，红一军团二师进占豫旺堡。月底，彭总随西征指挥部进驻豫旺。

红十五军团为右路军，在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率领下，从延川出发，经贾家坪、贺家渠、蟠龙一带，直指三边北上，首战宁条梁告捷后，声东击西，一举攻克三边重镇定边县，然后，分兵两路，攻打花马池（盐池县城）和包围了豫旺县城下马关。红军采取围

而不歼的战术，一方面向城内敌军宣传讲解红军北上抗日、回汉平等和优待俘虏的政策，另一方面在下马关东滩、红城水发动群众，建立区、乡苏维埃政权。6月26日，红军夜入下马关，27日拂晓胜利结束攻城战斗。在围攻下马关的同时，右路军七十五师于6月21日占领王家团庄。至此，同心县全境基本解放。红军到同心后，受到了回汉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同心的解放，是西征的伟大胜利，消灭了盘据在当地的国民党反动军队，摧毁了反动派赖以维护其统治的基层组织，成为西征新开辟的一个红色根据地，为豫海县成立回民自治政府奠定了政治基础。

## 二、两个重要历史文献的发布

红军的西征，不单是军事行动，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在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制定了许多民族政策，发布了对回民工作的指示、宣言等，为建立回民自治政府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在1936年5月24日，西征红军出发的第6天，中国人民抗日先锋队（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发出了由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签发的《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颁布了对回民工作的三大禁条、四项注意。在《指示》中指出：“我红军目前向西行动，所经甘宁两省地区有着占人口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之广大回民群众，加紧争取与帮助回民走到抗日反国民党军阀卖国贼的战线上来，并联合苏维埃红军，为回族的自决与解放而斗争，创造西北新的伟大的局面，是党和红军极迫切的重要的政治任务。”为此，要求西征部队要广泛宣传发动回民群众，启发回民的民族觉悟。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和反对国民党军阀统治的斗争，同回民的切身利益和政治要求结合起来，建立回民自己的政权。

在中国工农红军西征甘宁进入回民区的同时，1936年5月25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庄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关于主张民族平等、信仰自由、民族自决、民族解放，建立回民自治政府等七条主张。



《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是两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献。它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平等思想，集中而鲜明地反映了我们党有关少数民族解放的基本理论和方针政策，在时局转换的重要时期，为回族人民争取彻底解放的斗争指明了一条光明的道路，为指导开展回民工作提供了正确的思想武器，为当时在回族聚居地区建立“回民自治政府”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 三、放手发动群众，大力培养回族干部。

国民党反动派、宁夏军阀马鸿逵为了阻止红军解放豫海，极力挑拨回汉关系，扰乱人心，制造混乱，在回族人民中进行欺骗和反动宣传，说什么共产党“共产共妻”、“杀回灭教”。由于反动派的欺骗和蒙蔽，回族人民对我党我军的抗日主张和民族政策缺乏认识和了解，对自身的地位和解放道路更缺乏认识。因此，红军面临着发动群众的艰巨任务。

红军西征前，毛泽东同志就指示“要在群众中播种扎根。”彭德怀司令员在豫旺时也经常告诫指战员：战术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如果人民大众不拥护我们，我们是不能生存的。我们并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只是人民打击他们的压迫者的拳头而已。

西征红军进入宁夏后，严格按照中央领导及总政治部颁发的《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精神，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严格执行“三大禁条、四大注意”，十分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保护清真寺。部队所到之处，从来不驻扎清真寺，不仅不毁坏回文经典，而且还用阿文书写散发传单、标语，宣传党的主张。对于有着特殊习惯和信仰的回族来说，红军的这种严格尊重民族宗教信仰的行为，是他们过去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在他们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正如《西行漫记》中记载的那样：“这种小心翼翼地尊重伊斯兰教风俗习惯的政策即使在最多疑的农民和阿訇中间，也留下了印象。”

为了动员全军上下做好回民的宣传发动工作，红一军团成立了回民工作团，专门负责回民工作干部的培训，红十五军团建立了

回民独立师，各部队普遍建立了回民工作委员会。西征部队帮助群众打土豪，剿匪，分财产，救贫穷。1936年同心县灾情严重，广大农民生活艰苦。红军把从外地打上豪和剿匪中得来的粮食、羊只分给回族群众，从而密切了军民关系。在红军驻地，指战员经常帮助群众扫院、耕地、锄草、收割、打场。同心地下水含氟量高，不能食用。为了解决群众吃水困难，红军战士到很远的地方去背水、驮水。半个城仅有的一口水井叫“官井”，由于年久失修，水源不足。在征得当地回民的同意后，红军派回族战士将井淘挖一遍，并新修了井口。新淘挖的水井，水又旺又甜。这件事在回民中产生很大反响，他们高兴地称赞“红军引来了幸福水。”一时传为佳话。为了不忘红军的情意，当地人民把“官井”改名为“红军井”。红军广大指战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使党的民族政策深入人心，广大的贫苦回民群众深刻认识到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回民的军队”，是“仁义之师”。

团结伊斯兰教上层人士是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红军发动回民群众的关键所在。西征红军非常注意尊重团结伊斯兰教上层人士。喊叫水地区洪岗子村教主洪寿林，是伊斯兰教虎夫耶教派中很有威望的领袖人物。红军派人与他联系，当他了解了红军的宗旨后，便热情地接待了红军代表，赞成共产党的主张。他在对教民们讲“瓦尔孜”（每周五主麻日讲经称“瓦尔孜”）时说：“顺民者昌，逆民者亡”，“红军的主张是顺乎民心的，他们的事业一定成功。”他号召教民们筹款捐粮支援红军。红军还通过给清真寺和宗教人士赠送匾、联和锦幛，召开联欢会等活动，同回族上层人士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关系，进而通过他们做发动回民群众的工作，收到很好的效果。总之，红军采取多种方式，充分发动各阶层群众，提高回族群众的觉悟，加深红军同回族群众的友谊和感情，“使得苏维埃与红军的影响与信仰迅速在回民中增长提高起来

了。”<sup>①</sup>为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成立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西征红军所到之处,都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帮助群众建立了回民联合会、回民解放会、抗日救国会等群众组织。豫旺县解放后,首先建立了区、乡苏维埃政府,其中建立了两个回民自治乡;其次是积极培养回族干部。红军不但通过回民教导团和回民独立师培训了一批部队回族干部,而且非常重视培养地方工作干部,当时从豫旺派往陕甘宁省政府驻地河连湾学习的干部就有几十人,在下马关举办的回族干部训练班也培养了一批区、乡基层干部。总之,随着红军西征军事上的胜利,我党我军及时把发展群众组织,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放在重要的位置上,通过各种措施培养了一批回族干部,为创建回民自治政府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 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成立

### 一、回民自治代表大会的隆重召开

1936年6月中旬,红军在下马关、豫旺时,其领导机关就开始计划帮助当地回民建立“中华苏维埃豫旺县回民自治政府”,为了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中央决定把拟建的“中华苏维埃豫旺县回民自治政府”改称“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同年8月,中央陕甘宁省委书记李富春受中央委托来到同心筹建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了由李富春、王首道、程子华、唐天际、王柏栋、黄镇、杨奇清和马青年等同志组成的筹备委员会。经过紧张的工作,筹备委员会拟定了政府机关负责人选,并让这些同志参加了自治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同时,大会筹备委员会在认真分析了西北地区的形势,研究了如何实行回民自治和抗日救国等问题后,经过充分协商讨论,起草了回民自治政府的决议、文件,拟定了代表大会的议程。十月初,大会筹备委员会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

<sup>①</sup> 《红色中华》报1936年9月18日第301期。

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红军总部、回民独立师及回族宗教名人和土耳其代表韩德等发出了关于《召集豫海县回民自治代表大会通电》，《通电》指出：“中华回民从来没有自己的政权，受尽了一切压迫剥削与屠杀的痛苦，在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与回奸马鸿逵等统治下，我西北回民所受之一切痛苦更百倍甚于往昔。今在红军援助之下，使我豫海回民向来所受之痛苦得以一旦解除，真正实现了回民的自由。这一铁的实事，更足以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所主张之民族自决，才是全回民与各少数民族之唯一救星。”通电庄严宣告：“现在各处最热烈的进行回民自治解放运动的动员，并决定于本月二十日召集各地回民代表大会，准备讨论西北形势与回民自治与抗日救国各问题，正式成立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今后坚决在共产党领导下，以争取豫海回民及整个中国回民之永远的解放。”

10月20日，豫海县回民自治代表大会在同心城清真大寺隆重举行，来自各区、乡的一百多名回民代表和邀请的各阶层人士共300余人参加大会。正在豫旺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和医生马海德（作为土耳其国代表）应邀参加大会。代表大会召开之际，适逢同心城赶大集，获得了翻身解放的回族人民群众，身着节日盛装，敲锣打鼓，载歌载舞，从四面八方来到清真寺，祝贺代表大会的召开。他们唱道：

胡琴拉起来，  
唱一个苏维埃，  
苏区的天下人人爱，  
苏区的人民好自在！  
一切剥削压迫都打倒，  
生活多痛快！

这是发自广大回汉族人民的肺腑之言，他们边唱边跳，表现了回族人民对回民自治政府的无限热爱和获得解放的兴奋心情。

大会进行了3天，各族代表和人上欢聚一堂，经过充分讨论，

通过了《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条例》、《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处理债息暂行条例》和《减租减息条例》、《土地条例》，以及自治政府的有关决议案。大会选举产生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领导人，雇农出身的马和福（回族）当选为主席，李存德（回族）当选为副主席。马青年（回族、回民独立师师长、红军代表）任军事部长，李振华（回族）当选为文化宣传委员，周生录（回族）当选为粮食没收委员，杨金朝（回族）当选为保卫委员，白生彩（回族）当选为财政委员。

## 二、自治政府开展的各项工

豫海县包括同心县和海原县东部地区，面积约 8200 多平方公里，人口 3 万余。自治政府管辖 8 个区，其中 6 个巩固区是：半个城、王家团庄、高崖、马家河湾、窑山、李旺；两个游击区是：喊叫水、关桥堡。自治政府所在地设在半个城，后来又迁到离城南 30 华里的王家团庄。

为了加强党对回民自治政府的领导，中共陕甘宁省委从中央党校抽调部分党员干部，组成中共豫海县委，贺恩宽（贺旭东）任县委书记，韩民栋任少共书记，韩效忠任组织部长。

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在党的领导下做了大量工作：

（一）把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团结同胞，争取全回族的彻底解放作为重要任务来抓。自治政府及时发布布告，并派出干部到四周尚未解放的地区做宣传工作，号召全体同胞与红军联合起来，组织回民解放会，为自己的解放而奋斗。

（二）建立地方武装，保卫自治政权。自治政府成立了由马和福兼任队长的县游击大队。为了团结哥老会等旧有民间团体共同抗日，还建立了“豫海江湖抗日游击队”，人数达 3000 多人。并深入动员回族青年参加红军，有 300 多名青年参加了回民独立师。

（三）发动群众筹措粮款，支援前线。自治政府以号召大户捐赠、没收逃亡地主财物等方式，共征得粮食 6 万斤，筹措银元 8 万块，二毛皮衣 1000 件，除供给部队需要外，剩余部分分给了穷苦农

民。

(四)组织群众发展生产,恢复商业。自治政府通令废除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一切苛捐杂税,动员外逃农民返回家园发展生产,鼓励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回城营业。由于回民自治政府实行保护和鼓励工商业者的政策,“同心城商业繁盛,数倍往昔”<sup>①</sup>。

(五)镇压回奸、恶棍,巩固新生政权。红军和回民自治政府实行在回民区一般不打土豪的政策。但是对于敌视红军,破坏自治政府征粮筹款工作的回奸、恶棍,自治政府则充分发动群众,给予严厉的打击。

(六)迎接红二、四方面军,三军齐集同心城。当1936年10月初,三大主力红军将在会宁会师时,回民自治政府就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准备隆重迎接和接待三大主力红军。10月下旬,红一、二、四方面军陆续来到同心城。当红军到来时,同心城及四周围回族人民群众都端上“哈利发尔”(盛装小吃的迎客盘),用回民迎接尊贵客人的礼节夹道欢迎红军,表达了回族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敬仰,对红军的深挚热爱和拥护。接着在半个城西门外召开了一万人参加的军民联欢大会,朱德、彭德怀、贺龙、徐向前、关向应、张国焘、陈昌浩、萧克、徐海东、程子华和马和福等同志出席了大会。马和福代表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致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代表同心城和豫海县全体回汉族群众,向伟大的共产党和红军表示衷心感谢,并号召豫海县全体人民,努力发展生产,以实际行动支援红军抗日救国。朱总司令和其他领导同志也讲了话,对豫海县回汉族人民的革命精神及回民自治政府出色的工作成绩给予了热情的赞扬。会后,红十五军团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唐天际和回民独立师师长马青年及马和福在同心城金振明家中设便宴招待了红二、四方面军的领导同志。

1936年11月下旬,西征基本结束,红军三大主力部队全部撤

<sup>①</sup> 《红色中华报》,1936年11月16日第311期。

离豫海县地区向东转移,胡宗南和马鸿逵部队随即占领和统治该地,四处搜捕共产党员和政府工作人员,回民自治政府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1937年4月,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主席马和福被反动派杀害,其他政府工作人员有的隐匿,有的逃亡他乡,至此,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活动也就终止了。

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虽然仅存续了半年左右,但它在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发动各族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组织人力、物力支援红军,扩大红军队伍壮大革命力量等方面都做出了显著成绩,并培养锻炼了一批优秀回族干部。因此,它是中国共产党民族自治政策的一次成功尝试,其业绩应该永垂革命史册。

# 延安的最高学府

——从马列学院到中央研究院

宋金寿

## 马列学院与马列著作的编译

1938年5月5日，即马克思诞辰120周年纪念日，由洛甫等发起在延安成立了一所专门从事马列主义学习、研究和宣传的干部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简称马列学院。成立马列学院的目的是要继承马克思开创的事业，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的理论，用以指导革命斗争实践。同时，也是提高中国共产党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需要。院长由洛甫兼任，因为洛甫兼职太多，工作忙不过来，中共中央调著名学者王学文任副院长，主持学院工作。

为适应党的理论教育的需要，学院设有马列主义、中国问题、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研究室和编译部。中共中央的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陈云和院长洛甫等经常到该院讲课或作讲演，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是在马列学院的讲演；著名学者王学文讲政治经济学、艾思奇讲哲学、杨松讲中国问题、吴亮平讲联共党史、陈昌浩讲外国史等。稍后，又成立了历史研究室，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任主任，并主持编写《中国通史》。

马列学院培养具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的理论工作干部。因此，进入马列学院学习的学员，必须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一定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础，一般是在中央党校，或者抗大，或陕北公学等干部学校学习过的学员，而且还要经过考试，考试不及格者，不能入学。所以，马列学院的理论学习空气特别浓，一些懂得外



国语的名流学者特别受人尊敬，学员们的学习也特别努力。

马列学院除了培养具有较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理论工作干部以外，还从事马列著作的翻译和编辑工作。在马列学院成立时，就成立了编译部，主任由洛甫兼任。洛甫十分重视马列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工作。他亲自主持，并抽调既精通外语，又有一定马列主义理论基础的同志到编译部从事马列著作的翻译和编辑工作。编译部的主要成员有：何锡麟、柯柏年、王实味、王学文、吴亮平、张仲实、景林、赵非克、陈伯达、朱仲芷、陈洁、邓止戈等。这个编译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编译马列著作的专门机构。

编译部的主要任务是编译《马恩丛书》和《列宁选集》，以及斯大林的著作等。编译的任务很重，要求每人每天译1000字，全年36万字。当时翻译条件极差，缺乏起码的参考资料，也没有顶用的词典。搞英文翻译工作，只有何锡麟带来的一本《综合英汉大词典》，勉强应付；搞德文翻译的，资料更缺，词典都没有，完成每天1000字的任务十分困难。但是，大家十分努力，工作得很出色。翻译出版的《马恩丛书》计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党宣言》（本书陈望道等已翻译过，但当时延安没有版本，只好重新译）、《法兰西内战》、《政治经济学论丛》、《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资本论〉提纲》、《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阶级斗争》、《马恩通讯选集》等12种；《列宁选集》有：《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20卷。总计翻译成书的文字共几百万字。

这些马列著作，先后由延安解放社出版，不仅在延安和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发行，而且还在大后方的重庆和沦陷区的上海等地发行，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还在继续出版发行，并成为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的基础之一，对于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起了重要作用。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是肯定的。他说，“近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书籍翻译的多了,读的人也多了。这是很好的事。”<sup>①</sup>但是,这个编译局随着马列学院的改组被撤销了,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基本上停止。后来,毛泽东发现这是一个损失,为此于1942年9月15日写信给何凯丰,提出“整风完后,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局并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我想亮平在翻译方面曾有功绩,最好还是他主持编译部,不知你意如何?不知他自己愿干否?为全党着想,与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译工作,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sup>②</sup>正因为翻译工作是“功德无量的”,马列学院编译部工作得到了重视,编译部的工作人员受到了特别的尊敬。

##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和 马列学院的改组

由于当时党内的教条主义残余仍然严重地存在,王明还被当作“理论家”,经常登上讲坛,宣传他的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的主张,而且还在马列学院作报告,讲“两条路线底斗争”,直至在延安出版他在1931年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因此,在马列学院的教学和研究中,也确实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等现象。例如,马列学院最年轻的学员田家英,当时只有十六七岁,很聪明,记忆好,确能背诵《资本论》的一些章节,但不知道如何应用。这种现象,不仅在马列学院存在,在其他干部学校中也有。若不改变,危害相当地大。

为了克服延安干部教育中的这种教条主义的偏向,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3页。

<sup>②</sup>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页。

毛泽东在分析延安干部教育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偏向以后，向全党提出了“改造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建议，要求全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聚集人才，研究近百年的中国史；在在职干部教育和干部学校教育中，确立以研究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等三大任务，以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和实际应用能力。

在毛泽东的报告以后，中共中央于1941年7月对马列学院进行改组。将马列学院一分为三：一小部分去杨家岭中央政治研究室（1941年7月7日成立，毛泽东兼主任）；一部分留下组成马列研究院；大部分不适合搞理论研究的同志分配适当的工作。

7月中旬，在延安兰家坪举行了马列研究院成立大会。毛泽东到会，并作了题为《实事求是》的报告，要求马列研究院的同志，一定要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研究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调查研究敌我友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从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主要是把教育机构改组为研究机构，由原来的研究室和教学班（分期分班教学，每期1至3个班，每班50人左右）两级组织合编为研究室一级组织，以研究为主，在研究过程中结合教学工作。这一改组的目的，在于反对原来马列学院教育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以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开展对于中国实际问题的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但当时大多数同志对此认识不足，包括当时马列研究院的领导同志，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变化不大。针对这种状况，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延安干部学校合并的问题。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指出：“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要求全党“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和研究”。并要求干部学校“进行关于了解客观情况（敌我友三方）的教育。鼓

励那些了解客观情况较多较好的同志,批评那些尚空谈不实际的同志。鼓励那些既了解情况又注意政策的同志,批评那些既不了解情况又不注意政策的同志。使这种了解情况、注意政策的风气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风气密切联系起来。在学习中反对不管实际只记条文的风气。反对将学习马列主义原理原则与了解中国社会情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互相脱节的恶劣现象。”<sup>①</sup>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党内教育方针问题。毛泽东说:我党干部的理论水平比内战时是提高了,现在干部中多读了些理论书籍,但对于理论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上还不够,对中国及世界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缺乏研究和分析。我们还没有各种问题的专家,对于许多实际问题不能下笔。延安的学校是一种概论学校,缺乏实际政策的教育。过去我们只教理论,没有教会如何运用理论,就象只教斧头本身,而没有教会如何使用斧头去做桌子。对干部教育要有一个大的改造。<sup>②</sup>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洛甫等组成委员会,研究改造学习的办法,起草有关的决定。9月8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决定马列研究院改名为中央研究院(院长洛甫,副院长范文澜),成为用马列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公开学术机关。从此,马列研究院更名为“中央研究院”。

## 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

从马列研究院到中央研究院,看起来是一次更名,实际上是一个根本性的改造。

关于中央研究院的研究机构,中共中央授权由洛甫进行规划。在机构建立过程中,“马列主义”、“中国问题”等的研究室取消了。

<sup>①</sup>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73、176页。

<sup>②</sup> 《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24页。

作为一个中国革命者，毕生所做的工作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革命中的实际问题，怎么能把“中国问题”作为一个专业来研究和学习，这主要是受教条主义的影响。“中国问题”是留学苏联时一些中国同志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等学习时开设的课程，内容比较陈旧，回到延安再设此专业，本身就是一种脱离实际。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研究室，也都把重点转到中国的实际问题上来，并把政治和经济分开，分别设立了中国政治研究室。再加上中国经济研究室、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中国教育研究室、中国文艺研究室、中国历史研究室、中国新闻研究室、国际问题研究室和俄文研究室等一共是9个研究室。除了国际问题和俄文研究室以外，都冠以“中国”两字，是表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分别决定了各自的研究方向：中国政治研究室“从事中国社会各阶级、各党派，各种政治制度及政治思想上历史的和现状的研究，培养能掌握新民主主义政治理论的理论干部”；中国经济研究室以“研究战时中国经济动态，批判一切不正确的经济思想，研究各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首先研究陕甘宁边区的经济”；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掌握革命的思想方法和文化政策”；中国教育研究室“研究创立新民主主义教育的理论和实际，并从研究中培养掌握教育理论的干部”；中国新闻研究室“从中国新闻事业的研究，培养通晓新闻事业的理论与实践，具备历史社会的具体知识，以掌握时事政治动向，及党的新闻政策，并有写作能力的新闻工作干部”；中国历史研究室“培养能掌握科学方法的历史学者”，重点研究中国近代史、农民土地问题史和民族史等<sup>①</sup>。各研究室由党的高级干部和知名的理论家担任主任，如罗迈（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任教育、新闻两个研究室主任；范文澜（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

---

<sup>①</sup> 参见《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5—283页。

史研究室主任；张如心为政治研究室主任；王思华为经济研究室主任；艾思奇为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欧阳山为中国文艺研究室主任；柯柏年为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师哲为俄文研究室主任。各研究室的成员一般分为两部分：研究员和研究生。研究员的任务是独立地进行研究工作，其中过去已有一定成就和相当的学术地位的，定为特别研究员，如历史研究室，除范文澜以外，齐燕铭和吕振羽为特别研究员。齐燕铭曾在北京的中国大学任过教师，在学术上有一定的成就；吕振羽是国民革命时期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同志，在30年代前期，就已经在中国史学研究方面卓有成就。研究生的任务是边学习边工作，开始以学习为主，逐步走向独立工作。各研究室的成员不等，有十儿人，二十儿人，甚至三四十人的。

各研究室成立以后，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从事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研究，分别制订各自的长远和近期的研究计划，进行实际调查研究和理论的创造。

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正式下发了由洛甫起草，并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决定指出，“关于马列主义的教授与学习，应坚决纠正过去不注重领会其实质而注重了解其形式，不注重应用，而注重死读的错误方向。学校当局及教员必须全力注意使学生由领会马列主义实质到把这种实质具体地应用于中国环境的学习。学生的是否真正领会（理解、认识、懂得），以学生的是否善于应用为标准。这里所说的应用，是指用马列主义精神与方法去分析中国历史与当前的具体问题，去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使学生养成这种应用的习惯，以便在他们出校之后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精神与方法去分析问题与指导实践。”这个决定还特别规定了延安各干部学校的具体目标，明确“中央研究院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sup>①</sup>。依据中共中央决定的精

---

<sup>①</sup>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60、258页。

神,中央研究院在研究工作中,更加注重了马列主义在实践中的应用。中央研究院院长洛甫亲自组织调查团,率队到陕甘宁边区的神府(今神木、府谷)、米脂、绥德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兴县作农村调查研究,从1942年1月26日出发,历时一年零五个月,于1943年3月3日始返延安。在调查研究中,洛甫亲自主持各种调查会,长时间地访问农民、基层干部,和不同阶级的各种人物谈话,大量地收集和核算有关地租、商业、高利贷等各种历史帐薄,查阅了大量的契约、分单、收据、家谱、碑记等文字资料,并对所有这些资料进行了细致周密的分析和综合研究,写出了19篇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调查报告,如《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等在延安由解放社出版。洛甫在回延安后,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时,在自己写的《出发归来记》中说,“这次出发,从调查研究中得来的一些材料,一些具体知识,当然就是我一年来工作的结果。但最重要的,还不在于这些。最重要的,还在于我最后认识到:我以后有向着接触实际,联系群众的方向不断努力的必要,像我在上边所说的。其次,还在于我实际开始使用了马列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了一下中国的实际。不容讳言,因为我是开始学着射箭,所以我感觉得我的箭术很是生疏。但每射一次,比着上次总觉得要熟练些。求得射箭术的进步,除实际练习外,是没有其他方法的。一次二次是射不好的,必须几百次、几千次地射下去,才能射得更加熟练些,射得更加正确些”<sup>①</sup>。

在洛甫亲自率团到农村进行调查前后,中央研究院各研究室分别组织小型调查团深入边区各地进行调查研究,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和文艺研究室抽调10多人组团深入到延安县的姚店区作边区民主政权建设调查等。

经过全院各研究室的共同努力,开始出了一批理论成果:历史研究室范文澜主持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上册);文化思想研究室选编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教育研究室对梁漱溟的乡村建

---

<sup>①</sup> 《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41页。

设运动、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促进会、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等作了初步的研究与评估；文艺研究室写了《中国新文学史提纲》，并在延安《解放日报》等刊物发表了一批既有一定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又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文章。

在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中央研究院曾一度被作为“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受到了冲击，研究工作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1943年5月，中央研究院改组为中央党校三部，从而结束了它作为延安最高学府的历史。



# 高岗发难与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召开

林 蕴 晖

1953年，中共党内高层发生了高岗、饶漱石事件。关于这一事件的大体经过和处理过程，已为人们熟知，唯高岗向党发难的背景，七届四中全会解决高岗、饶漱石问题的最初方针，过去一般史书甚少涉及，本文就这些问题作一介绍。

## 1951年高岗得了“两分”

东北全境解放以后，作为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的高岗，在对待私人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土改后农村新发展起来的富裕农民的政策上，基本的思想倾向是“左”的。1949年5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起草了《中央关于对民族资本家政策问题致东北局电》，指出那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反的”。“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1950年初，刘少奇在同安子文的谈话中，对东北局部分领导那种把农村中新发展起来的，拥有三马一犁的中农当作新富农加以限制的做法，也作了批评。

到1951年，在两个重大问题上中共中央内部出现了不同意见。结局是：刘少奇的意见被否定，高岗的意见得到了肯定。

### **第一个问题：关于工会工作的方针。**

建国以后不久，如何正确处理工会同党、政府、工人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就被提出来了。1950年7月，邓子恢在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议上作报告，鉴于当时工会工作中已经出现脱离工人群

众的情况, 公营工厂中有些工会组织不重视维护工人群众的正当利益, 放弃了自己应有的独立的主动的工作等问题, 邓子恢指出, 国营企业的工会工作者与企业行政管理人员, 政府工作人员之间, 在“基本立场”一致即双方都是为国家, 同时也是为了工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样的前提下, 在“具体立场”上仍有所区别。他们各自的工作岗位、任务不同。即使在公营工厂中, 工会仍有“代表工人的利益”, “保护工人群众日常切身利益”的基本任务, 而不能脱离这个基本任务, 形成为“厂方的附属品”。当厂方某些规定或措施对工人不利时, 工会工作者就应该反映工人的意见, 同厂方商量修改完善。邓子恢的意见曾于7月29日在中南局关于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情况的电报中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8月4日, 刘少奇为此拟稿批转邓的报告, 批语中说: “这个报告很好”, 望“照邓子恢同志的作法, 在最近三个月内认真地检讨一次工会工作并向中央作一次报告”。这个批语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李立三圈阅后发了下去。同日, 《工人日报》登载了邓子恢《在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上的报告》。全国总工会通知全国工会干部学习。9月4日, 《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邓文。

同年12月22日, 毛泽东在西北局关于职工运动的报告上批示说: 四中全会一定要讨论工会工作, 并且以管好工厂工会工作为中心来研究, 因此要组织一个委员会, 起草一个决议案。过去工会工作是有成绩的, 成绩很大, 问题甚多。有的工厂企业中, 党、工会与群众关系不正常。如群众正在谈话, 党员一去便不谈了, 群众害怕党员, 怕党员汇报, 甚至有个别地方把党员看成“特务”, 这是一种脱离群众的现象。工会也是如此, 脱离群众的现象很多。因此, 全党都要注意这个问题, 各中央局, 分局, 省市委要专门讨论工会工作, 不是小规模地讨论, 要大规模地讨论。

高岗对邓子恢的上述观点持否定态度。1951年4月, 他主持写出了《论公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的文章, 准备作为《东北日报》社论发表。该文对邓子恢的观点提出了针锋相对的

批评。文章说，国营工厂中没有阶级剥削，没有阶级矛盾，行政与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行政与工会没有立场的不同。认为“具体立场不同”的说法，第一是模糊了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第二是模糊了国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模糊了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在本质上的区别。高岗于4月22日写信请毛泽东审改此文，并请示“可否在报上发表”。4月29日，胡乔木就此事向毛泽东和刘少奇写信报告，认为“具体立场不同”的说法，“确有不圆满的地方”，但高文“用正面批驳的方法也不适宜”；认为“最好指出所以如此是有原因的，工会更应当重视工人的直接福利，许多工会不重视是不对的”。5月10日，刘少奇在胡乔木的信上批示：“同意高岗同志文章暂不发表，待四中全会讨论此问题时，当面谈清楚。高文可送邓子恢同志一阅。”5月16日，刘少奇又写信给高岗说：“关于工厂与工会立场问题你写的文章，我已看过，已送交主席，可能主席尚未来得及看。我的意见以为四中全会即将召开并要讨论这个问题，子恢同志亦来，可以在那时加以讨论，因此，你的文章暂时以不发表为好。”

1951年10月2日，全国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李立三写了《关于在工会工作中发生争论的问题的意见向毛主席的报告》。报告说：有同志认为在国营企业中公私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无所矛盾，甚至认为“公私兼顾”的政策不适用国营企业。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国营企业中公私利益是基本一致的，但在有关工人生活和劳动条件等问题上是存有矛盾的，但这种矛盾的性质是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因而是可以而且应当用协调的方法，即公私兼顾的方法来求得解决的。李立三明确表示：“我个人是同意后一种意见的。我觉得公私关系问题，不仅在目前国营企业中，而且在将来社会主义时期各种对内政策问题上也还是一个主要问题，否认‘公私兼顾’的原则可以运用到国营企业中的意见，可能是不妥当的。”从收入《刘少奇选集》下卷的《国营工厂内部的矛盾和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一文的内容来看，刘少奇同李立三的意见是基本一致的。

不久，李立三的意见被否定。毛泽东在中央一个文件上批示说：工会工作中有严重错误。11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由刘少奇、李富春、彭真、赖若愚、李立三、刘宁一组成全国总工会党组干事会，负责指导全总党组工作（刘少奇外出休假，实际由李富春主持）。12月13日至22日，李富春主持全总党组举行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全国总工会工作的决议》。认为李立三，第一，在工会工作的根本方针问题上犯有狭隘经济主义的错误；第二，在工会和党的关系问题犯有严重的工团主义错误；第三，在工作方法上犯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事务主义甚至家长制的错误等。并指出这些错误，“是严重的原则错误”，“表现了社会民主党的倾向”，“是完全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对于职工运动和我们党的事业极其有害的”。于是，这场关于工会工作方针的争论，就以李立三被解除全国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而告结束。实际就是否定了刘少奇的意见，肯定了高岗的意见。1954年2月，刘少奇在七届四中全会作的自我批评中说，对于李立三在工会工作中的“错误”，“我是应该负一定的责任的”。这就使高岗在政治上得了“一分”。

### **第二个问题：关于农业互助合作。**

土改以后，我国的个体农业要向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党内意见是一致的。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劳动互助的形式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具有的积极作用，党内也无异议。但对农村基本中农化以后，是否应当允许少数富裕中农冒尖，以及在手工劳动的基础上是否仅通过组织合作社就能实现社会主义，在党内却有着明显的不同看法。

具有代表性的意见之一是1951年4月17日中共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报告认为：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提出：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为此，应该把“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这两个进步

因素,在互助组织中逐步地增强,使互助组织大大地前进一步,以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

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刘少奇则持另一种意见:

5月4日,华北局对山西省委的意见作了批复,指出:省委“抓紧对互助组领导,注意研究发生的问题是对的”。但是提出“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办法来逐渐动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目前“提高与巩固互助组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充实互助组的生产内容,以满足农民进一步发展生产的要求,而不是逐渐动摇私有制的问题。这一点必须从原则上彻底搞清楚”。华北局书记薄一波,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30周年发表的《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一文中进一步作了说明。他说,中国将来一定要达到农业集体化(即集体农场),如果没有农业集体化,就不会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就不能最后地解放农民,而要达到农业集体化,还必须发展以国有企业为基础的强大的工业,没有强大的国有化的工业,就不能有全体规模的农业集体化。因此,“所谓‘在互助组内逐渐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财产,来达到农业集体化’,这样的农业集体化道路,是一种完全的空想,因为目前的互助组是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它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到集体农场,更不能由这样的道路在全体规模上使农业集体化”。

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明确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战略设想。3月30日,毛泽东在一则批语中指示刘少奇,请他将中央关于“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思想”,向正在举行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与会人员讲一下,“使他们有所准备”<sup>①</sup>。5月7日,刘少奇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报告,对中央关于“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基本思路作了说明。他

---

<sup>①</sup>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06页。

说：三年准备之后，我们来一个十年经济计划。到10年以后，新中国的面貌就要改变，那时我们将不但有强大的农业，而且有我们自己强大的工业，使中国变成一个富足的国家。到那时，我们的国家才可以考虑到社会主义去的问题。据此他指出：有的同志现在就想从实际上来提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山西省委在农村里边提出要组织农业合作社（苏联叫共耕社）。这种合作社也是初步的，十家，八家，三十家，二十家的农民组织起来，土地，牲畜，农具共同使用。当然这种合作就是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可是单用这一种十家，八家，组织的农业合作社、互助组的办法，使我们中国的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化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实现不了的。我们中国党内有很大一部分同志存有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要纠正，因为仅仅依靠农村的条件不能搞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要依靠工业<sup>①</sup>。7月3日，刘少奇将山西省委的报告，作为党内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例子，要中央办公厅印发马列学院学员，各中央和中央局。刘少奇在批语中指出：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经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于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了，并且去加以阻止或避免。并且认为山西省委指出的：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的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sup>②</sup>。

在党内关于中国农村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的两种不同意见中，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关于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制基础的观点，并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

---

<sup>①</sup>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184页。

<sup>②</sup>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33页。

意见<sup>①</sup>。同时，毛指示陈伯达召集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起草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

就在这重要时刻，高岗于10月14日向毛泽东送上了《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报告说：东北农村，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经过三年多发展生产的运动，农村经济获得了普遍的上升。经济上升的农户约占总农户的95%。其中上升到中农水平的约占60—70%；较土改时有显著改善的约占25—30%；上升户中约有20%已成为富裕中农。新富农发展较慢，据各省中发展最多的黑龙江省统计，约占农户的0.8%。“东北农村经济普遍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经过土地改革、摧毁了地主与旧富农的经济之后，党就将贯彻毛主席关于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方针，作为农村工作的重点，并在组织农民生产与交换方面积极推行了合作互助与供销合作政策，以便有步骤地改造农业经济，使之由个体逐步向着集体发展。”当前组织起来的合作互助组，主要有四种形式：插犋组；农业三大季换工组；农业，副业结合，长年不散，比较定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型的，即有一定数量的公共财产，并进行集体劳动的。根据东北地区的经验，报告认为合作互助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由季节性的、单纯农业生产的小型合作互助组（第一种形式），到农业三大季的插犋换工（第二种形式），再到农、副业结合的常年互助（第三种形式），然后到土地入股，集体耕种，或共同占有有一定数量的公共生产工具，共同生产的农业合作社形式（第四种形式）。”报告列举合作互助组的作用主要有三点：第一，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多打了粮食，扩大了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推广了新式农具的使用范围，容易使农业逐渐走向计划性的生产，增加农民收入；第二，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普遍上升，使农民破产下降的可能性大为减少，农村的阶级分化也小；第三，教育组织了农民，起了逐渐地改造

---

<sup>①</sup> 薄一波：《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

农村经济,改造农民的思想与生活习惯的作用。在对合作互助组的指导方针上,报告明确表示:“继续坚持贯彻毛主席屡次指示的方针,即根据群众的自愿与需要,加以积极扶助与发展,并逐步由低级引向到较高级的形式。”强调要有重点地发展农业合作社,同时力争各类形式的合作互助组能够做出比较优良的成绩,来积极动员与吸引“单干”的农户自愿加入各种类型的合作互助组。

毛泽东看了高岗的报告以后,于10月17日将此件批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并嘱杨尚昆“印成一个小册子,分送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同时发给中央各部门,中央政府各党组,此次到中央会议各同志及到全国委员会的各共产党员。”毛泽东还同时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批语,充分肯定了高岗的报告。批语说:“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的党委都应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同时不要轻视和排斥不愿参加这个运动的个体农民。”这样,高岗就又得了“一分”。

### 在批评“新税制”中高岗 组成了“经济内阁”

1952年12月31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颁布《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和《商品流通税试行办法》,于1953年1月11日在全国实行。新税制规定:“应税货物,一律按国营公司批发牌价核税;加工,定货,包销者同。”也就是不分公营,私营,一律平等纳税。

毛泽东认为,新税制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是政务院在组织上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根据他的提议,中共中央于1953年3月10日作出了《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



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决定尖锐地指出: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为此决定:

第一,政府各部门对于中央的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情况及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均须定期地和及时地向中央报告或请示,以便能取得中央经常的直接的领导。

第二,为了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的领导,以及便于政府各部门中的党的领导人员能够有组织地,统一地领导其所在部门的党员,贯彻中央的各项政策、决议和指示的执行,今后政府各部门的党组工作必须加强,并应直接接受中央的领导。因此,现在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1950年1月9日建立。其职责是,统一领导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中共党组的总党委。由周恩来担任书记——引者注)已无存在的必要,应即撤销。

第三,今后政务院各委和不属各委的其他政府部门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工作均应分别向中央请示报告,如属两个部门以上而又不同隶于一委的事项,则经由政务院负责同志向中央请示报告。如系主席直接交办的事项,应直接向主席请示报告。

如应向中央请示报告的事项而竟未向中央提出,则最后经手的政府负责同志应负主要责任。

为了更好地作到现在政府工作中的各领导同志直接向中央负责,并加重其责任,特规定明确的分工如下:

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

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

财经工作,由陈云、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曾山、贾拓夫、叶季壮负责;

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

外交工作(包括对外贸易、对外经济、文化联络和侨务工作),

由周恩来负责；

其他不属于前述五个范围的工作(包括监察、民族、人事工作等),由邓小平负责。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5月15日,政务院发出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财政经济部门的工作领导的通知》。对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财政经济部门的工作领导,重新作了分工。即:

(一)所属的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部和纺织部,划归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

(二)所属的铁路、交通和邮电部,划归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领导;

(三)所属的农业、林业和水利部,划归财委副主任邓子恢领导;

(四)所属的劳动部,划归计委委员饶漱石领导;

(五)所属的财政、粮食、商业、对外贸易和人民银行,仍属财委主任陈云领导;在陈云养病期间,由副主任薄一波代理。

中央作出的上述决定和分工,无疑是对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书记、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严重批评。根据这个决定和分工,周恩来对政务院的工作除必须担负全部责任外,实际上他所直接领导的只剩下一个外事口了。与之同时,中央决定把政务院20个部中的8个主要工业部划归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这不能不认为是对高岗的信任和重用。而这同他1951年得的“两分”,显然是有着直接关联的。正因为此,高岗自认为已经组织了“经济内阁”,并准备进一步跃登龙门了。

### 毛泽东批评“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

在1953年6月1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向党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建议。同时指出: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

质的转变,还在继续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的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毛泽东批评说,右倾的表现有这样三句话:“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是不妥当的。“确保私有财产”。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sup>①</sup>。

毛泽东在8月12日全国财经会议上的讲话<sup>②</sup>,再次对“新税制”等问题作了尖锐的批评,并提出:“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他说:对于财经工作中的错误,从去年十二月薄一波同志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开始,到这次会议,都给了严肃的批评。说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他指出:过渡时期,是向社会主义发展,还是向资本主义发展?按照党的总路线,是要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要经过相当长期的斗争的。新税制的错误跟张子善的问题不同,是思想问题,是离开了党的总路线的问题。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他强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

毛泽东还对刘少奇、薄一波等认为在没有强大的国有工业的支援,企图经过互助合作,就能把个体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是一种完全的空想”的观点,作了尖锐的批评,说这是违反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他还强调要反对所谓“分散主义”。

① 毛泽东:《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1953年6月15日)。

② 毛泽东:《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1953年8月12日)。

## 高岗急于发难

高岗急于在1953年夏季举行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和会后连续向周恩来、刘少奇迭次发难，显然是对毛泽东的上述批评作了错误的判断。在他看来，毛泽东把“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问题提到“离开总路线”的高度进行批评，证明周、刘在政治上犯了“路线错误”。联系在此以前在组织分工上的重要调整，他认为周恩来、刘少奇已“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而他自认为是为毛泽东“信任”，并越来越受到“重用”的一颗上升的“明星”，于是企图趁机一举将周、刘拱倒，取而代之。

1953年6月开始举行的全国财经会议，主要议题是关于五年计划、财政、民族资产阶级三个问题，但在讨论中，批评新税制实际上成了会议的中心问题。高岗看到对新税制意见较多，就鼓动一些同志“放炮”，并上网说这是路线错误，是两条路线斗争。据后来陶铸揭发：财经会议开过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后，高岗就请他到家里吃饭，在饭桌上高岗对他说，这次会议的方针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希望大家能勇敢发言”，并要他放头炮。陶铸没有答应。实际上，高岗这样做完全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批薄”是为了“射刘”，目的在推倒刘少奇。这一点，高岗曾直言不讳的对人说。“我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不讲话则已，要讲就要挖少奇的老底。”所以他在发言中，采取移花接木的手法，把刘少奇曾经说过的一些话，比如1947年土改中说过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1949年在天津讲话中的一些观点，1951年有关山西互助合作批语中的观点等等，统统按到薄一波的头上加以批判，以暗示刘少奇犯有一贯的，系统的路线错误<sup>①</sup>。

---

<sup>①</sup>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41—242页。

为了推倒刘少奇，高岗公然散布“军党论”（即所谓“党是军队创造的”）。他说，党的历史上有“二元论”，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修改，决议中关于刘少奇是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的提法不对头，需要从新作出结论。他别有用心地把中共党的干部分成两部分，说毛泽东代表红区，刘少奇代表白区，现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的权利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们手里，应当彻底改组。并煽动说现在白区干部要篡夺党了。

彭德怀后来也揭发说，在1953年12月里，军委准备召开一次军队系统的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讨论军委准备的报告草稿时，高岗说这个报告草稿没有思想性。毛泽东当即指示：“以彭为主，请高加以修改。”当彭为修改报告草稿去找高时，高就指着桌上的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华北土改工作会议的讲话和在延安的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等讲话记录，问彭看过这些文件没有？彭说，没有看过，现在的文件实在太多了。高一再要彭看看这些文件。第二天，高到彭的住处。彭德怀说：他在这里又提起少奇同志来，高说：“刘少奇这个摊摊在七大时就安排好了，说什么刘为白区的领袖，这就是说毛主席只是苏区和红军的领袖，你看这样还像话吗？他把某某安在华北，某某安在华东，某某安在东北，有朝一日他就要篡党，取毛而代之。”彭说：不会的，有毛主席在，谁也篡不了党。高说：毛主席去重庆谈判回延安后，身体很不好，那时真危险啊！彭驳斥说：少奇同志对毛主席是绝对忠诚的。并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少奇同志的可靠。高岗却说：此一时，彼一时，难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讲话也是主席的意思吗？彭说那次讲话，少奇同志是“走了一点火”。高岗又继续说：天津讲话站在资本家那边去了，难道也是主席的意思吗？也是“走了一点火”吗？妄图煽动彭跟他反刘。

当高岗得悉中央正在考虑国家最高行政机关是否采取部长会议的形式，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时，更是迫不及待地多方活动起来。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放

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sup>①</sup>。

在高岗积极进行反对刘、周的篡权活动中,饶漱石密切进行配合,尤其是在1953年9至10月,党中央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他故意夸大中央组织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大批长期主持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安子文,施展“讨安伐刘”的政治诡计。

### 毛泽东笑谈历史掌故“秦灭楚”

对高岗、饶漱石从全国财经会议到组织工作会议一系列不正常举动,毛泽东逐步有所察觉,引起他对党内团结的关注。他在1953年10月23日审阅刘少奇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上的讲话稿时,专门加了一段“全党团结起来实现总路线”的话。即:现在是全党团结起来认真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我们要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一个工业国,我们要对现存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我们要在大约15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我们的组织工作就要好好地为此总路线而服务,我相信同志们是高兴并且是能够担负这个任务的。针对高、饶散布的所谓“圈圈”、“宗派”问题,毛泽东在向各大区负责同志的讲话中,回顾了大革命时期和土地改革时期党和军队干部成长的情况,指出:中级干部北方人多,高级干部南方人多,是历史形成的。这是因为,在早期南方革命运动发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293页。

展较为普遍，后来革命运动转到北方来了。现在，不管南方干部，北方干部，中级干部，高级干部，都不要有“圈圈”，要消灭“圈圈”。大家都要重视党的团结，消除山头。

1953年12月4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揭露了高岗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指出，高岗他们在“刮一种风，烧一种火”，叫做“刮阴风，烧阴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阳风，灭掉阳火，打倒一批人”。据此，毛泽东提出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建议。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这个建议，决定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当日，毛泽东带着一个宪法起草小组南下杭州。

1954年1月3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提沃西安和驻华大使尤金时，在谈话中暗示了高岗错误的反党性质。据当时担任翻译的师哲回忆，毛泽东说：我们党内，或许也是国内要出乱子了。自然，我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将来情况如何变化，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秦就是他们陕西（说着，毛泽东又用手指了指师哲），楚就是湖南（说着，毛泽东又用手指了指自己）。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么样？还要等等看<sup>①</sup>。

即便这样，毛泽东对高岗、饶漱石的基本方针，仍是团结的方针，等待着他们向中央作自我批评。

### 在杭州确定的开会方针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决定起草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的时候，对于是否需要召开一次中央全会讨论通过，并未作议论。当刘少奇在北京主持起草好决议草案的初稿送毛泽东审改时，毛泽东才又提出召开全会的动议，并对中央全会的议程和开会方针提出了明确

<sup>①</sup> 《文汇报书周报》1993年2月27日第4版。

的具体意见。

1954年1月7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和中央书记处各同志<sup>①</sup>。信中说:决议草案已作了修改,使之有根据些和更明确些。参加修改的,有在这里的几位同志<sup>②</sup>。林彪同志亦表示同意。接着,他建议: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中委大多数在京,不在京的是少数,召集甚易,加上若干负重要工作责任的同志参加会议。此议是否可行,请你们考虑。如召开全会,时间以在一月下旬为宜。议程可有三个:(一)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三)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报告请刘少奇同志做,事先写好,有四五千字就够了。……此报告有三五天功夫即可写成,如时间许可,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如定于一月廿五日开会,则时间完全来得及。

毛泽东还交待说:全会应发一个简单公报,将三项议程公布就可以了,其它都可不公布。“关于第三项议程,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

同日,毛泽东另外又专门写了一封给刘少奇个人的信<sup>③</sup>。毛泽东说: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

在毛泽东关于召开一次中央全会的建议得到中央书记处同意后,毛于1月18日致电刘少奇并书记处各同志,建议将决议草案

---

<sup>①</sup>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32—433页。

<sup>②</sup> 指跟随毛泽东在杭州起草宪法的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

<sup>③</sup>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33页。



在会前发到会者征求意见<sup>①</sup>。毛说：中央全会既定本月三十日开会，还有十几天时间，为使在各地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及参加会议的同志事先有所准备起见，建议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即日用电报发给他们阅看，如有因病因事不能到会的，请他用电报表示意见。同时可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会的意见，以供全会参考。

高岗得知中央决定召开四中全会的信息后，当即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到杭州面见毛。为此，毛于1月22日，专就四中全会的开会方针致电刘少奇<sup>②</sup>。电称：杨尚昆同志到此，收到所需文件，并收到高岗同志一信。高岗同志在信里说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这里和我商量这件事。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关于四中全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待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后一点我在一月七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尚昆留此几天即回北京。此电请送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复信了。

## 刘少奇的自我批评

毛泽东发现高岗在财经会议期间对刘少奇的“错误”进行攻击后，曾要高岗找刘少奇直接谈清问题。但高岗不予理睬。刘少奇则两次主动找高岗谈话，并对工作中的缺点作了诚恳的检讨。后来，

<sup>①</sup>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39页。

<sup>②</sup>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40—441页。

针对高、饶诬告刘少奇有“圈圈”，毛泽东指出，说少奇同志有圈圈，是错误的说法。毛还说，少奇同志是大公无私的，是正派的，他决不是那种搞宗派的人。

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了诚恳又不失分寸的自我批评，并对某些问题作了说明。主要内容有：

（一）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

刘少奇说：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我曾有过一种想法在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要对我国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要实行农业集体化，对于这个基本方向，我是没有怀疑过的。因此，我主张向农民宣传社会主义，要经常地向农民说明：仅仅实行土地改革还不能最后地解放农民，只有实行社会主义才能使农民最后地获得解放，免于贫困并富裕起来。在目前要广泛地发展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要限制富农经济，对将来要普遍地组织集体农场和消灭富农经济，对于这些，我的观点都是明确的。但是，我有过一种想法，就是我以为还要等一个时候才能在我国农村中大量地，普遍地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而没有想到立即就可以大量地组织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由此逐步地发展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集体农场。同时，在目前的劳动互助组与将来的集体农场之间没有抓住以土地入股的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组织形式，作为由互助组过渡到集体农场的十分重要的中间过渡形式，因而，就以为互助组不能过渡到集体农场，而把二者看成在组织上是没有多少联系的两回事。因为有了这种想法，所以在1950年1月与东北个别同志谈到农村互助合作问题时，我有一些话是说得不妥当的。在1951年春，我赞成华北局在个别地方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但不赞成推广。同年7月间我批评了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文件，并在向马列学院第一期毕业生讲话时，也说到了这个批评。应该说，我这个批评是不正确的，而山西省委的意见则基本上是正确的。……在1951年秋，中央讨论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问题后，由于毛泽东同志

的指示得到了改正，我也就抛弃了这种想法。

(二)1947年我主持的全国土地会议，确定了普遍实行分配土地的原则，制定了土地法大纲，并提出了整党的方针。这个土地法大纲和整党方针，是经过党中央的修正和批准的。全国土地会议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这个会议有重大的缺点，这就是没有对于农村的阶级分析做出恰当的决定和没有能够制定一个正确的切实可行的详细的没收分配土地的办法，同时对于错误倾向的批判不够全面。在会议上着重批评了党内反对地主不坚决以及同情、可怜、庇护地主的右倾错误，这是完全必要的，并从此结束了这方面的错误。对于当时已经发生的一些“左”倾错误，虽然也做了批评，但这种批评是不充分的，没有系统的，因而也就不能够认真地去堵塞有些地方的“左”倾错误的发生和发展。……直到1947年12月在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1948年中央重新发表1933年怎样分析阶级的文件和任弼时同志的文章后，各地土地改革才逐步完全纳入正轨。我在当时没有能够把指导土地改革这样一个严重的任务完全正确地担当起来。

(三)1946年2月1日，在旧政协会议开过会，中央发出了一个指示，说旧政协决议付诸实施，中国从此走上和平民主阶段。同时向八路军、新四军和各解放区提出练兵、减租和生产三大中心工作，并指出“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万一被破坏。”在这个指示中所谓“和平民主阶段”是属于一种对时局的估计。而关于练兵、减租和生产三大中心工作的规定，则是对于我们的革命起实际作用的性质的东西。对于和平可能性的估计只是一方面，而关于练兵、减租和生产这些中心工作的指示，则在于我们可和可战，使我们在任何时局变化的场合下，都能够有恃而无恐。对于这个文件，我想是应该作这样的分析的。……中央通过这个指示，是我起草的，我曾经根据这个指示在干部会上作过一个报告，在报告中有些话讲得不妥当，应当纠正。

(四)1949年春中央派我去天津研究和帮助天津市委的工作，

我对天津当时的工作说过许多话，曾经批评了当时某些对资产阶级的“左”倾情绪，虽原则上没有错误，但其中有些话是说得不妥当的。

从刘少奇的上述自我批评，不难看出：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撇开问题本身的是非不谈，从组织上说，在中央没有作出决议以前，党员持有不同认识和意见是许可的，说不上有什么错误；1947年老区土改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刘少奇负有指导上的责任，但属工作指导上的错误；“和平民主新阶段”、“天津讲话”不存在什么错误。值得指出的是“剥削有功”一说。其实，刘少奇这个话是有前提的，即在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的领导下。其道理如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中说的，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在客观上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这与其说是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为有利。因为只有工业生产的极大发展，才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建立、巩固和发展。这是推不倒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当然，从用语来说，换个词，对我们这个以出身小生产的党员占优势的党来说，可能更易被大家接受。

## 邓小平一席公道话

在七届四中全会上，邓小平针对高岗攻击刘少奇所散布的流言蜚语，作了尖锐的批评，对刘少奇为顾全大局在全会上作的自我批评，说了一席公道话<sup>①</sup>。他说：

我们常常闻到这样一些味道，例如有的人把某些人或者把他自己夸大到与实际情况极不相称的地步，不愿意受检查，不愿意受批评，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空气稀薄，不注意集体领导，不注意团结，对犯错误的同志不是采取治病救人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204—206页。

的态度,不大照顾别的地区,别的部门等等。尤其严重的是,有些同志不注意维护中央的威信,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批评有些已经发展到党组织所不能允许的程度。毛泽东同志提倡对党的任何负责同志(毛泽东同志经常说,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批评,但是这种批评必需根据党的原则在一定场合下进行,或者向他本人提出。这样的批评是应该的,不可少的。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过去经常讲到这一点,他们是欢迎别人批评的。但是不能允许这样的言论发展到党的组织所不能允许的程度。他明确指出:我们常常遇到,某些同志对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的不正确的言论,常常是不经过组织,不合乎组织原则的。全国财经会议以来,对少奇同志的言论较多,有些是很不适当的。我认为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而我所听到的一些传说,就不大像是批评,有些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或者是夸大其词的,有的简直是一些流言蜚语,无稽之谈。

邓小平着重指出:比如今天少奇同志在自我批评里讲到的对资产阶级的问題,就与我听到的那些流言不同,对资产阶级问題,虽然我没有见到1949年初少奇同志在天津讲话的原文,但是据我所听到的,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中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呢?那时天下还没有定,半个中国还未解放。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已经发生了“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渡江后,就是本着中央的精神,抱着宁右勿“左”的态度去接管城市的,因为右充其量丧失几个月的时间,而“左”就不晓得要受多大的损失,而且是难以纠正的。所以,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个讲话主要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而我所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的。

事隔40年之后,重读邓小平这一席话,可以看出,他在这里不

只是对刘少奇的天津讲话作了客观的公正评价,而且阐明了一条真理,即:共产党掌握全国政权以后,各项政策的正确,错误,利弊得失,其基本立足点,就是看是否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当时,突出反映在是否有利于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的工业生产。遗憾的是,这一点在当时远未成为党内的共识。

## 对高岗、饶漱石的结论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是以通过《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载入史册的。决议不点名地批评了高岗、饶漱石,向全党,特别是中央委员和党的高级干部,强调了增强和维护党的团结的极端重要性。重申党的团结的重要保证之一是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严格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决议明确规定:“全党高级干部的重要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意见应该经常向所属的党的组织报告和反映,其关系特别重大者则应直接向党中央的政治局,书记处或中央主席报告和反映;如果避开党组织和避开中央来进行个人的或小集团的政治活动,避开党组织和避开中央来散布个人的或小集团的政治意见,这在党内就是一种非法活动,就是违反党的纪律,破坏党的团结的活动,就必须加以反对和禁止。”

这就不只重申了党的纪律,而且划清了党内组织是非的界限。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然而,在这次全会上,尽管对高岗、饶漱石采取了团结的方针,但高、饶却执迷不悟,不作深刻检讨,痛改前非。为全面查清他们的反党阴谋活动,中央书记处在2月中旬分别召开了关于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的两个座谈会。经毛泽东修改批准,2月25日,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作总结发言说:“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于当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泄气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

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面。”“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高岗在事实面前拒不悔改，于1954年8月17日再次服安眠药自杀身亡。饶漱石也拒不彻底认错。

1955年3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议结论说：高岗、饶漱石反党活动的特点“就是他们始终没有在任何党的组织或任何党的会议上或公众中公开提出过任何反对党中央的纲领，他们的唯一纲领就是以阴谋手段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利”。遂决议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

1980年，在拨乱反正中邓小平谈到高岗问题时说：“揭露高岗的问题没有错。”“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总之，高岗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sup>①</sup>

值得指出的是，过去说高岗、饶漱石形成了一个反党联盟；说他们是“适应了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的愿望”，“实际上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后来又说这是一次“路线斗争”。现在看来，这些论断，都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的。饶漱石尽管与高岗分裂党的活动作了积极配合，但只是两个人的个人行为，并不存在一个以他们两人为首脑的什么反党联盟。高、饶当时搞的完全是一种阴谋活动，根本没有提出过他们的什么政治路线，更谈不上与当时的国内外阶级斗争有什么联系。所以，这些说法是应该加以澄清的。

---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293—294页。

## 40 余年后的评说

1954 年至今,已过了 40 余个年头。对七届四中全会在历史上的地位,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一些。就组织上解决高岗问题来说,如邓小平指出的,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处理得也是正确的。全会通过的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对于防止党内出现类似高饶那样的地下宗派活动,也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但是今天看来,四中全会没有在政治思想上解决好问题,即未能如邓小平在发言中指出的,鉴别党内的思想是非,政策是非的基本点,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而不是什么超越时空的、抽象的所谓政治立场。正是在高岗攻击刘少奇的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上,全会存在偏误。

于是,事隔十几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动乱开始不久,过去高岗攻击刘少奇的“炮弹”又被重新搬了出来。1967 年 3 月,戚本禹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批判文章<sup>①</sup>中,断章取义地大肆攻击刘少奇 1949 年的“天津讲话”。诬蔑刘是“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奔走呼号”。到了 1969 年 4 月,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竟然把刘少奇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讲话和天津讲话作为“修正主义”的罪行,写进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

“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当然与七届四中全会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是,毛泽东先是要刘少奇找高岗谈清问题,继之要刘少奇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以及全会根本没有批评高岗在政治上对刘少奇的诬蔑,这就实际上确认了刘少奇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犯有“右倾错误”。从而,混淆了党内政治思想是非的界限。显然,这与“文化大革命”又是有着潜在的联系的。

---

<sup>①</sup> 《红旗》1967 年第 5 期。



#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历史回顾

唐小菊

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迄今已经 25 年了。回顾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历史，不仅仅是对直接指导了这一斗争过程的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纪念，更对于今天的对台工作和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启迪意义。

## (一)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从 1942 年初到 1945 年 5 月，中国与美、英、苏联一起为筹建联合国作了一系列准备工作。1945 年 4 月 25 日，来自全世界 50 多个国家的代表在旧金山举行会议，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院规约》。同年 6 月 25 日，与会各国代表在联合国宪章的中、法、俄、英、西班牙五种联合国正式语言文本上签了字，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也在宪章文本上签了字。同年 10 月 24 日，联合国宪章正式生效。联合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正式宣告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国际法准则和国际组织惯例中的政府继承原则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历史事实，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来继承，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机构的工

作和会议。由于美国竭力阻止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致使这一合法席位一直被台湾国民党当局窃据。其时,美国政府先是以诬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用革命手段“非法成立”和“不巩固”为借口,继而诬我为朝鲜战争中的“侵略者”,后又以所谓我“蔑视”联合国和不遵守其反华决议为借口,操纵“表决机器”,妄图长期堵我于联合国大门之外。

## (二)

新中国一成立,就把争取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提上了议事日程。对这一重大的国际斗争,周恩来是直接决策者和重要领导人,在这场斗争中表现出了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创造性、灵活性,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早在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就正式通过决议,否认国民党集团的代表出席第四届联大的资格,从而揭开了这一斗争的序幕。同年11月15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声明“国民党反动政府”已丧失了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法律的与事实的根据,“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要求联合国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11月28日,周恩来再次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联合国第四届大会主席,要求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在此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相继任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大会、安理会及联合国专门机构的代表。这就引发了在联合国中,中国究竟应由哪个政府代表的问题,即世称的“中国代表权”问题。同年11月25日,苏联在联合国第一委员会中提出“中华民国已失去大陆,无权代表中国,中国的代表权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来替代”,这是联合国首次对“中国代表权”问题发生争议。

1950年1月8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及联合国安理会各理事国代表,要求安理会开除非法的国民党代表。与此同时,苏联政府代表也于1月10日再度提案要求否定国民党在联合国的代表资格。1月13日,苏联代表提出的提案以3票赞成、6票反对及2票弃权而遭否决。

与向国际社会宣告新中国立场同时,在周恩来主持下我为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还进行了一些组织上的准备。1950年1月19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主席和秘书长,指出:“以张闻天为首席代表的合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团已经组成,代表团应迅速出席会议并参加工作。”4月9日,周恩来专门主持会议研究代表团的人员组成问题,决定派往安理会的代表为张闻天,派往经社理事会的代表为冀朝鼎,派往托管理事会的代表为孟用潜,派往军事参谋团的代表为周士第,并决定代表团由50余人组成,会议还拟定了我驻联合国代表团办事机构编制、任务及干部配备等方案。1950年5月12日,周恩来分别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陶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威任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鲍台特和世界气象组织秘书处,申明“中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残余集团的所谓代表现已完全没有资格参加各该组织,必须将其驱逐出去。”5月30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指出中国政府已任命孟用潜为出席联合国托管理事会代表,联合国及所属各组织除万国邮政联盟外,迄今仍容留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非法代表是不合理的。8月26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通知我国任命出席第五届联大代表团名单。9月27日,周恩来致电要求第五届联大立即开除国民党代表,并办理一切手续以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争取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斗争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基于联合国会籍普遍化的原则,为了解决联合国关于中国代表权的争议,当时联合国秘书长赖

伊责成联合国秘书处法律部门,对联合国代表权与会员国外交承认问题进行研究。1950年3月8日,赖伊公布了一份备忘录,指出:联合国代表权之所以难以处理,是因为会员国将外交承认与联合国的代表资格混为一体造成的。承认一个新国家或新政府,是一个国家或政府的单方面行为。而一国政府在联合国的会籍和代表资格,要由联合国各机构集体决定。各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要由联合国相关机构经审查投票后才能确定各国代表的资格证书是否有效。赖伊同时也指出,中国代表权问题及未来发生之同样问题,各会员国应以新政府是否有效地统治国家领土和人民为表决的依据。这是联合国首次就中国代表权问题作出的原则性解释,赖伊的这一建议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反共势力的抵制。

### (三)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斥责美国侵略台湾是对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并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美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控诉和建议:“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为了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尊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来制裁美国政府武装侵略中国领土罪行,并应立即采取措施,使美国政府自台湾及其它属于中国的领土完全撤出它的武装部队。”经过斗争,中国提出的议案被列入第五届联大议程,联合国安理会又邀我国参加讨论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的决议。在此情况下,周恩来非常注意利用联合国舞台开展外交斗争的机会,他亲自对我国特派代表和顾问的人选、与会方针、讲演词和发言稿等作了详尽的安排和考虑,还亲自起草了若干文电,对代表团一行的活动作了具有高度策略性的指示,对代表团在斗争中的每一重大步骤和有关细节,均作了周密的部署,力求全面鲜明地阐明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

和在台湾问题上的正义立场。在斗争中，代表团坚持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才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坚决反对美国借联合国的名义，使其非法侵略台湾的行为合法化，彻底驳斥了美国制造的“台湾地位未定论”的谎言，重申了中国政府必将收复台湾，完成中国的统一大业的立场。经过这场斗争扩大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影响，赢得了全世界爱好和平、坚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普遍同情、支持和欢迎，也间接表明了我国反对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的立场。

周恩来非常注意让国际力量来支持新中国的正义要求，使一些中间势力也开始同情和支持新中国的斗争立场，使中国代表权问题成为第五届联大的热门话题。1950年9月，联合国第五届大会召开。因朝鲜战争爆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未能出席此次大会，但我争取恢复在联合国中代表权的斗争并没有中止。围绕着中国代表权问题，与会各国代表提出了多种不同提案。由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反共势力从中作梗，此次联大未能就“中国代表权”问题达成明确的结论，但会议通过了加拿大的提案，即建议联大设一专门委员会，研究“中国代表权”问题。这表明联大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权的正义呼声已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

#### (四)

为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共势力对我国的围堵政策，为进一步获得国际力量的支持，周恩来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制定了新的斗争策略。这就是任何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不仅要在法律上宣布承认新中国，而且必须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要求与我建交的国家不仅要断绝与蒋介石政权的外交关系，还要在联合国中反对蒋介石政权代表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图谋。在具体斗争过程中，周恩来视各国对新中国的态度

和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采取多做工作、积极争取、区别对待的方针,使许多国家成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积极倡议者和支持者。周恩来亲自制订的这一斗争策略赢得了国际上与我友好国家的支持,有效地打破了美国孤立、封锁新中国的政策。

50年代中期,中国争取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斗争进入一个新时期。1955年1月,联合国新任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到中国访问,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再次强调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上的立场。周恩来清醒地认识到新中国争取恢复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的斗争将是一个长期、艰巨和复杂的斗争过程,斗争的关键在于新中国的实力是否强大,国际地位是否提高。新中国必须利用好联合国的舞台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并通过联合国这一舞台来寻求国际支持。周恩来制订的这一斗争策略取得了明显的实效。以苏联为首的、与我友好的国家驻联合国代表每年都提出各种不同形式的议案要求联大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使联合国关于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问题变得日益突出。

面对新中国灵活的斗争策略,面对西方阵营中越来越多国家调整对华政策,面对联合国中越来越多的国家要求恢复新中国的合法席位,美国感觉到形势如此发展下去,它将难以利用联合国来公开地制造“两个中国”,其孤立中国的政策将全盘皆输。在此情况下,美国操纵表决机器要求联合国安理会“不再讨论排斥蒋介石政权的代表或让中共代表出席联合国的问题”。在美国的操纵下,自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初,虽然与我友好国家曾多次提出“排蒋纳共”的提案,但均为美国所提“暂不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提案所否决。尽管如此,每次表决的结果都表明,支持新中国的国家越来越多,支持中国的国家终将会由少数变为多数。周恩来曾风趣地说,事物的发展规律就是这样,正义的东西总会取得多数的支持。

## (五)

1960年美国民主党肯尼迪政府上台。基于对世界局势的重新认识,加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日趋增强,美国政府开始有意识地改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围堵政策,对华政策有所调整。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美国认为根据联合国会籍普遍化原则和国际政治的客观现实,用操纵表决机器来阻止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将困难越来越大。为此美国变换手法,在联合国中抛出了“双重代表权”的提案,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参加联合国,但前提条件是不能排除蒋介石政权在联合国中的代表权,至此美国利用联合国来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浮上了台面,其实质是想把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这一问题永久拖延下去。

随着世界局势的发展,联合国会员国数量的增多,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第三世界不结盟国家愈来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中国恢复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席位只是时间问题。面对这一有利的国际形势,周恩来认识到中国正可以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来宣传我外交政策和对台政策。世界需要中国,联合国也需要中国;中国离不开世界,联合国也离不开中国。为此,周恩来对我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充满信心。因为联合国如果不真正解决新中国的合法席位问题,联合国的代表性就大打折扣,其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和影响力也要大打折扣。在一定的条件下,新中国留在联合国外面反而对提升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利,因为它可以制造一种道义上和政治上的压力,有利于新中国积累更多的力量。对此,周恩来曾说过:“我们再等它三年、五年、七年、八年乃至十年,等我们的力量强大了,再进去不迟。总有一天会请我们进去。”

## (六)

60年代初,以美国为首的反共势力仍不放弃对中国的孤立和遏制政策。为了维护蒋介石政权在联合国中的席位,美国开始改变了其在联合国中的斗争策略,重点在联大议程的运作策略上下功夫。它们一方面让主张“排蒋纳共”的议案可以列入联大议程讨论;另一方面在联大程序性问题上大做文章。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十八条规定,联大总务委员会决定列入联大议题中的某一问题,经会员国 2/3 的相对多数表决通过,该问题即为重要问题事项。以美国为首的反共势力充分利用这一条规定,操纵联合国大会的相对多数通过议案,将中国政府取代蒋介石政权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演变为“重要问题事项”,以继续阻挠新中国进入联合国。

1961年12月,第十六届联大召开,与会56国代表对中国代表权问题进行了讨论。有关提案意见分为三类,一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强烈主张排蒋纳共,要求将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二是美国、澳大利亚、意大利、日本、哥伦比亚五国提出的议案,主张联合国中的中国代表权问题不再是一个程序议题,而是一个重要问题;三是一些持中间立场的国家主张依联合国国籍普遍化的原则,两个中国都应有代表在联合国。大会对后两种提案进行投票以决定表决程序,结果大会以61票赞成、21票反对、20票弃权通过程序提议,先表决美国等五国提出的议案,表决结果以61票赞成、34票反对、7票弃权而获通过。议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蒋介石政权在联合国的席位,系重要问题,联大须以2/3的多数通过始能成立。之后,与会代表对前苏联等国代表提出的“排蒋纳共”案进行了表决,结果以36票赞成、48票反对、20票弃权而被否决。周恩来非常重视这一形势发展的新变化,专门指示外交部进行研究,指出美国的花招表明,它已无把握在联合国中控制多数,只不过是新的阴谋花样继续维持蒋政权在联合



国席位的非法局面而已。自此以后，联合国中的“中国代表权”问题又成为联大的热门议题。

十六届联大以后，各会员国要求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蒋介石政权在联合国中的代表权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联合国中，“排蒋纳共”和“容蒋纳共”的支持者数量日趋接近。特别值得提及的是，1965年第二十届联大对前苏联提出的“排蒋纳共”提案进行表决时，赞成与反对者均为47票。由于蒋介石政权的代表通过重金收买了赞比亚的一票支持，使“排蒋纳共”案仅以一票之差未获通过，否则蒋介石政权在1965年就要被逐出联合国。

### （七）

尼克松政府上台后，为适应冷战的需要，美国政府重新调整了对华政策，主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解，发展并建立两国间正常的关系。周恩来凭其特有的政治敏感，以一个伟大政治家的魄力，注意到并紧紧把握住这一历史机遇，使之有利于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斗争。

众所周知，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最大障碍。当时的美国政府一方面主张与中国和解，发展正常的关系，但在台湾问题上仍自缚手脚，在联合国问题上继续坚持中国享有“双重代表权”的政策。这表明美国在改善中美关系时，不想抛弃其扶持了20多年的台湾国民党当局，仍想继续插手台湾问题，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对此，周恩来明确指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原则问题，正确解决这一问题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

1970年，第25届联大召开。此次大会上，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以51票赞成、49票反对、25票弃权第一次获得多数。但由于在这之前通过了美国等国提出的“关于中国代表权重要问题”的程序性动议，使关于恢复我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未获2/3的多数支持而未能通过。

美国重新考虑其对华政策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1970年,加拿大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日本政府也在谋求中日关系正常化。在此情况下,联合国内关于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的斗争形势发生巨变的征兆已日益明显了。1971年8月20日,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两个中国”,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被剥夺,是美国政府一手造成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权利,同驱逐国民党集团的代表出联合国,这是一个问题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类似的荒唐主张,坚决反对“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坚决反对“台湾独立”的阴谋。只要在联合国里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地位未定”或类似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坚决不同联合国发生任何关系。

1971年9月,第26届联大召开。美国考虑到自己无力控制联合国的多数会员国按其旨意行事,便挖空心思设置障碍。此次会议上,美国不仅再次提出了“关于中国代表权的重要问题案”,而且还抛出了一个所谓“双重代表权”的提案,即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进入联合国,甚至占有安理会的席位,但同时仍保留蒋介石政权的席位。美国认为,经过这番精心策划,蒋介石政权至少在一段时期内会保住其在联合国的席位。当时的美国国务卿称,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入会不得排除“中华民国”在联合国大会的代表权。然而周恩来已代表中国政府声明中国决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双重代表权”,使美国的阴谋难求一逞。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一历史性的时刻终于来临了。第26届联大总务委员会在讨论议程安排时通过表决,决定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先于美国的“双重代表权”提案进行表决。只要前一提案获通过,“双重代表权”提案就会自动失效而根本不可能付诸表

决。10月25日，联大表决时，美国等国提出的“中国代表权重要问题”的提案以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首先被击败，这就是说，关于恢复我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只需简单多数便可通过。接着联大开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表决通过了阿尔巴尼亚等23国提出的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所属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即“第2758号决议”。表决结束后，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代表很快就离开了会场，坦桑尼亚代表首先起立，离开席位在主席台前跳起舞来。接着提案国代表纷纷起立，相互拥抱，热烈鼓掌，全场一片欢腾，“中国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会场，此情此景是在联合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

中国政府对联合国的表决结果作出了热烈的回应。毛泽东亲自指示立刻组团参加此次联大，周恩来为派出代表团和制定出席联大的方针政策殚精竭虑，周密部署。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对出席联大代表团成员名单逐一审定，决定在一周时间内组派以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联合国接受中国的席位，并参加正在进行的第26届联大。周恩来并亲自赴机场为出席会议的代表团送行。1971年11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正式出席了联合国大会，各国代表争相发言欢迎中国政府的代表与会，前后历时6小时，破联合国纪录。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在会上作了长达45分钟的发言，全面阐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方针、路线和政策，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以及在联合国的行动方针。值得提及的是，周恩来事先亲自对这篇讲话稿进行了认真而细致的修改，有些重要段落都是经过他字斟句酌敲定的，可以说这篇讲话凝结了周恩来的心血，当时的共同社记者认为这篇讲话是“联合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演说之一”。11月23日，中国常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黄华第一次出席安理会。自此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便以其泱泱大国的恢弘气势出现在联合国舞台上。

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积极参加了联合国的各

项活动,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列举一组数字来说明问题:1970年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有66个,1971年为54个,1973年为39个,1975年不足30个。而1970年与我建交的国家为56个,1971年为76个,1972年为92个,1974年为103个,1975年为112个,1980年超过120个,1983年超过130个,1992年超过150个,到1995年与我建交的国家达到159个。而与台“建交”的国家仅为30个。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代表权的历程表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借“台湾问题”,利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以此来分裂中国的图谋遭到了彻底的破产;国际社会确立了“一个中国”的政治秩序,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联合国中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已从政治、法律和程序上得到公正和彻底的解决,台湾当局根本无权参与联合国,这是联合国的神圣决议予以明定的,其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台湾当局想借联合国会籍普遍化原则,以分裂国家平行代表权模式,以重金购买联合国的门票等手法“参与联合国”,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这是行不通的,是注定要失败的。

# 李克农传略

林 聪

## 青少年时代

1899年9月15日(农历己亥年8月11日),李克农诞生在江南古都安徽芜湖,李克农的父亲李哲卿对这位能“传宗接代”的长子的降生颇感惊喜,按照芜湖李姓的辈份,当即取名克农。“克农”一名和他曾用过的“泽田”、“稼轩”等名,都无不寓意着他曾是一位中国农民的儿子。

李克农少年时期就读于曾成为辛亥革命在安徽之重要基地的芜湖圣雅教会中学,受到进步思想的教育和熏陶,同时,也耳闻目睹了外国列强的侵略行为和北洋军阀的腐败统治,从而萌发了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意识。1917年初,李克农索性退学,只身来到北京城,在一家名叫《通俗周报》的报社做发行工作。这是一份具有激进思想、反映时代潮流的刊物,对年轻的李克农产生莫大的吸引力。这年7月,因张勋在京都玩起“宣统复辟”的把戏,形势急转直下,革命党人纷纷遭坐牢杀头的厄运,北京陷入一片混乱之中。《通俗周报》属于鼓吹“民国”的查禁书刊,李克农被迫离开北京,星夜乘车南下,绕道上海返回芜湖。

1919年北京掀起的五四运动的狂飙席卷到长江沿岸,也席卷到了芜湖,李克农以极大热忱全身心投入到这场反帝爱国运动中。他刻小报、发传单、作演讲,成为芜湖地区有影响的“激进人物”。是

年6月,经芜湖安徽省立第五中学学监高语罕和教师刘希年的介绍,他曾一度告别了芜湖,来到省府安庆,任《国民日报》副刊编辑。

1925年,在五卅运动的推动下,芜湖地区也掀起了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斗争,李克农积极参加和领导了这些斗争,并于1926年经杨士彬、余昌炯(准)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继而他又出任了国民党芜湖市党部宣传部部长的职务,李克农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不分昼夜地奔波于工人、农民与学生中间,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扩大其影响,李克农还根据组织决定,创办了民生中学,吸收那些在学潮中被开除的进步学生和社会上的有志青年继续学习、深造。民生中学成立后,身兼事务主任的李克农除了忙公务外,还时常给师生们讲课,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讲俄国的十月革命,讲中国的社会与政治……

1926年九十月间,北伐军一举攻克武汉三镇,革命风暴愈演愈烈,民生中学的地下党和青年团有了较大发展,党的外围组织也经常以民生中学为据点,在这里秘密活动。从1925年至1927年间,民生中学的学生曾以“纠察”和“殿卫”的面目,出现在芜湖历次政治示威游行队伍中,因为在李克农等人的训练下,他们纪律严明,敢打敢冲。在此期间,民中还输送了儿批学生参加北伐军。随着民生中学的影响日益扩大,那些土豪劣绅、封建军阀势力竭力诬蔑民中“先生是强盗、学生是土匪”,江城的民众则把民生中学冠之为“水泊梁山”。

1927年2月初,北伐军占领芜湖,李克农带领民生中学的师生们走上街头,夹道欢迎北伐军,并在民生中学的操场上召开了欢迎北伐军的祝捷大会。主席台上方高悬着“热烈欢迎国民革命军进驻芜湖”的横幅。民生中学的师生们与前来参加大会的北伐军将士及当地群众,挥臂高呼着:“打倒列强,打倒军阀!……”

北伐军进驻芜湖后,民生中学在李克农的组织下,密切配合北伐军开展了一系列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他们将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潘伯和、陶玉堂和一些与列强勾结的奸商拉出来,戴上高尖的

白纸帽子游行。他们还在街头演出活报剧，揭露封建军阀、土豪劣绅的种种罪行。

在这期间，李克农还组织开展了对安徽军阀陈调元的斗争。

陈调元，字雪暄，早年毕业于保定陆军速成军校，隶属于北洋军阀冯国璋的直系。1925年他投奔了孙传芳，被任命为皖军总司令。自陈调元部进驻芜湖以来，占民房、劫商店，无恶不作，芜湖的繁华地段几乎被抢劫一空，后来当芜湖商会的会长将10万元支票送往陈的司令部后，才停止了抢劫，因此，芜湖人把陈调元鄙夷地称为“票匪”。这“票匪”在1927年3月得到了蒋介石的青睐，被蒋介石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七军军长兼北路军总指挥和安徽省政务委员会主席。

1927年4月6日，在李克农的率领下，一队威武雄壮的学生军走上大街，打出了“打倒票匪陈调元”等标语，队伍中还有几个学生抬着一个篾扎纸糊的大棺材，吸引了大批的人群围观。人们看到，棺材内一个纸人伸出一双枯瘦的黑手，上写“陈调元”三个大字，人们拍手称快，责骂“陈调元就是棺材里伸手——死要钱”。游行队伍中还有一块大黑板，上面以醒目的白字写着陈调元在皖省三年来通过抢劫搜刮而来的个人财产统计表，总数达两千万。一时，观者如潮，“票匪”陈调元被弄得臭不可闻。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制造反革命大屠杀，公开背叛革命。不久，芜湖地区便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芜湖市党部被查封，有些来不及撤离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被捕入狱或惨遭杀害。4月18日，陈调元的一份通缉李克农的密电飞抵芜湖，在这份通缉令上，陈调元悬赏5万大洋缉拿李克农。李克农和同时被通缉的宫乔岩、阿英等人共乘一条小划船，趁夜幕锁江之际，潜离芜湖去了江北。

李克农等“要犯”的潜逃，令国民党芜湖市公安局侦缉处十分恼火，立即派出大批“猎犬”四处侦寻。当探听到了李克农等人的隐匿地址后，立即于4月20日晚派一队人马过江围捕。

此事恰巧被李克农之妻赵瑛家一位在公安局内作文案的亲戚听到，他急忙向赵瑛透露了这个恶讯。此时，赵瑛正患病在家，持续高烧已使她精疲力尽，可当她听到李克农的处境十分危险时，竟不顾重病缠身和怀有身孕，拖着极度虚弱的身体，冒雨过江，又踏着泥泞的小路，深一脚浅一脚地紧赶慢赶，终于赶在敌人的前面，使李克农等又一次脱离了险境。

1927年8月蒋介石曾一度下野，陈调元也被挤出安徽，形势稍有好转，李克农便又返回芜湖，担任了民生中学董事会主席和第二任校长。他以民生中学为据点，以青年团员为骨干，继续开展斗争。为揭露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他组织学生在芜湖城内贴出了一张张写有“反对新军阀陈调元”等字样的标语传单，他还用《苏武牧羊》的调子写成一首歌要大家传唱。内容大意是：“叛徒蒋中正，戴着假面具，他也来革命，倒党部、杀工农，算他第一名，直到南京城，旗子更鲜明，勾结英美鬼，联合张作霖，工人农民革命军，屠杀将殆尽！工农商学兵，固团体、抖精神，作一最后挣，打开一条路，死里来逃生，杀向东南去，活捉蒋中正，土豪劣绅反动分子一齐杀干净。”这首歌广为流传，在民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8月，中共安徽省临委机关由安庆秘密迁往芜湖，民生中学就成了省临委的干部训练中心和安徽省济难会（党的外围组织）的大本营。此时，民生中学的绝大多数的师生也都加入了济难会。1928年1月27日，济难会的负责人王少虞不幸被捕，敌人搜出了济难会名单和一些传单标语，随即又有了甘野陶等30人被捕，民生中学再度被查封，李克农又成了国民党芜湖市公安局重点缉捕的“元凶”。

在群众和亲人的掩护之下，李克农机智地躲过了敌人的疯狂搜捕潜入南京。可来南京没多久，李克农又被国民党芜湖公安局和南京公安局联合组成的侦缉队盯上。

一天，李克农有事来到下关码头，突然，伴随着一阵刺耳的警笛，从身后传来“抓李克农”的叫嚷声，李克农见事不妙，拼命奔跑，



七八个持枪的军警穷追不舍。当他横穿一条马路时，由于奔跑过猛，与一辆快速行进的黄包车相撞，李克农险些跌倒在地。黄包车上坐着一位佩戴上校军衔的国民党军官，见有人撞上，十分生气，他刚欲发火，忽而又转怒为喜：“曼梓（李克农笔名）是你？快上车！”李克农定神一看，原来是老友王振武，他迅速上车，朝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六军驻京办事处飞奔而去。

王振武也是安徽人，曾于1925年与李克农相识，那时，李克农为创办民生中学一事常跑安徽省教育厅，并与这位军人出身的王振武相遇。后来经李克农邀请，王振武曾一度脱掉军服来到芜湖，担任民生中学军训课的专职教师，训练出一批又一批能文能武的学生军，一时曾威震江城。从此，李克农与王振武也便成为挚交。1927年4月，当“白色恐怖”向芜湖袭来之时，两位老友便被迫分手。没想到，在李克农危难之际，戏剧性地与这位朋友“撞”在了一起。

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上校主任的王振武为保护李克农，特下令卫兵守大门，未经他的允许，任何人不得擅自闯入。

时隔几日，在王振武的精心安排之下，李克农身着一套毛料的中校军服，并由王振武护送，悄然离南京，奔赴党中央的秘密所在地——上海，去迎接一场新的更为惊心动魄的战斗。

## 在中央特科

1928年春，为了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党中央决定建立党的政治保卫组织——中央特科。其主要任务是获取敌人情报、建立秘密交通、营救被捕同志、惩办叛徒奸细，保卫中央领导同志和驻沪机关的安全。

为能及时掌握敌人动向，以更好地保护自己、打击敌人，中央决定派一、两名同志打入国民党要害部门。恰在这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CC特务组织）为加强其情报机构，以上海无线电

管理局之名,招聘一名广播新闻编辑。此情报被先期打入“CC”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所获。

党中央决定派李克农打入该无线电管理局,在钱壮飞的安排下,李克农以优异的成绩连过几关,顺利地打入了上海这个特务组织。由于李克农才华出众,思路敏捷,不久便被提升为电务股长,官虽不大,却管着全国的无线电报员,是获取情报的极好位置。

不久,李克农的好友胡底也打入敌人内部,被派往天津的情报机构。经组织批准,李克农与钱壮飞、胡底三人组成中央特别党小组,由李克农担任组长,由中央特科指派情报科长陈庚负责与他们联系。我党隐蔽战线历史上著名的“龙潭三杰”指的就是他们三位。

1929年12月,陈立夫任命其亲信徐恩曾为中央组织部总务科主任,徐上任后,钱壮飞被任命为他的机要秘书。徐恩曾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得力“干将”竟是中国共产党忠诚战士,他引以为豪的特务网竟是由中共党员为他出谋划策建立起来的。他送到陈立夫、蒋介石那里的绝密情报,竟会有一份相同的复制品同时放在中共领导人的面前。

从1930年12月开始至1931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一、二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反“围剿”的胜利,固然是毛泽东等英明指挥的结果,但这里也有个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这就是钱壮飞从徐恩曾那里事先获取了敌人发动第一、二次军事“围剿”的命令、兵力部署等绝密战略情报,并由李克农及时交给了陈庚和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这些情报准确及时,使工农红军对敌人的部署、兵力调动了如指掌,因此,才在战场上争取了战略主动,保证了作战的胜利。

李克农不仅要为中央收集和传递情报,而且还对那些有威胁的敌人采取巧妙手段将其除掉。

李克农曾回忆说:“有一个国民党公安局的督察队长,对共产党非常凶狠,抓了我们很多的人。我们进去以后,设了计,把他除掉了。”其经过是这样的:“我们租了一处房屋,布置我们的人在那里

住，在那里放一些已经被国民党搜捕到的我党文件，后来故意让他们侦知这一线索，不过又告诉他们说，为了某种理由，可以暂缓不提，以待来日捕获更多的人，就这样过了一些日子，再去抓人时，我们的人都走空了。那里住的原来都是些平日来往路过上海要走的人，如去苏区的人等。等到扑空以后，上面的人就问他：‘为什么让共产党漏了网？’这个督察队长被上面审查一段后就锄掉了，他还不知道这就是共产党搞的”。

1930年初，刚从苏联回国的刘伯承，接受中共中央布置的在武汉发动武装起义的重要任务，并由刘伯承担任起义总指挥。

从上海到武汉，敌人封锁很严，为使刘伯承安全抵达目的地，特委决定由李克农利用特殊身分掩护，护送刘伯承去南京。

李克农按照约定的时间，冒雨来到外滩公园接头地点。

身穿兰色绸缎长袍的李克农手举一把黑色雨伞在此等候，他不时看看表，表情显得很镇静，内心却踌躇不安，警惕的目光投向公园的入口处。

一辆雪佛莱轿车从远处驶来，停在公园边，从车内下来两个人，径直朝公园走来。李克农见状便朝这两人迎面走去，当离这两人还有几米时，他止步摘下眼镜哈哈气，掏出手帕擦一下又戴上。这是事先约好的暗号，表示身边没有“尾巴”一切正常。当李克农和这两人相遇时一言未发，只是用眼神向其中一位熟悉的人——李立三示意了一下，三人先后钻进车内。

汽车启动后，坐在前座的李克农这才转过身来和李立三握手问好。

李立三指指座在身边的人说：“老李，这位就是刘伯承同志，交给你，好好送去。”

李克农急忙伸过手来紧紧握住刘伯承的手说：“久闻大名，没想到在这里和你幸会。”

刘伯承不动声色地微微一笑说：“我也是今天才识庐山真面目啊！”

在火车的头等车厢里，由于李克农持有特种证件，因而巧妙地应付了特务的监视和军警的搜查，终于顺利抵宁。事后，蒋介石及其他的特务机构虽然也掌握了刘伯承离沪的情报，但他们万万未想到是李克农只身一人将刘伯承送往南京的。

由于李克农为首的特别小组控制着敌人的情报机构，使蒋介石几次欲破获驻沪中央领导机关的企图均告失败。可就在他们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之际，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严重事件——顾顺章被捕叛变。

1931年4月24日，协助分管党的保卫工作、掌握大量我党核心机密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顾被捕后不久就叛变自首，他向特务机关请求亲自面见蒋介石，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一网打尽。他还特别强调在他未到南京之前，千万不能报告他被捕叛变的事。但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和武汉在汉口的特务黄凯、蔡孟坚等人，抓到顾顺章后，如获至宝，竞相邀功，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给陈立夫和徐恩曾发了电报。

这天正好是星期六，徐恩曾像往常一样去上海度周末去了，只有钱壮飞一人在值夜班。他一连收到武汉发给徐恩曾转给陈立夫的六封特急绝密电报，每封电报上都写有“徐恩曾亲译”的字样。这一反常的情况立即引起了钱壮飞的警觉。他迅速用先前偷摄的特级密码本，将电报内容破译了出来，结果使他大吃一惊。第一封电报的内容便是：

“黎明（顾顺章的化名）被捕，并已自首，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内可将共党中央机关全部肃清。”

其他几封电报的内容大致相同。

事不宜迟，钱壮飞敏捷地抄下电文，连夜派其女婿刘杞夫（中共地下党员）赶赴上海。次日早晨，刘找到了李克农。

接到这十万火急的电报，李克农心里明白，顾顺章的叛变意味着什么，不用说宁沪之间历经艰险建立起来的情报网将会遭到彻底破坏，整个中央领导机关也将面临灭顶之灾。

时间刻不容缓，务必要抢在敌人前面，迅速采取行动。

这天并不是李克农与陈庚接头的日子，找不到陈庚就无法和中央联系。在这个紧要关头，李克农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地设法与党中央联系。几经周折，李克农终于通过一个刚刚建立的紧急备用联络点找到陈庚，随后又找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当机立断，决定采取紧急措施：

一是立即通知中央机关、江苏省机关、共产国际驻沪机关全部紧急转移；

二是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党内一切工作方法，掐断顾所能接触的所有关系和线索，由各部门实行紧急应变。

在周恩来的指挥下，中共中央实行了历史上少有的秘密大转移。李克农也迅速投入了掩护中央领导安全撤离的战斗中。王明、博古等人都是在他的护送下转移到安全地带的。

由于采取了一系列的紧急措施，当大批国民党军警在顾顺章的引路下赶到时，中央机关已全部转移。

在中共中央机关面临危难之时，李克农心中只有一个念头，确保中央机关安全转移出去，因而未能顾上赵瑛（李克农妻子）母子，后来是组织上通知她们立即转移的。她们曾一度与李克农失去了联系，流落街头，夜宿菜场，辗转一个月，才被中央特科的同志找到。

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撤离上海去江西苏区。李克农是最后一个离开上海的，他打算将隐患除掉了再走，又多呆了两天，最后陈赓出面，通知李克农必须马上离开上海。在动身之前，赵瑛母子也告别上海，返回芜湖老家，西安事变后李克农才和家人恢复联系。

李克农怀着一种难以形容的心情，与陈赓和周恩来依依惜别，从而离开了曾与敌人殊死搏杀过的上海，踏上了去中央苏区的艰难历程。

## 在中央苏区

经过数月的长途跋涉，风餐露宿，进入苏区到了汀州，他远远地望见村口站着两个人，好像是迎接他的。

走近一看，他顿时喜上眉梢，原来其中一个不是别人，正是钱壮飞。两位曾令他们的对手心惊胆颤过的亲密战友久别重逢，分外激动，一时间他们虽然没有话语，但有多少要说的话都倾注在拥抱之中了。

伫立一旁的那位陌生人只是默默含笑没有作声。经钱壮飞介绍，才知这就是邓发。

李克农未来苏区前，即从1930年10月起，苏区已在错误地开展以打“AB团”为主要目的的肃反运动。某某被抓，某某被杀的消息不断传来，面对党内这种肃反运动扩大化不断蔓延的势头，李克农确有些茫然失措。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任弼时分配到江西省保卫分局任执行部部长的。

1932年初，李富春找到李克农，派他去执行新的苏区中央局指示——纠正错案。周恩来先于李克农到达苏区，并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在他的主持下，通过了《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着手纠正在肃反问题上的一些错误做法。

李克农奉命到江西的石城、广昌、雩都、兴国、平安寨等地，怀着对党对同志强烈的政治责任感，深入细致地审查了这些地区积压的大批的“反革命嫌疑犯”，把整错了的所谓“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及托派等冤假错案澄清和纠正了过来，让那些受冤屈的同志重获新生。

任务完成，李克农返回瑞金时，周恩来正在组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政治保卫局。由于周恩来的信任，李克农担任了该局的执行部部长。尔后，他又被派往红一方面军担任保卫局局长。李克农雷厉风行，在不长的时间内，先后在红一方面军所属的一、三、五、七、

九等5个军团建立起政治保卫分局。在党和军队政治保卫工作中，他那出色的组织才华得以全面展露。

干保卫搞情报是李克农的特长，同时，他还有很多专长和业余爱好。在江西苏区，他编过剧本，做过导演，还自己演出过话剧和双簧。有一次，李克农还与钱壮飞、胡底三位龙潭战友一块登台演出，由他和钱壮飞编写的独幕话剧《“秘书长万岁”》，李克农扮演“秘书长”陈立夫这个角色，钱壮飞则扮演蒋介石。表演水平都不亚于受过专业训练的的话剧演员，由于剧本写得好，又加上他们维妙维肖的表演，曾轰动了瑞金的红军剧场。

1933年10月，被蒋介石调到福建前线“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在中共团结抗日政策的感召下，曾秘密派代表与红军谈判，双方草签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相隔20天之后，便爆发了震撼南京政权的福建事变。孰不知，负责整个谈判安全保卫工作的就是李克农。当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蔡廷锴决定派两名代表来苏区与红军谈判后，李克农奉中央之命对谈判代表所经之地进行了严密布置。特别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国民党军与红军交错的游击区，李克农派出了数十名政治保卫局的侦察人员，一律便衣打扮，或化装成挑夫，或化装成农夫，或化装成乞丐，暗中保护十九路军谈判代表，两位谈判代表于10月14日从福州出发，经漳州、龙岩，到达蛟洋，在李克农所派人员的秘密护送与接应之下，安全通过国民党占领区和游击区，顺利抵达苏区边镇新泉。进入苏区之后，李克农仍未放松警戒，一直护送到瑞金。完成了中央交给的这一重要使命。

1934年10月，李克农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他率领侦察部队沿途进行地面侦察，并担任中央纵队驻地的卫戍司令，对保卫党中央和毛泽东在长征中的安全，起了重要作用。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就是在他这位“卫戍司令”的严密警卫下胜利举行的。李克农还协助叶剑英，同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 协助周恩来作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中央红军结束长征到达陕北时，中华民族正处于危亡之关头。为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主张，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召开了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确定把统战工作的重点放在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上。会后，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的李克农，担当周恩来的助手，具体开展工作。当毛泽东准备搭起“全民族抗战”这个大舞台之后，李克农便首先登台亮相，演了一出开场戏。

序幕从争取东北军开始。李克农首先在瓦窑堡办了训练班。其中一班是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战役中被俘的120名东北军中下级军官，称“解放军学习班”。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不打红军！”、“停止内战，枪口对外！”、“东北军出路是抗日，打回老家去！”当东北军军官一进入训练班的礼堂时，这些异常醒目而又牵动情愫的标语上，一下子把东北军军官与红军之间的距离缩短了许多。由红军男女战士演唱的《打回老家去》的歌声突然响彻礼堂。歌声把他们带到了正在遭受日寇蹂躏的松花江畔，歌声刺痛了这些因执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而丢掉东北三省的东北军军官们那颗颗倍感屈辱的心，他们被唱得垂下了头，被唱得泪流满面……

接着，李克农特意请来博古、彭德怀、邓颖超等人亲临讲课，面对这些共产党“大人物”真诚的呼唤，被俘的东北军军官们自发成立了抗日同盟会，许多人还跑到李克农那里表示要加入红军参加抗日，还有的表示回去做东北军的工作。李克农还重点作了高福源的工作。

高福源曾担任过张学良卫队营的营长，深得张学良的器重，被提拔为东北军“尖子团”的团长。被俘后经李克农多次做工作，使他



的觉悟有了明显提高,由原来沮丧、不言语,甚至有抵触情绪,转变到悔恨自己,愿意与共产党合作。高福源向李克农坦率直言:“为了东北军前途,为了抗日救国,我自愿回去做张副司令和其他人的工作。”

临行前,李克农又向高作了交代:“你回去后,先用个人身分试探一下张学良将军的态度再深说。如果他有意,红军愿意派正式代表前去谈判。”

高福源回去见了军长王以哲,王以哲将高回来之事及时报告了张学良,张学良对高福源先来了个下马威,拍案怒斥:你还有脸回来见我,还敢让我“通匪”,声称要将高拉出去枪毙。

高福源毫不畏惧,冲着张学良嚷道:“你算什么英雄好汉,你还有脸去打抗日的红军,把自己的家乡让给日寇,却在这里打内战!”

张学良闻声大喜,忙上前握住高福源的手说:“你果然有胆量,我不过是试试你。”

迫切想与共产党接上关系的张学良和高福源整整谈了一个通宵。

高福源带着张学良的意见,重返瓦窑堡,立即向李克农作了详细的报告。

中央决定委派李克农为中央正式代表与东北军谈判,争取东北军的工作便由此迈出了重要一步。

李克农一行由高福源引路于1936年2月21日从瓦窑堡出发,冒着飞飞扬扬的大雪向洛川行进。出发前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学良、王以哲,“望妥为接待,并保证安全。”

原约定与张学良会谈,到了这里却被告知张学良因有事去南京,要王先同李克农商谈六十七军和红军之间的局部合作问题。其余重大问题等张回来再谈。

会谈于2月26日开始,经过李克农与王以哲三天会谈,达成口头协定:在军事上双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并允许在甘泉被我包围半年之久的两个营换防;在政治上,六十七军同意我党停止内

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经济上恢复通商。双方约定这个口头协定自3月5日起各自秘密下达执行，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协定。

3月3日，张学良乘飞机从南京回到西安，次日，未等消除疲劳，便自己驾机秘密飞往洛川与李克农会晤。

李克农见张学良穿一套银灰色长袍，黑丝绒马褂，头戴礼帽，加一副墨镜，手持文明棍，酷似富商，便风趣又不失礼地问道：“张将军，你解甲从商啦？”

张学良被问得先是一愣，又很快反应过来，边笑边回答说：“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言下之意他与王以哲所谈六十七军之事不同。

头脑敏捷的李克农是不难理解此话的含义的，随即也会心地发出一阵豪放的笑声。

虽然两人都胸怀联合抗日，共赴国难的大局，但会谈的气氛开始并不轻松，有时甚至针锋相对。若稍有不慎，就有陷入被动的可能。

张学良不愧是位颇有谋略的军事家，他问李克农是干什么工作的，接着请李克农解答几个问题：一、你们红军是不是真抗日？你们说的抗日是一个幌子呢还是真的？二、红军内部是不是团结？三、你们说抗日，为什么一定要反对蒋介石？……

李克农坦然地说道：“红军当然是抗日，要不为了抗日，何必走二万五千里来到陕北？”

“你们到了宁夏准备开到前方去抗日，是否？”

“是的！”稍顷，李克农又继续答道：“张先生，你是一个军事家，抗日这件事，要有后方，不要说有总部后方，至少有运输后方。至于第二个问题，红军是团结的，的确有些争论，这你晓得，张国焘跟我们已经分了家，这是我们党内的斗争，张先生你不是共产党员，不可能体会到。”

张学良点点头，表示赞同。

“抗日为什么要反对蒋介石呢，就是因为他不抗日嘛！凡是抗

日的，我们就团结，这是我们的方针。”

李克农解释得天衣无缝，张学良无话可说。会谈持续到次日清晨。

在第二天的会谈中，张学良说，经过考虑，他要自己驾飞机到延安与周恩来见面。此话说出，他又担心会引起李克农的误解，便忙解释说：“这样做并不是不相信李先生，我早听说还有一位周先生，而且很有学问，我是很钦佩他的，是不是可以见见面？”“怎么见面？”李克农问他。张学良说：“在延安见面。”

会谈一结束，李克农将这次会谈中达成的协议内容和张学良的请求立即起草电文报告了中央。

3月6日上午，中央复电嘉奖，对会谈结果和口头协议表示完全同意，并要李克农到山西石楼汇报。

李克农3月16日到达石楼，向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领导同志汇报了洛川会谈的详细经过和张学良提出的条件。毛泽东听完汇报，颇为满意，说：“李克农单枪匹马，搞得很好。”

经中共中央会议研究决定，由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偕李克农去延安，同张学良继续进行会谈。

4月7日，周恩来和李克农带着电台和一个警卫班从瓦窑堡出发，9月到达延安。

9日晚8时会谈正式开始。参加会谈的有周恩来、李克农、刘鼎和张学良、王以哲，会谈内容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红军对抗日的态度；国际形势与红军的主张；会后怎么办的问题。

会谈中，张学良态度诚恳地谈到：“红军的骨干分子，我是亲眼所见。方志敏当年英勇赴死，真是一条好汉，感动得我当时的眼泪流个不停，而南京政府里面是‘土豪劣绅’当道……”

这几句话足以表现出张学良心直口快的性格。在关于共同抗日等许多重大问题上，周恩来和张学良之间基本趋于一致。但对中共“反蒋抗日”的提法，张学良也开诚布公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蒋介石是实际上的统治者，中国大部分地盘由他统治，他又掌握着

军事、财政、外交大权，现在不宜提反蒋抗日，他认为联合抗日，统一战线应把蒋包括在内。

向来稳重老练的周恩来，思考了一下说：“张先生提得很好，我们回去报告中央郑重考虑。这是大政方针，我现在还不能马上答复你。”

百闻不如一见，张学良虽然久闻周恩来大名，但并未见其人，这次会谈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对周恩来很钦佩。同时，此次会谈也促使他下定了联共抗日的决心。正如他在自述中所写的：“当时，我既然接受周的观点，并表示我对日复仇意愿，不仅是为了报家恨而且也是为了雪国耻。我决心追随抗日。”

延安会谈一直持续到次日拂晓，周恩来与李克农带着疲倦而胜利的笑容与张学良握手告别。

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与李克农作了全面汇报，经过广泛而深入讨论，中央先后将“反蒋抗日”易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

与延安会谈相隔 8 个月之后，便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应张、杨二将军之邀，作为中共代表团秘书长的李克农又随周恩来奔赴西安，参加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从而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

## 在上海、南京、武汉、桂林等八路军办事处 的统战和情报工作

从抗日战争爆发到 1941 年，李克农奉命相继在上海、南京、武汉、桂林等地担任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中央交给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营救被国民党关押的政治犯，接待、审查被释放的政治犯及失去关系的党员和要求参加革命的爱国青年；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纲领和八路军战绩；恢复、建立长江流域和华南各地的党组织；向国民党军事

机关领取军饷、军械、医疗药品和其他军用物资，并采购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急需物品，搜集抗日战争的情报。在国民党统治区，李克农利用职务作掩护，卓有成效地开展了统战工作、宣传工作和情报工作。

### 1. 在上海办事处

1937年2月，李克农正在西安协助周恩来与蒋介石代表顾祝同等人进行国共和谈，同时在西安七贤庄组织半公开的红军办事处，突然接到中央的命令，令李克农一行秘密前往国民党统治的中心上海，着手建立半公开的红军驻沪办事处。

李克农在上海的一切活动都围绕着国共合作、联合抗战这一主题。他利用国共紧张关系有所缓和的有利条件，很快在上海建立了半公开的红军驻沪办事处。为了便于活动，李克农化名李震中，对外称十七路军军需主任。办事处设在繁华的福熙里十二号（现延安中路504号），这是座红色墙壁的两层西式楼房，楼下有电话机，便于对外联系。阁楼上架设电台，可以和西安、延安联系。

这一期间，李克农奉中央之命，接连完成了几项重要工作任务。

1937年3月25日，当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带着夫人芬娜及女儿从莫斯科乘船启程返回祖国时，这一消息同时被共产党和国民党从不同的渠道获悉。此时，李克农奉中央指示，随张冲专机去上海，争取和蒋经国取得联系，以便相机向他介绍国内情况，谁知蒋介石没等船靠岸，就用汽艇在吴淞口把蒋经国一行人接走了。于是，李克农到上海后，便代表我党先去看望宋庆龄，向她问好。接着向她通报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关于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具体主张，以及最近国共谈判的一些情况。并转达我党希望宋庆龄能从中帮助促使国民党尽快释放“政治犯”。1937年在宋庆龄安排下，李克农和孔祥熙的夫人宋霭龄见了面，虽然没有马上促成国民党释放“政治犯”，但是通过这次会谈，李克农向她宣传了党的联合抗日的主张，做了统战工作。

李克农这次赴上海，还肩负着协助毛泽民取款回西北的任务。原来，共产国际为了援助艰难困苦的红军，于1937年中将一笔数额巨大的美钞汇到了上海。时任中央苏维埃银行行长的毛泽民便奉命和夫人钱希均等人抵沪，负责将这笔钱兑换成法币，再运往西安。当毛泽民正发愁如何将这笔巨款安全运往西安时，李克农来到毛泽民夫妻住的小洋楼里，毛泽民夫妇喜出望外。他们三人在这个小楼里详细商量了如何取款、运款的办法。最后确定，三人不断轮换，每周去一次西安，以阔太太或者大富商的身分，运送钱款。当时在西安火车站，时常要检查、搜身，他们每次抵西安站时叶剑英等人也都准时将汽车开到站台里接应，从而保证了取款任务的顺利完成。

七七事变后，李克农又奉命开赴南京，任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主任。

## 2. 在南京办事处

一道竹篱笆围着一幢灰色的小楼，南京鼓楼附近傅厚岗66号（现为青云巷41号）即是南京八路军办事处的驻地。紧挨左邻的是国民党军委办公厅副主任姚臻的公馆。办事处组建初期，特务监视严密，李克农进进出出身边总带着一位相貌端庄的妇女，这就是博古夫人张越霞。办事处为了工作方便，在高云岭29号租了一座小楼做处长公馆，许多秘密活动在这里进行。为了安全，张越霞以处长太太的名义住在办事处进进出出陪伴李克农。出门时，一副亲密的样子，一回到房间，“任务”完成，一笑了之，各自去忙自己的工作。

9月的一天，周恩来和两位外国友人谈话，为了避开特务耳目，约定在郊外一个僻静处见面。等快到约定时间时，周恩来、李克农离开了办事处，没走多远，李克农就说“有尾巴”并要司机把尾巴甩掉。

司机立即全速前进，迅速拉开了和“尾巴”的距离。当车子开到约定好的拐弯的地方，两位外国友人车子正停在那里。一个急刹

车，周恩来迅速下车，钻进对方的车子里，李克农坐着原来那辆车继续前进，走了一段路，李克农让车停下，靠在路边，等特务和车子跟上来时，他故意招手让特务的车停下来，冲着他们说：“车坏了，帮着给修一修吧！”

特务们一看车里没有周恩来，又看笑嘻嘻的李克农，弄的他们哭笑不得。

在这年的8月到11月之间，傅厚岗66号这座灰色的小楼里每天都非常热闹。

朱德、周恩来常来常往，叶剑英、博古、李克农就在此地。李克农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在这里国民党上层人物时常来往，宋子文、劭力子、孙科、张冲是这里的常客。也有像王昆仑、阎宝航这样有秘密身分的人不时悄然而至。

当时办事处一项重要的工作是营救在牢里的“政治犯”。另外开辟宣传阵地的的工作也紧张有序的展开。此处还是肩负代表八路军领取军饷、军用物资，采办和运输陕甘宁边区所缺乏的物资等任务的重要据点。

关于释放我党被关押的同志，陈立夫等人往往以“你们开出名单来”加以搪塞。7月31日，江苏省高等法院对被关押在苏州的沈钧儒“七君子”首先宣告开释。8月18日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童小鹏在南京指名要把过去在上海一起工作过的熊天荆、夏之栩、王根英三位女中豪杰保出来，夏之栩是赵世炎爱人，王根英是陈赓爱人，熊天荆在中央机关工作过。他们被保出来后，详细讲述狱中的情况，又通过他们开名单，这样被关押的同志一批一批被保释。陶铸、方毅、钱瑛、王鹤寿等人就是这一时期被保释出来的。

刚从监狱中放出来的同志来到办事处，就如同回到了家。有的失声痛哭，有的身体还很虚弱，坐在石台阶上扶着墙才能勉强站起来。

在这段释放“政治犯”期间，从南京、苏州、上海、杭州出狱的大约有1000多人。

有一天,李克农在办公室翻阅报纸,突然南京《新民报》上的一篇文章引起他的注意。这个消息是转载国民党中央报的,大意是说八路军主张“游击战”是“游而不击”。李克农读后气愤地说:“无耻!造谣!非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不可!”说着抓起电话机,叫《新民报》的总编辑马上到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来一趟。李克农佩带少将领章,拿着报纸对这位总编辑说:“你们讲八路军‘游而不击’根据是什么?平型关打了大胜仗,怎么是‘游而不击’?”这个总编辑只得承认错误,第二天更正了。李克农通过说理斗争,进行宣传,做统战工作,通过适当批评教育、团结了中间人士。

1937年11月中旬,由于日寇占领上海,又继续向南京进攻,国民党政府被迫从南京撤离,准备迁都内地。

11月20日,八路军代表叶剑英,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关于南京危急、办事处撤离南京之事,亦给中央写了报告。随后,“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全体人员奉命于12月4日撤离南京。

### 3. 在武汉办事处

1937年12月初,李克农从南京抵达武汉,同董必武、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团成员会合。中共代表团是对外的,对内则称中共中央长江局。李克农任长江局秘书长,除了党务行政工作之外,实际上主要负责情报和机要工作。

1938年4月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张国焘和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同祭黄陵后,张国焘对护送他的警卫人员说他到西安有事,请他们先回去,然后带着警卫员张海钻进了国民党为他准备好的汽车到西安。他住进豪华的宾馆,与国民党官员特务多次密谈。4月7日在国民党的安排下乘火车到武汉。张国焘到火车站后,在临上火车前给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林伯渠打电话,要林到车站谈话,林伯渠到了火车站,再三追问张的行程,他才说要去武汉。林伯渠加以劝阻,并说有不同意见回办事处去商量,但劝阻无效,林马上拍电报把这一惊人的消息报告了党中央,中共中央发电报要长江局周恩来等人,设法找到张国焘,促其觉悟,回党工作。接



到电报后，周恩来考虑，张国焘在党内非一般人物，劝说他回党工作决非易事。

周恩来把李克农叫到自己的房间，先将电报递给李克农看，并说张国焘坚持错误，现在又私自逃跑投靠国民党，已经上武汉来了。并吩咐道，立即打听西安来武汉的火车到站的时间，让李克农带上童小鹏、邱南章、吴志坚一起去车站接一下，一定要把他接到办事处来，不能空手而归。临走时周恩来又叮嘱：见面时要以礼相待，说是王明、周恩来等负责同志派你们来接张副主席的。当时西安到武汉的客车，每天只到一列，时间是下午19时。接受任务后，李克农四人分乘两辆小汽车到火车站去拦接张国焘。火车到站后，大家分头站在车厢门口，注视来往的每一个下车旅客，可就是没见张国焘。只得回到办事处向周恩来报告。李克农估计，因林老发现张坐火车来武汉，他可能会临时改变主意，就直接回西安了。周恩来说，有可能，但你们明天照样去接。9日，大家又去了车站，还是空手而归没有接到。到了11日，有人说，张国焘可能不坐火车，改坐汽车了。李克农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再去一次，一定要把他接来。19时，一列从西安开来的列车到站后，下车的旅客中还是没见张国焘的影子，正当万分焦虑时，邱南章跑到最后一节车厢，终于发现了张国焘。李克农他们一行随即来到张国焘坐的车厢里，李克农对张国焘客气地说，是王明同志和周副主席派我们来接你的。张表现出一副惊慌的样子。护送张的两个便衣特务，看到李克农带了全副武装的副官，也不敢吭声。李克农抬高声调说：“我是奉中央的命令接你回家的，请您赶快跟我走，这里太危险！”这时童小鹏等几个人连说带劝，把张国焘扶下车，要他坐在事先停在站台上的小汽车里，两个特务看我方人多，也急忙溜下车，一个去报信，一个还在后面跟踪。张国焘执意不肯到办事处，一定要住在外面。李克农一看不好勉强，张国焘虽然逃到武汉来，但没有公开此行目的，再则，张现在还是身负重职的人，于是只好先同意张的意见，并临时决定让邱南章、吴志坚两人陪张到江汉路找一个小旅馆住下。李克

农临走时，当着张国焘的面对邱南章、吴志坚说：“你们俩一定要保证张副主席的安全，照顾好他的生活。”邱、吴当然心领神会，当即回答：“报告秘书长，我们一定坚决完成任务。”李就和童小鹏、张海回办事处向周恩来报告。

周恩来听了李克农的汇报。当天晚上，李克农便陪同王明、周恩来、博古等到旅馆和张国焘谈话。张不但不认识自己的错误反而认为边区如同“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这充分暴露出他叛离共产党的思想。张在谈话中，还表示是否在相当独立性下与国民党解决党派问题。周恩来、王明等没同他讨论这些问题，只是对他不报告中央，擅自出走的错误提出批评。并希望他回办事处住，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解决。但张仍坚持不住办事处。最后周恩来要张国焘向中央承认错误，并请示对他今后的工作指示。张国焘迫不得已写了一个电报。12日，中央书记处即给张国焘一电，电文是：“国焘同志，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弟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

13日，周恩来拿着毛泽东等致张国焘电报，到旅馆当面交给张国焘看，并晓以利害，张国焘无言以对，但仍坚持不到办事处住。

14日，为争取张国焘早日回到办事处，周恩来和王明、博古、李克农又一起到旅馆去劝张。经耐心劝导张仍不接受。李克农连劝带拉把张国焘推上汽车，同大家一起回到办事处。

张国焘回到办事处后，闭口不谈政治问题，经常借口外出。出去时，由邱南章或吴志坚陪同。张国焘去见过陈立夫、周佛海和已被开除出党的陈独秀等人。还多次向周恩来提出要见蒋介石，称要向蒋报告边区政府工作，周恩来只好同意。在征得蒋介石同意后，16日上午周恩来陪张国焘到武昌见了蒋介石。张一见到蒋介石就卑躬屈膝地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周恩来立即针锋相对地说：“你糊涂，我可不糊涂。”蒋介石看到这场面，也不便再说什么。回到

办事处后，周恩来立即批评了张国焘对蒋介石谈话时的错误态度。这天下午张国焘借口上街买东西和看病，想把吴志坚甩掉。在汉口转来转去，一直到晚上，突然又说要过江去看朋友，吴志坚就紧跟在他后面，到了渡轮码头时，张故意在过江人群后面，当客人上了轮渡快要关闭铁栅门时，他突然跳了过去，想把吴志坚甩在铁栅门外。没想到眼明腿快机警非凡的小吴一下就跳进了轮渡，紧随其后。到了武昌天已黑，吴劝张回汉口办事处，张坚决不去。吴就在旅馆里定了一个房间，让张睡里面，他睡门口。在张国焘不大注意的时候，吴偷写一字条，要茶房给八路军办事处打电话，说张国焘和他在武昌一个旅馆，要办事处赶紧派人来。李克农接电话后，立即派邱南章和警卫人员找到张国焘，并说奉周副主席命令来请张副主席回办事处，张不愿走，他们就连推带拉又把张推上轮渡回汉口。张又坚持不回办事处，邱南章只好把张安置在汉口中山路的太平洋饭店住下。李克农让邱留下，让吴志坚回办事处报告张已决心逃跑叛党的经过。周恩来、王明、博古听了吴志坚的汇报，为了挽救张国焘，决定明天上午同张公开谈判，并商定了谈话内容。

17日上午，在李克农陪同下，周恩来和王明、博古一起到太平洋饭店同张国焘谈判。周恩来对张国焘提出三条，要他选择。第一，回到办事处，回党工作，这是我们希望的；第二，暂向党请假休息一时期；第三，自动声明脱党。张没有答应回党工作，但表示愿意在二、三条中采取一种办法，希望允许他考虑后再定。

对周恩来的仁至义尽的劝说，张国焘仍然顽固不化。在周恩来和李克农等人走后不到一个小时，张就打电话约军统头子戴笠等到饭店谈话，公开表示要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当天晚上，饭店门前来了两辆小车，从车上下来几个便衣特务，走向张国焘的房间，在饭店门口执行任务的邱南章立即大声质问：“你们要干什么？”特务们不容分说就抱住邱南章，另一个把张国焘拉进车里，车开走后，才把邱放开。邱南章回到张的房间里，见到桌上有一张张国焘写给周恩来的字条，内容是“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居

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张国焘就此公开投靠了国民党。邱南章立即回办事处向周恩来报告。

18日晨周恩来即起草了陈、周、博致中央书记处的电报，报告了张国焘脱党情况，建议中央公开开除张国焘的党籍，并迅速向党内军内进行解释。

中共中央随即作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张国焘事件发生后，负责我党情报工作的李克农经常以此为戒，教育广大情报、机要工作者。

1938年10月，李克农根据中央指示，率领《新华日报》社和武汉办事处的部分同志撤离武汉，转往桂林。

#### 4. 在桂林办事处

1938年11月中旬，奉周恩来之命，李克农来到桂林，正式建立八路军办事处。桂林办事处建立后，李克农根据当时抗日战争已进入新的阶段这一特点，在广西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方针，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他在国民党统治区向民众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的方针，宣传持久战思想，团结各阶层人民，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以“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制造分裂阴谋、妥协投降的逆流，贯彻党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统战政策，重点做争取桂系团结抗日的工作。桂系主要是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代表的国民党广西军政实力人物，他们在抗战初期还表现愿意抗日，是可以团结的中间势力。中国共产党可以利用蒋桂之间的矛盾，巩固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孤立、打击蒋介石顽固派。而广西地方实力派，也想利用中国共产党的声望，加强其在广西的统治地位。

在统战方面，周恩来、叶剑英曾多次亲自出马赴桂林，直接与桂系领导人接触，很快打开了局面。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上任后在作礼节性拜会广西省主席黄旭初时，黄问李：“广西有没有共产党？”李克农回答说：“有是有的，不过不会找你们的麻烦，若说没有

共产党,那是骗你,我就是嘛!”坦率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广西旨在团结抗日。

李克农通过在广西国民党地方党、政、军内部任职的中共秘密党员和可靠人士开展工作。如从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谢和赓、桂林行营参议刘仲容、刘昌群、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机要秘书左洪涛等人那里,了解到许多重要情况。李克农很重视做团结广西国民党民主人士的工作,如李任仁(同盟会会员,时任广西临时参议会议员);李济深(国民党元老,任军委会桂林行营办公厅主任);陈劭先(同盟会会员,广西省政府顾问);陈此生(国民党文教界进步人士、广西建设研究会主要成员)等。这些人士在桂系中有广泛影响,与蒋介石也有矛盾,并且坚持抗战,通过他们做桂系首脑和上层人物工作,比较有利。他们还以合法身分及其社会关系,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掩护中共秘密党员的工作,并与桂林办事处保持密切的联系。

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倡建的“广西建设研究会”,李为会长,白和黄为副会长,李济深为名誉会长,这个组织虽然是以学术研究为名,实质上是政治活动机构,又是李、白、黄的智囊团。这个研究会桂系联系各方面政治势力的纽带。李任仁请李克农到八桂厅(会址)吃饭,李克农从不推辞,并利用这些机会与各界人士联系,了解形势和国民党内部动态。这些民主人士比较敬重李克农,经常与李克农进行坦诚的交谈,谈目前时局,谈民族命运,谈国共合作。在与李克农的接触中,这些爱国民主人士逐渐了解了共产党,了解了八路军。

1939年初,广西当局为培养地方基层骨干,开办了“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李任仁向黄旭初推荐,聘请杨东莼为干校教育长,杨是救国会员、历史学者、教育家,是中共秘密党员,直接受李克农单线联系领导。杨东莼在经中共党组织同意后才应聘的,该校校长名义上是黄旭初兼,但校务实权掌握在杨手里。李克农为帮助杨东莼把干校办成培养抗日骨干的学校,并通过杨选派了一批共产党

员,进步文化人上到校任教,还曾邀请叶剑英、胡愈之、沈钧儒、夏衍等人到校讲课。该校不仅培养了大批地方干部,还发展了不少中共党员,对广西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随着形势的发展,桂林成为我国西南抗日的后方,大批爱国进步人士云集桂林,这是一支很大的文化力量。作为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必然肩负起对西南抗日文化工作的领导重任。

1938年11月,《救亡日报》从广州撤退来桂林筹备复刊时,李克农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特意安排刘仲容帮助夏衍主编会见李任仁,李任仁还亲自陪同夏衍拜会省主席黄旭初,以争取广西当局对报社的支持。该报于1939年1月10日复刊后,是桂林文化界救亡宣传活动的—个主要阵地。

夏衍后来对李克农在桂林八办的工作,有一段非常生动的回忆。他说:“当时的政治情况非常复杂。要求团结抗战的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之间,国民党内部各派之间,甚至各种救亡团体内部的左中右之间,都有复杂微妙而又随时变化的矛盾,而我们这一群没有实际斗争经验而又主观偏执的知识分子,对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一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还缺乏应有的理解和认识。我们接触面不广,又自命清高,不愿意去和那些话不投机的上层人物来往。我们刊物的言论又只懂得直说自己的主张而不善于利用各方面的矛盾,李克农一再和我说:‘站在外面骂娘算不得勇敢,深入敌垒去影响他们,才是你应尽的本份。’他又说:‘把腿放勤快些,把耳朵放长一些,多跑、多听、多交朋友。你得认清这个时期,这个地方,和菩萨要打交道,和恶鬼也要打交道。我知道你们怕脏……然后纵声大笑起来,说:‘文化人同志,革命的统战工作,戴白手套行吗?’这些话直到今天,还回荡在我的脑际。李克农和我们相处的时期,总是有说有笑,和家人子弟—样,可是一碰到政治原则问题,他就坚持到底,没有丝毫的随和妥协。有一次《救亡日报》发表了一篇对国际时事分析有政治性错误的文章,他跑到编辑部来和我长谈了四五个钟头。这个时候,他脸上流

露出来的那种严肃的神色，在我经验中是罕见的。‘不能把这张报纸的作用估计得过高，也不能把它估计得太小。《新华日报》被扣得厉害，西南、东南乃至香港，都把这张报纸看做党的外围，代表党讲话，那么你想想，把这么严重的国际问题作了错误的分析，对外面会起多么坏的影响！’他耐心地分析了国际形势，指出了错误所在，然后正襟危坐地问：‘怎么办？’‘明天再写一篇社论，纠正过来’。‘怎么写法？来大家凑凑。’把社论搞好，已经很晚了，我透了一口气说：‘很好，我学会了不少东西。’他看了看表，一本正经地说：‘学会了东西，能不付学费吗？快八点了，阳春面也不请一碗？’他站起来说：‘好，我请。’这样一讲，气氛立刻变了，我从心底里感到温暖，严师、益友和亲密的同志这几种概念，浑然一致了。”

翌年春桂林出版界日益活跃起来，各种报刊杂志相继出版发行，其中主要有：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办的《中国农村》、救国会办的《国民公论》、救亡日报办的《十日文萃》等。总之李克农领导下的办事处通过办刊物发表文艺作品，运用文艺武器宣传抗日救亡，他们团结合作，掀起了抗日文化宣传活动的热潮，使桂林成为西南抗日文化运动的中心。

1940年末，在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前夕，广西政治形势恶化，李克农向桂林的文化界党员传达了中共中央有关指示，并有计划地安排进步文化人士撤退、隐蔽。

李克农把筹运军需物资输送革命干部作为办事处的一项重要任务。上海、广州沦陷后，由海外沟通国内的运输线，只有从海防入口，经镇南关进入广西这条通道。而桂林西通滇、贵、川、陕，东达湘、赣、浙、皖，是重要交通枢纽，是抗日大后方，又是通往新四军地区的要道。香港筹集的物资，主要靠这条通道运输。1939年冬，我江南新四军连冬天盖的被毯也没有。中央来电要办事处运用各种方式通过关系，把能够弄到的军用品弄到手，抢运各地。办事处了解到柳州军需仓库运到大批军毯，开始仓库不承认存有军毯，经过同仓库人员交朋友、谈心，获知那些仓库存有军毯。但因国民党军

政部已下过密令，不准发给八路军、新四军使用。经多方交涉争取，终于把成万条的美制军用毛毯弄到手，又通过押运人员和司机把军毯运回桂林。可是驻桂林的国民党军需司却不准开车，要把它运回仓库去。李克农对大家讲：统战法宝现在要同武装力量结合起来运用了。于是，一面派办事处的警卫同志武装把守汽车不准移动，一面又到军需司去交涉，通过由下而上的统战工作，经过两天的婉转交涉，才把运费记在新四军的帐上，有关当局也被迫同意，将成万条的羊毛军毯运到新四军去。

在李克农领导下，办事处还担负着接待护送过往秘密党员、干部及爱国华侨、革命青年奔赴延安的任务。不少侨胞、爱国青年被送到延安学习。

1941年1月7日，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桂林的政治局势急剧恶化，桂林办事处已被国民党军警特务包围，来往人员断绝。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奉令于1941年1月20日撤销。工作人员分批撤离桂林，李克农连夜率领大家闯过十几道国民党反动军警把守的关卡，安全抵达重庆红岩咀八路军办事处，继而转回延安。

## 在延安中共中央社会部

1941年3月，李克农从重庆返回延安后，担任党的情报和保卫工作的领导职务，先后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部长、中共中央情报部副部长、部长等职。

从重庆到延安，从白区到解放区，从隐蔽斗争到公开的领导工作，工作环境变了，工作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尤其是为了和毛泽东的工作规律一致起来，李克农也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凌晨一点钟开始办公，有情况随时向毛泽东请示汇报，但由于工作面广，战线长，情报部门每天到这里汇报工作的人很多，所以他白天也难以休息，超负荷的工作量和严重的睡眠不足，使李克农在延安



的几年显得衰老了许多。

在抗日战争时期，李克农参与了对各地秘密情报组织的建设，派遣我情工人员深入到日、伪、蒋的党、政、军、特机构中，获取了日伪的大量军政战略情报和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情报，对配合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在抗日战争即将结束时，他就考虑到内战的危险存在，指示在敌区工作的同志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要作长期打算，要充分利用国民党接收敌占城市等有利时机，积极向国民党的各个地区发展。并指示各地情报组织要以军事情报为主，同时要做好国民党各派系的上层联络工作。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大搞假和平阴谋，连发三电，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事。毛泽东毅然赴渝的壮举，使老蒋如意算盘落空，气得他大骂：“娘希皮，军统中统都是饭桶”。鲜为人知的是：党中央、毛主席英明决策的背后凝聚了李克农和他领导的情报系统的极大心血。

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后，党中央、毛主席日夜思考和研究对策。李克农的心里也像压着块重重的石头。为了弄清敌人的真正意图，他果断决定：日夜监听国民党的电讯，从中捕捉信息；指示边区交际处长金城约见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故意泄露一点“情报”，诱使他们电告重庆，以便破译密电码。果然，当晚便监听到了敌台的波长和呼号……限于当时的条件，密码二、三天内很难破译，于是，李克农派遣“能人”从敌人手中智取了密电码。

一份份被破译的密电摆在了李克农面前。他不放过每一个字，认真分析研究后认为：蒋介石断定毛泽东不会应邀，也不敢应邀。他深知毛泽东从秋收起义至今从未离开过根据地。如果毛泽东不来，就把破坏和谈、引发内战的罪名扣在共产党头上；毛泽东若来，正好拖住他争取时间作好进攻解放区的准备。正基于此，重庆的报纸在邀请电发出后便刊登了蒋介石的谈话，称：“国家的前途，取决于这次会谈”。李克农火速将这些情报报告党中央和毛主席。

毛主席两次接见周励武、罗伯伦，谈及因公务繁忙，无法脱身，先不准备去重庆。为团结大计，先派周副主席前往晤蒋，将来再相机赴渝。

毛主席的明确态度，使周励武喜形于色，立刻电告上司：毛泽东决不会去重庆。蒋介石不禁得意，决心把这场假戏唱到底。

1945年8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集体决定：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蒋介石既然假邀请，我们就弄假成真，取得斗争主动权。谈得成就谈，谈不成也揭穿了蒋的阴谋。历史事实证明：在政治斗争中，共产党总比国民党棋高一着。

8月27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自告奋勇与张治中一起飞赴延安促驾。28日上午，毛泽东会见了赫、张。周励武得知周恩来下午将飞往重庆时，又密电报告：毛泽东无意去重庆。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此电送到老蒋手中的同时，毛泽东已登上了飞赴重庆的飞机。

28日下午，延安东郊机场人山人海，数万军民为毛泽东送行。李克农一直守候在机舱口，不准无关人员登机。他深知中央这一重大决策与他提供的情报密不可分，而这一决策又直接关系到主席的生命安全。当主席把宽厚的大手伸向他时，他紧握不放，深情地说道：“主席，你要多保重……”便哽住了。人群中传出了呜咽之声。

毛泽东在重大决策前总是深思熟虑，一旦决定了，便会轻松无比。他笑着说：“克农啊，男儿有泪不轻弹嘛！这回去重庆，刚好和分别20年的蒋介石见见面，有啥子不好嘛。你看你们都用这咸豆豆欢送我，你们知道我见不得这个……”

赫尔利最后一个爬上舷梯，只见他双手抓住机舱门，头向后仰，“噢、哎、呀！”的大声怪叫。李克农心中猛然一紧：难道这其中有什么诈，中了美国人和蒋介石的圈套不成？他向美军驻延安联络组长包瑞得厉声问道：“赫尔利这是什么意思？！”“赫是牧羊娃出身，这可能是他早年养成的在欢快得意时的一种表现吧。”包瑞得解释道。

不错，赫尔利太得意了。蒋介石连发三电没请动毛泽东，而他

却将毛泽东请上了飞往重庆的飞机。内心的狂喜竟使他情不自禁怪叫起来。

得知毛泽东将来重庆，蒋介石如遭电击一般惊呆了。国民党阵脚大乱。因为他们没有准备任何谈判的方案。而我方在谈判中则一直处于主动地位。

重庆。林园官邸。蒋介石举杯向毛泽东敬酒。他在笑，却很尴尬。他恨自己的情报机构无能，导致谈判处处被动；毛泽东也在笑，他赞赏李克农的情报准确及时、高度保密，为我党对敌斗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 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

1946年1月，国民党代表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在重庆签订《停战协定》，双方同时下达停战命令，并组成由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政府三方面代表参加的“停战军事三人小组”和“军事调处执行部”，其任务是执行停战协议，调处国共冲突。军调部停战军事三人小组由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和美国各派一名委员负责，并由他们分别率领各方的代表团开展工作。叶剑英是中共方面的委员，中共代表团团长；李克农任中共代表团委员、秘书长和党总支部书记。对外李克农与叶剑英一道出席三方联席会议，主持交涉、交际、新闻发布活动。对内李克农则统管代表团党务、政治思想、秘书、机要、通讯、编译、救济、警卫等工作，同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阴谋活动进行了全面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分两个地方居住，北京饭店住一部分同志，翠明庄住一部分同志。李克农住在翠明庄。

翠明庄对面的楼房里都驻有国民党特务机关，庄里面服务人员也都是国民党特务和特务组织指派有特殊使命的人。当时我方的工作人员行动，都是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的监控之下。

有一天李克农和耿飏坐在沙发上谈话，不小心把一杯茶碰倒

在地，李克农在收拾茶杯的时候，发现桌下的地板有些松动，他们把桌子搬开，掀起地毯，把活动的地板撬开，果然发现里面装有窃听器。

李克农当即决定把窃听器按照原样放好，然后把国民党代表找到翠明庄，当着他们的面把暗藏在地板上的窃听器挖出来，国民党代表面红耳赤，无地自容，露出一副尴尬相，憋了好久，才语无伦次地说：“这……这个不关我们的事，是他们……嗯，我们回去一定严肃处理，严肃处理……”

李克农还分工负责领导电台和机要通讯，平时非常关心大家，工作上严格要求，生活上体贴入微。当时在机要科工作的萧鹤说：我刚调到北平执行部机要科不久，李克农秘书长便找我和同志们谈话，问寒问暖，以及个人的工作生活情况，接着便严肃地教导大家如何在特殊的工作环境下，完成好党的机要通讯任务。李克农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机要和电台是美蒋反动派妄图破坏的重要目标，他们现在已经集中了国民党和美、英、日等国一百余名破译人员，力图侦收破译我党的密码电报，窃取我党我军最高机密情报。为了国家和人民，我们顾全大局，与美蒋和谈，他们则是假谈真打，我广大指战员在前方浴血奋战，人民也还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我们要胸怀革命大局，时刻想着人民和前方的战士，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克尽职守，努力完成军调部的工作任务。你们是机要干部，就是要机密、准确、及时地完成机要通讯任务，确保我党密码的安全和密码电报的畅通。我们如果稍有疏忽，出了漏洞，就可能被敌人所利用，对人民犯下大罪呀！……”

最后李克农又告诫大家如何在白色恐怖下保持崇高的革命气节，他关切地指出：“我们代表团的每个机要人员，在国民党特务机关那里都登记造册了，有相片、有职务、甚至有履历表，而且这里的生活条件比在解放区优越得多了，但是，我们共产党员，要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崇高革命气节，为革命献身，乐在其中，死得其所。”“当然，我们也要具有机智的头脑，善于对敌斗争，特别是

要提高警惕，具有随时应付突然事变的能力。机要干部，更要自觉遵守革命纪律，尽可能避免敌特挑衅而被捕的危险。总之，在白色恐怖下，你们要锻炼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红色传令兵，不可辜负党对你们的信任和重托！”

李克农这些亲切的话语，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同志们都下定决心：确保党的机密，严守革命纪律，提高警惕，以防突变。

为了保密和便于开展工作，机要部门和电台都集中在翠明庄的南楼，李克农要求大家，一切生活自理，不允许饭店服务人员进入楼内。大家都认真遵守各项保密规定，工作完后，马上把密码、电报妥善锁在柜里，同志之间从不随意交谈有关保密工作，也不随便打电话。在工作中严禁外人进入办公室，万一有外人来了，大家立即停止手上工作，并有专人跟随，使国民党特务们无任何可乘之机。

1946年2月21日，国民党反动派通过精心密谋策化后，用行政命令的办法，诱骗煽动了北平不明真相的部分青年学生闹事，举行了所谓的“反苏、反共的游行示威”，并同时纠集一些地痞、流氓和部分暴徒，以“东北还乡团”的名义，企图砸毁叶“公馆”和“夜袭”中共代表团驻地翠明庄。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由于我们提前一天及时获悉敌人的阴谋，叶剑英离开了“公馆”。22日晚，李克农便组织一些外国记者到“公馆”，晚8时许这些暴徒突然闯入叶“公馆”准备破坏，但一见在此恭候多时的外国记者在场，眼看他们的阴谋要败露，就赶紧草草收场狼狈地逃窜了。

在翠明庄，李克农立即向全体人员做了紧急动员，部署了重点保卫南楼，确保党的机密的安全措施。要求机要部门做好一切应急准备，分头守卫电台、密码、机要文电，并准备好在非常情况下可以立刻销毁密件等一切应急方法。22日晚8时，翠明庄突然停电，楼内一片漆黑，但同志们各守其责，严阵以待，终使美蒋阴谋又一次破产，以后也没敢来“夜袭”翠明庄。

这起严重危害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安全的政治事件发生后，我代表团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叶剑英多次向饶伯森、郑介民交涉，饶郑二氏才同意以执行部三委员的名义，向北平市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电请蒋介石从严惩处为首分子。与此同时还举行新闻记者发布会，进一步揭露真相，谴责国民党当局的特务活动。在大量事实面前，国民党代表郑介民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事后，郑介民大骂特务们说：“这样机密的事，怎么共方事先就知道了？你们都是些饭桶！”

李克农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在叶剑英领导下工作了一年多，同国民党政府和美国代表进行了艰巨复杂的谈判斗争，全面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平，挑起内战的阴谋。

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存在了一年零一个月，即以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而宣布军事调处的无果而终。

李克农长期负责党的保卫工作，他把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作为首要任务。1947年3月，胡宗南进犯延安。党中央撤出延安后，李克农为确保毛主席和中央前委的安全，从原中央警备团抽调了一个骑兵连和三个步兵连组成精干的警卫部队，随前委行动。同时，向绥德、陇东、三边派出了三个侦察站，配备了电台，直接为保卫中央前委服务。此后，李克农与杨尚昆一起在中央后委工作，并针对蒋介石密令胡宗南“不惜一切代价捕获中共首脑部”的阴谋，侦悉了胡宗南进攻陕北的大量军事行动情报，确保了毛主席和中央前委的安全。

在解放战争中，由于李克农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党和军队的情报工作得到了广泛深入的发展。为配合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我情工人员深入到国民党的机密决策指挥机关内，及时准确地供给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及各地区战略性和动向性的重要军政情报，为党中央和毛主席研究战局，制定解放战争的战略方针，提供了重要依据，使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对敌人的主要情况了如指掌，始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毛泽东评价这个时期“我们的情报工作是

最成功的。”

1947年10月，我党在北平的情报系统部分遭到敌人破坏，一些同志不幸被捕。此事件的发生很可能会殃及已打入国民党胡宗南部、后被胡送到美国留学的陈忠经、熊向晖、申健等三人，他们面临被国民党引渡杀害的危险。李克农忧心如焚，两次亲自起草急电指示东北情报组织商请苏联方面设法营救。同时报告党中央请以中央名义给苏共中央发电，由苏驻美机构想办法让他们离美回解放区，并附上给三人的电报，要他们按中央指示行动，万勿回国民党统治区，免遭无谓牺牲。当获悉他们已经离美时，又电告香港我有关方面周密接送，使他们安全归来。

1948年，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由中情部主管策反工作的指示，李克农参与策动了和平解放北平、湖南、川康、云南、西藏等地的工作，并成功地组织了国民党多起海空军起义和“两航”起义，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解放，得到了党中央的赞扬。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与党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为确保毛泽东与中央机关的安全，任先遣队队长的李克农率先遣队提前到达北平。因北平和平解放不久，情况仍十分复杂，李克农率安全保卫机关在几个月间就破获潜伏特务制造的各种阴谋暴动案达80余起，抓获特务骨干分子近600人，反动党团和特务分子自首登记的近2000人，清查和处理散兵游勇3700多人，还查获大批敌特电台、枪支及弹药，有效地保证了毛泽东和中央机关的安全。

## 建国后所从事的外交和情报工作

### 1. 陪同毛泽东访苏

新中国成立后，李克农坚持贯彻我党情报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经常以情报工作没有和平时期来教育干部，保持常备不懈。

李克农除担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外，还被任命为外交部第

一任常务副部长,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负责外交部的筹建工作。他充分施展了外交家的卓越才能,协助周恩来,竭尽全力地完成了外交部的组建工作,成为外交部的创建者之一,对李克农的开拓之功,周恩来始终念念不忘。

建国初期,我国外交的一项重大行动是毛泽东出访苏联。1949年12月6日,一列专列离开北京,迎着寒风,呼啸着向北驶去。这是毛泽东平生第一次出国远行,事先采取了严格的安全措施。为确保此次访问成功,中央特派公安部长罗瑞卿和李克农两员大将亲临专列“保驾”。

当专列路经天津时,因发现路轨上有一枚手榴弹,罗瑞卿下车调查处理此事,由李克农继续护送到边境车站满洲里。

行车途中,李克农与毛泽东形影不离,过去因工作关系他虽经常接触毛泽东,但像这样朝夕相处还是第一回。李克农除了和毛泽东谈古论今,讲讲笑话之外,作为情报工作的主管,是不会放过机会与毛泽东谈谈情报工作的。

一天,在毛泽东用过早餐之后,李克农便有意问道:“主席,你知道美国总统上班后第一件事干什么吗?”

李克农的问话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抬起头,“哦”了一声,便等待着李克农如何解释下文。

“美国总统上班后第一件事是看情报概要。不然,这一天,他不知道怎么说办事。”

谋略过人的毛泽东已明白了李克农此话的用意,微微一笑说:“我不是美国总统,我是随来随看,你这个克农,还给我上什么课,我不怕东西多,就怕没东西。”并答应李克农:“我这次去莫斯科还要唠唠你们那档子事。”

## 2. 抱病赴朝,执行停战谈判的使命

50年代初,我国最重要的一次外交斗争——朝鲜停战谈判的使命又落在了李克农的肩上。

谁去面对美国这个强大的谈判对手呢?毛泽东权衡再三还是



“点了李克农的将”。李克农抱病入朝，开始了一场“马拉松”式的斗智斗勇的外交大战。

虽然中朝方面的谈判首席代表是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但实际总指挥却是李克农。谈判期间，李克农一方面直接用电台与党中央保持联系；一方面与彭德怀元帅默契配合，一打一谈，“打的坚决打，谈的耐心谈”，使得敌人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同样得不到。难怪敌人在谈了一阵之后，便察觉到他们谈判的真正对手并不在谈判桌上。

美方曾对军事分界线划分的问题提出了很多无理要求，并采取拖延战术企图逼我让步。谈判一度陷入了僵局，沉默代替了争辩，双方互相对视，展开了一场心理战。一分钟，两分钟，一小时，两小时……这是一场高度紧张的精神战，是一场意志、毅力、忍耐力、克制力的对抗。美韩代表的目光游移了，中朝代表的目光中透出了焦灼。

李克农向离开会场前来汇报的柴成文指示道：就这样“坐”下去。当“坐下去”的纸条传遍每一位谈判代表时，大家像喝了一杯浓浓的咖啡，抖起了精神，挺直了腰板，目光中露出了咄咄逼人的气势。“静坐”僵持了132分钟，美国首席代表乔埃忍耐不住终于开口了：“我建议休会，明天上午10时继续开会。”“继续开会”而不是“继续静坐”，这就意味着美方“拖延施压战术”的失败。

以慢对慢，以拖治拖。谈判对手不得不佩服中国人的智慧，并深感谈判的幕后策划者不好对付。

中共中央虽早已确定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但美方认为自己在三八线以北占的地方多，故拒不承认。这个问题不解决，谈判便会旷日持久地拖下去。李克农和邓华、解方等代表团成员反复研究、讨论后认为：美方在三八线以北占地虽大一些，但多是山区，交通不便，人口少，耕地少。而中朝军队在三八线以南所占地区多是平原，交通发达，人口多，产粮多，还产高丽参，又拥有开城古都，政治影响较大，全面衡量美方并不占什么便宜。与南日大将商议后，

李克农请示中央，大胆提出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建议。毛泽东、周恩来立即批准了这一建议，从而达成了军事分界线和非军事区的协议。

谈判的艰苦与劳累，致使李克农严重的哮喘病复发，每天靠打吗啡入睡。心脏病也越来越重，有一天竟突然昏迷。中央决定由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赴朝接替李克农工作，换他回国休息和治疗。

李克农深深感谢党和同志们对他的爱护，但他主张“临阵不换将”。他说：现在谈判正处在双方互相争执、指责最激烈的时候，每天都可能发生新情况，我熟悉谈判各方面的情况，便于及时作出决策。中途换人，重新熟悉情况，很可能延误战机，给党的利益造成损失。我的身体还能支持，应继续留下来。

他的精神与毅力，使中央收回了成命，但再三告诫他要珍惜身体。

作为我国党和政府的特派代表，李克农实际上是我方谈判代表团的最高领导。他根据中央的指示，与朝鲜党和政府协商后，全权处理谈判中的各种问题。但他的名字却见不了报，就连他人朝鲜也属绝密之事。可这位无名英雄肩上的担子却是那样的重：他每天都在研究资料、讨论问题、批阅电报。每次谈判后，他都及时听取谈判汇报，待乔冠华等人写成报告后，他亲自审核修改并提出下一步的方案直接报给周总理。再于当夜接收中央的指示。收到后，一面转发给朝鲜方面，一面根据指示精神做出下一次谈判的具体部署，由乔冠华等人连夜写出发言提纲，供谈判代表第二天使用。这些工作一环套一环，昼夜连轴转。李克农仅有的休息时间就是向北京发报后到中央回电前的这段空隙。他时常咳嗽得喘不过气来，便一把一把地吞止咳药。同志们为他的健康担心，可他却一边喘着气一边给大家说笑话，给严肃、紧张的工作增添了不少欢快的气氛。

就在停战协定即将签字时，李承晚在美军好战分子的纵容下，冒天下之大不韪，以武力扣留了 27000 多朝鲜人民军战俘，局势又严峻起来。中央决定发动一次惩罚李承晚的战役，迫使美方做出李

遵守停战协定的保证。李克农在和从北京回到平壤的彭总通话时分析道：李承晚现在是狗急跳墙，想扣留战俘制造危局，但这种危局很快会过去的，我们坚信你很快会到开城来。

果然，彭总指挥的金城战役共歼敌 7800 余人，收复失地 1780 平方公里。沉重的打击使李承晚不得不坐下来老实签字。

1953 年 7 月 26 日，停战协定签字的前一天，中朝代表团驻地充满了喜庆气氛，多少人流血牺牲，历经千辛万苦期盼的和平时刻就要来临了。就在人们准备拥抱胜利的时候，李克农却眉头紧皱，思索着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他对大家说道：李承晚极端仇视停战，他所以接受停战是中朝军队的打击和美国安抚的结果。他会不会甘心？可不可能在签字时进行破坏，搞一次使敌我双方不得不再打起来的毒辣行动？比如说对双方司令官中的任何一人进行袭击，它的后果将比扣留战俘更为严重。一经提醒，大家立刻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更佩服李克农在胜利面前头脑的冷静。李克农接着说，我们可以拒绝李承晚的人进入板门店中立区，但不可能完全限制记者进入会场，为避免出问题，双方司令官不到现场签字，改由双方首席代表签字后，立即生效，然后各自向自己的司令官送签并互换文本。

李克农的妙计立即得到了中央的同意，因为北京也正在考虑此事，耐人寻味的是美方也很快接受了这一提议，看来不放心李承晚的不止一家。

1953 年 7 月 27 日上午 10 时在朝鲜板门店，我方首席代表南日大将与对方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先行签字，然后送朝鲜人民军司令金日成元帅及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上将分别签字。

1953 年 7 月 28 日上午 9 时 30 分，彭德怀在李克农的陪同下，来到来凤庄，庄严地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

停战的消息一传开，中朝军民欢呼拥抱，庆贺胜利。李克农的脸上也漾出了微笑。不久他秘密返回了祖国。

李克农作为我方谈判的总指挥，在那没有硝烟的战场上，面对

极其尖锐复杂的情况，以他高度的智慧、坚强的毅力、忘我的精神，运筹帷幄，一次又一次地粉碎敌人的阴谋，历时两年，终于为中朝人民赢得了和平成果。虽然当时人们并不知道他对制止这场战争作出了多大贡献，但是历史不会忘记，子孙后代不会忘记他为祖国立下的伟大的功绩。

### 3. 随同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

1954年4月，完成朝鲜停战谈判归国不久的李克农还未从极度紧张的谈判中喘过气来，又被中央指定为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随同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参加大型的国际会议。而此时的李克农已是患有严重疾病的人。早在1953年2月7日，负责中央首脑保健的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曾专门将李克农的病况向周恩来递交了一份报告。报告说：“李克农自1943年起，即有发作性心前区疼痛病状，每年发作一二次。去年则加重了，每月发作五六次，今年返京后，每天都发作，昨晚并曾晕倒，昏迷了五六分钟才清醒。今早苏联大夫和黄树则同志会诊，诊断为‘冠状动脉硬化’及‘过度疲劳’，建议到医院检查治疗，李克农尚未同意。安眠药平常服量为0.2毫克，他竟服过0.8毫克，我已再三劝他不能这样用，如此用下去有中毒的危险。”

周恩来闻知，颇为焦虑，连忙把报告送到毛泽东处。3月4日，毛泽东亲笔在报告上写下了如下批语：

“尚昆同志：克农这样对自己病状的处理是很危险的，请你劝他遵医嘱休养，并决不可那样服药法。”

身心疲惫，肺气肿，伴发心前区疼痛……患有多种疾病的李克农已不宜过度劳累，更不宜再远涉重洋，参加大型的国际会议，但这种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形象的重大政治活动，作为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的李克农又不能不在入选之列。更何况，对于李克农敏锐的政治洞察力，非凡的外交才能，周恩来是最深知不过的。正因为如此，党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率团参加日内瓦会议，周恩来立即批示：关于代表团人选，“告李（克农）副部长先行讨论，3月

2日上午提出名单”，关于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请李副部长决定”，关于会议对策、编印资料、业务分工等，“请李提出方案”。不几天，李克农便完成了批示的任务，但提出他不适于参加代表团的建议，其理由有三：一是“情报部三个部门的年计划刚通过，需贯彻实施”；二是“我无国际知识，不懂外文”；三是“身体不健康”。

周恩来接受了李克农关于出席会议人选的建议，却否定了李克农不参加会议的请求，而且指定由李克农抓总，参加会议的工作人员和记者人选均由李克农全权决定。重托在肩，李克农二话没说，全力以赴投入出席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之中。

代表团工作班子多达100多人，除配备翻译、医生、司机、厨师外，公安部还特意带了一批小白鼠，后被周恩来发现，他吩咐从飞机上搬走，但李克农为确保周恩来的安全，仍安排侦保、化验人员随团行动，以防不测。在安排医务人员时，李克农把自己的保健医生史书翰换成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周尚珏。

原先，派史书翰是傅连璋直接向周恩来建议的，他认为“医生除黄树则外，另派史书翰。因史随李克农同志在朝鲜将近两年，工作认真小心，对克农身体甚为熟悉”。

黄树则接受任务后，曾分别报告杨尚昆、傅连璋说：“李克农同志多年来患肺气肿症，并时常发生气喘及左胸前区疼痛。他前晚感冒发烧，在热度较高时均有明显的前区病痛”。黄还有一种担心，是李克农这样的身体状况在长时间飞行途中很难保证不发生意外，而他没有在飞机上抢救病人的经验，最好派一名苏联大夫陪同。李克农闻讯后坚决不同意，他说：“死不了，让李连水去，就够照顾我的了”。

长期担任李克农警卫员的李连水，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便成为李克农唯一的随从。当时任中国代表团新闻联络官的熊向晖说，当年李克农同志抱病领导我代表团的各项准备工作，一丝不苟，迅速周到。

李克农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对会议将要讨论的和代表团可能

涉及的政治性问题和各种情况，分别拟出详细的预案，报送周总理审定。关于朝鲜和印度支那方面的问题就拟出近 20 篇发言稿。这些稿子为周总理临场发言提供了充分的准备。李克农还组织外交部等 10 个单位编写有关资料，共计有朝鲜问题、中国基本国情和对外政策共 12 大本，1700 多万字。

从 3 月初到 3 月中旬，我代表团大部分成员都集中到北京进行编组培训，大家都严格按分工，熟悉情况，学习方针和政策。李克农还指定专人向全体人员介绍国外情况和外交礼仪，学习有关法令和瑞士风俗习惯等。李克农还亲自作了保卫保密的报告。在李克农领导下，对译员、机要员、打字员、速记员都进行严格的培训和测试。

周恩来总理及代表团主要成员于 4 月 20 日下午抵达日内瓦。此时周恩来中文和英文的书面简历已经广为散发，这一简历是由李克农主持草拟后，未经总理迳报中央审定的，内容长达 5 页半。简历写道：“周恩来，生于 1898 年，中国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毛泽东的最亲密的战友之一。”其中“最亲密的战友”这种提法，以前恐怕尚未使用过。李克农认为：宣传周恩来就是宣传新中国。这充分说明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周恩来的信任，也反映出李克农对周恩来的敬重和深厚的战友情谊。

会议从 4 月 26 日开始至 7 月 21 日，李克农出席各种会议约 50 次，每次会议平均 4 小时。李克农除参加这些会议外，还要和有关代表团进行会外会谈，非常辛苦。但他自比“毛驴子”仍要多“驮”一些。当时印度没有能够参加日内瓦会议，尼赫鲁派他的代表梅农到日内瓦活动，他经常到我代表团来，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为了不影响周总理和其他代表，克农常常自己出面与之会谈。

在会议“保卫”工作中主要依靠瑞士，内部警卫主要靠自己。李克农提出：专业人员与一般人员相结合。代表团每个工作人员都要作总理的保卫工作。总理和代表团住的别墅，难以保密，为了防窃

听,李克农利用别墅的马厩布置成内部会议室,很象一个“沙龙”,这样既防止了泄密,又美化了环境。

除此之外,李克农感到会议公开情况由随行记者发回新闻不够多,使用自己的名字编写《每日简报》,电告外交部并抄送中央领导同志,这些简报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深受好评。

4月30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宴请周恩来和英国外相艾登,这是中英两国外长第一次直接会晤。会见后,李克农就这次会晤电发了《每日简报》,翔实地介绍了会晤情况。《每日简报》十分生动,很能说明问题,引起各界的高度重视。李克农等同志在日内瓦会议幕后大量辛勤的劳动和周总理与各国代表团成功的外交接触,迅速打开了外交局面,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新中国以其鲜明独立的外交风度,活跃在国际舞台上。

繁重的事务性工作,紧张的外交活动,又使李克农的病情加重了,直到归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未恢复过来。

李克农的出色工作得到了党的高度评价。1955年7月,经党中央批准,李克农可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书记处会议。这项重要决定不仅表明了党中央对李克农个人的极端信赖,而且也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于李克农为代表的在隐蔽战线上默默工作,无私奉献的情报战士的高度信任。

## 战斗到生命最后一息

1957年10月25日,与往常一样,李克农一大早就起床,在庭院中散步。散过步回到室内,他感到有些胸闷,便吃了两片药。午饭后,他仍觉头昏,想出门走走,刚迈出门槛,便失去控制,栽倒在地上,后脑勺被重重地摔在台阶上,刹那间,李克农陷入昏迷状态。

李克农不慎摔倒、病重的消息很快传到中南海,党中央极为关注,周恩来放下手中繁忙的工作,立刻赶到北京医院,组织力量全力抢救,并亲自过问医疗方案。

三天、四天、五天，李克农仍然昏睡，周恩来再度来到北京医院，吩咐医务工作人员：“你们大胆治，只要尽了力，没有理想结果，不要你们负责”。

在北京医院组织的精兵强将竭尽全力的抢救下，连续昏迷了8天之后的李克农，终于缓缓睁开了眼睛。

虽然李克农从死神手中被夺了回来，但由于大脑严重受损，使他几乎丧失了记忆。从那以后，为了能尽快恢复大脑的功能，他以顽强的毅力，每天坚持记生活日记，把会客、看电影、治疗、甚至连喝水、洗澡等生活琐事都记得详详细细。

为确保李克农静心养病，1960年，中央决定让他完全离开工作岗位。可用李克农的话说：“我们是毛驴子，驮惯了东西，不驮是不舒服的，能驮多少就驮多少。”不图功利，不计个人得失，一生甘为“毛驴子”，这正是李克农生活的座右铭。对于具有特殊性格的李克农来说，不干工作比什么都难受。因此，在李克农的大脑有了一定恢复之后，便按捺不住急切工作的心情提笔给杨尚昆、邓小平写了封信。信中写道：

尚昆同志并小平同志：

我因病休养已近四年，最近医生已同意我可以逐步进入工作。现将我拟做的工作特报告如下，请你和安子文部长、罗瑞卿总长二同志商决批准。（一）拟将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特科）斗争历史，尽可能加以搜集，汇编成册，以利于中组部和军委参考，同时也可以将过去在斗争中的“无名英雄”死有所安，老有所归，幼有所寄，鳏寡孤独，各得其所。这事是很不简单的，需要时间，估计要一年左右，始能初步办到；（二）工作方法：先收集，后集中再分类编写。打算去上海、南京、武汉、重庆、南昌、合肥、北京……等地，借地方组织协助，比较易行。如同意待我行动时再报告批准；（三）干部问题：先在中调部抽调陈养山、潘芳二同志随行，另在总参二部和三部各调一名不脱离职位的干部（秀才），担任编写、访问、档案等工作，此事如能由中组部、公安部再调一二名干部（知道过去地下斗争历史的），



更为欢迎；(四)这一组织不超过 10 人。我正式工作时间，暂定 1961 年 8 月 15 日开始。

就在李克农向中央提出重新工作要求后不久，1961 年初，与李克农患难与共，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革命伴侣赵瑛病故，这意外的巨大打击，无疑是对李克农虚弱的病体雪上加霜。因为，在人的感情世界里，恐怕没有比夫妻感情更凝重更深厚的了。尤其像李克农与赵瑛这对曾经在错综复杂，异常险恶的斗争环境中颠簸流离，九死一生的患难夫妻，所建立起来的感情更是常人所难以想象的。据李克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赵瑛去世后，李克农吩咐他的子女将赵瑛生前的卧室布置及物品都按原样放好，李克农每天临睡前总要到赵瑛的床前默默地坐一会，而后再深深鞠一躬才去安睡。

这一重大打击对李克农恢复病弱的身体无疑会发生不利影响，但他只待身体稍一好转便又迫不急待地重新投入了工作。

1961 年 8 月 28 日，李克农一行离开北京，赴上海开始了他久已酝酿的搜集中央特科斗争史的工作。

到这一年的 10 月 28 日，李克农才返回北京。40 天的日夜奔波，使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剧烈的咳嗽伴随着严重的气喘，搅得他彻夜难眠，什么药物都已无多大疗效。

回京后，李克农只得再次暂时放下工作休养病体，数月后，他的身体稍有恢复，即参加了于 1962 年 1 月 30 日召开的有 7000 多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这一天在人民大会堂庄严的主席台上，李克农聆听了毛泽东主席代表党中央所做的报告。会议期间，他与昔日的挚友夏衍相遇。夏衍笑着问他：“克公，开完会出去休息一下，近来身体……”还未等夏衍把话说完，李克农便接过话茬，挺起胸脯做了一个潇洒的姿势，面带笑容说道：“身体健康，你看。”

听完报告后，李克农突然感到不适，心绞痛发作，他的老友和老部下都劝他不必再到会。

2 月 9 日，已重病在身的李克农被送往北京协和医院。当晚 21

时,李克农的心脏终于停止了跳动。那天,漫天的大雪下了整整一天一夜。

李克农逝世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林彪、邓小平、董必武等都到医院向李克农的遗体告别。经中央研究,在中山公园中山堂设置李克农的灵堂,首都各界和各国驻华使节前来吊唁或瞻仰。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了唁电:“惊悉李克农同志不幸逝世,我们感到无比悲痛。我谨代表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您们,并通过您们向李克农同志的家属表示最深切的哀悼。”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副首相兼民族保卫相金光侠大将等也发来了唁电,沉痛哀悼李克农的逝世。2月13日,公祭李克农同志大会在庄严肃穆的中山堂隆重举行。首都各界2500多名代表参加了大会。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持,陈云、邓小平、董必武、彭真、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乌兰夫、陈伯达、罗瑞卿、习仲勋等参加了大会。

国家副主席,76岁高龄的董必武,在李克农同志逝世的第二天深夜,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挥毫作诗,以示哀悼:

三十年前事已除  
知君才调擅中华  
能谋颇似房仆射  
用间差同李左车  
天不慙遗兹一老  
人如可赎岂千家  
冀袞克绍芝兰秀  
高举红旗降落霞

李克农长期领导我党我军情报工作,是党在隐蔽战线上的杰出代表。历任中共中央情报部长、中央军委情报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

谋长、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并历任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李克农的去世，是我党情报战线上的重大损失。

李克农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创建与发展党的情报保卫事业，呕心沥血，献出了毕生精力。李克农的光辉业绩将永远为世人所铭记。

### 主要参考书目

1. 《纪念李克农文集》
2. 《李克农自传》(国家安全部档案馆)
3. 《中共情报史资料汇编》(一、二集)
4.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
5. 柴成文 赵勇田：《板门店谈判》

# “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恩来生平大事记

(1966—1976)

安 建 设

1 9 6 6 年

**春** 领导并部署北方八省、市、自治区农业工作。2月1日,在国务院召集的北方八省、市、区抗旱会议上作题为《抗旱防涝,争取丰收》的总结报告。3月5日,在北方八省、市、区农业小组汇报会上再作《改造北方农业的落后面貌》的讲话。3月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成立北方八省(市、自治区)农业小组通知》,周恩来任河北北京组组长。三四月间,继续指导和部署华北地区农业抗灾工作。并前往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巡视打井抗旱及春播生产情况。

**2月13日** 同部分驻外使节谈话,要求抓紧对国外的科学技术考察。

**3月8日** 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之后,又连续发生余震。多次主持会议商讨部署抗震救灾工作,并亲往震中地区视察,发表《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的讲话。5月28日,向地震科学工作者作《加强地震科学研究》的演说。

**4月10日** 同巴基斯坦《黎明报》记者谈话,提出《关于中国对美国政策的四句话》:(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三)中国是做了准备的;(四)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界限。

**5月**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5月16日,会议通过中共中央《通知》。根据《通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

**5月25日** 聂元梓等在北大贴出攻击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领导人的大字报。周恩来派人到北大,批评聂搞乱了中央部署,违反党的原则。

**6月16日至30日** 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三个国家。7月1日回到北京。

**6月** 中共中央决定向北京市的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7月24日,周恩来致信刘少奇、邓小平,认为派工作组的方式有其“普遍性和必要性”。

**7月8日** 听取国务院各口汇报开展运动情况,指出:“给人家戴‘黑帮’帽子,又要靠人家工作,这种作法不好。组织结论不能轻易做。”

**7月26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针对宣传中流行的“顶峰”、“最高最活”、“最高指示”等提法表示:关于这些提法,同主席谈过,也和林彪交换过意见,今后在宣传用语上“应当力求科学、准确、恰当”。

**7月底** 根据毛泽东意见,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大会宣布撤销工作组,周恩来承担了派工作组的部分领导责任。

**8月1日至12日** 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

**8月18日** 陪同毛泽东接见北京红卫兵,并发表讲话。

**8月30日** 根据毛泽东对章士钊来信的批示,写下应予保护不受冲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名单。之后,向红卫兵发表讲话,要求尊重宋庆龄,制止冲击宋宅的行动;部署对其他保护干部的多种保护措施。

**9月初** 起草《关于红卫兵的若干意见》,要求红卫兵学习政策,遵守纪律,保证党和国家各项工作不受影响。

**9月** 利用多种场合发表讲话,并制定有关文件,主持起草社

论,强调宣讲要“抓革命、促生产”,主张运动应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

**秋** 红卫兵大串连高潮中,指示国务院有关负责人: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妥善处理好学生串连与生产建设的关系。说:我更担心的是铁路停断和阻塞,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一旦停断,整个国民经济就瘫痪了。为此,每日审看铁路运输生产报表,关注工业交通情况。嘱协助国务院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

**10月** 不同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并向毛泽东面陈自己的意见。

**同月** 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制止红卫兵张贴刘少奇大字报和批斗王光美的做法,提出: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在运动初期所犯错误问题,已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解决了,现刘少奇同志仍是政治局常委、国家元首。你们不能不顾影响,把关于少奇同志的大字报贴到天安门去。

**11月10日** 王洪文等在上海制造“安亭事件”,阻断铁路交通。批评王洪文等人的行为,要求恢复铁路正常秩序。11月28日,又以国务院名义电告成都来京请愿工人“不要妨碍生产和交通运输”。

**11月12日** 出席首都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集会。人民出版社出版由周恩来题写书名的《宋庆龄选集》。

**11月中、下旬** 指导召开全国重点城市工业交通座谈会,研究工矿企业开展运动的问题。

**11月24日** 电告中共中央西北局,要求转告红卫兵不要公布和追查刘澜涛等61人出狱的问题。并致信毛泽东:刘澜涛同志等出狱,“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

**12月27日** 彭德怀被北京造反派从成都揪至北京。彭到京

后,周恩来指示北京卫戍区对彭加以保护。

## 1967年

**1月上旬** 在江青、张春桥等人怂恿下,数千红卫兵和造反派包围中南海,要求揪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亲自前往说服群众撤离,并严厉批评了清华大学红卫兵1月6日骗揪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行径。

**1月中、下旬** 对中央和地方夺权问题阐明看法,不赞成打倒一切,全面夺权。

**1月22日** 国务院所属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在造反派通讯下冤逝。为此,周恩来质问造反派:如果连一位部长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国家还有什么希望?那不真是“无法无天”了?之后,周恩来又强调:不能认为带“长”字的一概不要,那么多部长、副部长都统统不要了吗?不能,局长也不能。你们这样下去会走到反面。

**1月28日** 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研究起草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经毛泽东批准下发。31日,向军队系统宣讲《八条命令》。

**2月3日** 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贴出大字报,请求周恩来改变“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以利身体健康。一些中央负责同志也在大字报上签名,表示同意。邓颖超还写下几条补充建议。次日,周恩来在大字报上批:“诚恳接受,要看实践”。他还亲自选定一枚写有“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一直佩戴在胸前。

**2月中旬** 连续主持召开怀仁堂碰头会,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在会上痛斥“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乱党乱军行径,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极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周恩来在一些群众场合发表讲话,强调恢复党的领导,反对乱揪老干部,要求军队保持稳定。老一辈革命家进行的“二月抗争”失利后,周恩来竭力保护参加抗争的老同志;同时,在党内外继续抨击“左”的错误。不久,周恩来即被诬

为“二月逆流的总根子”。

**3月14日** 起草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文件，要求动员一切力量，狠抓农业、工业、交通等方面的工作，把生产搞上去。

**3月** 出席军以上干部会议，就全国军管等问题发表讲话，强调军管会要抓革命、促生产。

**4月14日** 致信毛泽东、林彪，提出确保广州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正常举行的意见。随即，亲赴广州指导广交会工作。

**5月3日** 接见十四省、市夏季粮油征购会议代表，发表《藏富于民》的讲话。

**5月19日** 致信毛泽东，就历史上国民党伪造的所谓“伍豪启事”问题作出说明和澄清。毛泽东批示将此件送“中央文革小组”阅存。

**5月31日** 致信“中央文革小组”，提出“铁路轮船关系到全国交通命脉，决不能中断。”同时拟定了军管方案。

**6月初** 针对国防科委系统某派群众组织在国防部门口“万炮齐轰聂荣臻”的作法，批评说“你们这样搞是错误的，因为你们没有根据。炮轰聂荣臻同志，也就联到我们。你们做得出轨了！”又说：你们搞打、砸、抢、抄、抓这一套，这不是什么“革命”，是不顾大局，是极左倾向。

**7月中、下旬** 和毛泽东赴武汉，解决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回京后，指示北京卫戍区负责人一定要保护好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不得被造反派抢走。

**8月中旬** 在王力“八·七”讲话煽动下，外交部造反派不顾周恩来多次关于“外交大权在中央，谁也不能夺”的申明、警告，在外交部进行非法“夺权”，擅自查封部领导办公室、拘留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等。并对外喊出“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的口号。在此前后，周恩来连续出席外交部造反派主持的“批判”陈毅大会，以“陪斗”方式保护陈毅，并制止“打倒陈毅”的口号。

**8月22日** 北京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周恩来紧急接



见外交部造反派，严厉批评“火烧”行为，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宣布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的。31日，周恩来再次召见外交部造反派代表及部党委成员，重申：外交大权属中央，中央授权给我，别人不能说，我管。又说，现在，国内的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外交工作，损害了我们的国际声誉，造成我说话都失灵了。

**8月底** 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

**9月1日** 出席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当着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的面，指出：我知道有些人专门对我进行研究，把我历史上多少年的东西都找出来。现在我申明，对某些人的帮助，我欢迎，只要他是善意的。但是，如果拿根本不存的问题来要挟，来煽阴风、点鬼火、搞阴谋活动，那我是坚决反对的！

**10月2日** 致电厦门市军管会，令其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海港运输。

**10月29日** 在全国铁路运输工作会议上指出：如何把铁路运输搞上去，这个问题太大了。从这里不仅看出业务，也看出政治。空喊“革命”而不抓业务，革命就是空的。

## 1968年

**1月13日** 接见全国铁路系统“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代表，并发表讲话，强调恢复铁路交通秩序是关系全国“抓革命、促生产”的关键，也是对铁路系统各个群众组织的重大考验。

**1月中旬** 根据毛泽东意见，宣布对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

**1月16日** 毛泽东对一封重提“伍豪启事”的来信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2月2日** 接见工交、财贸、农林口各部委及国务院直属单位

代表,要求各部门、各单位一定要把革命跟本单位的业务工作结合起来,再不能只抓“革命”,不管工作。

**3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通报“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大会。

**夏** 起草《制止武斗措施》。7月3日、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先后就广西、陕西两地持续发生重大武斗事件发出《布告》,要求采取果断措施,制止派性武斗,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7月28日** 陪同毛泽东等接见聂元梓、蒯大富等人,要求他们立即停止武斗,支持工宣队进驻所在院校,恢复学校的正常秩序。

**8月23日** 就苏联出兵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一事发表讲话,强烈谴责苏军的入侵行动。

**10月中、下旬** 出席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全会通过了由江青等人一手操纵凭伪证写成的所谓“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12月29日** 获悉徐向前在其住地受到批判,即批示有关单位进行劝阻。

**12月**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有关部门成立国民经济计划起草班子,开始编制1969年国民经济计划。

## 1969年

**1月底至2月初** 在两次谈话中提出:应改变气象技术落后面貌,做好气象服务工作。

**3月** 全国计划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座谈会期间,周恩来就企业管理体制下放问题作出指示。

**4月**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前,周恩来曾提议让王恩茂、徐海东等老同志参加九大。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和

新的党章,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周恩来当选为九届中央委员。会议期间,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建议克服并去除流行于会上的浮夸、形式主义等不良倾向。

**4月5日** 在《关于陶铸的病情报告》上批示,要求将病重的陶铸送入医院治疗。

**4月12日** 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汇报飞机生产质量事故问题时,严厉批评砸烂一切规章制度的做法,指出这是否定一切的极左思潮。

**4月28日** 出席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5月4日** 致信国务院直属口及人大、政协军代表,强调清理机关干部队伍时应注意政策,不要批斗民主党派的领导人。

**6月初** 具体安排、指导由陈毅牵头,有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参加的“国际问题研究小组”的活动,为其配置工作人员,批阅有关研究报告。

**6月至7月** 连续数次接见七机部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强调两年多来由于派性斗争给国防科研事业造成的损失和破坏,要求彻底砸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把国防尖端搞上去。

**8月27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决定成立各级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担任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组长。

**9月初** 率中国代表团赴河内吊唁胡志明主席,并同越南党政军领导人会谈。

**9月11日** 在北京机场会晤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就维持两国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问题达成谅解。18日,致信柯西金,重申了两国领导人达成的谅解。同年10月20日,中苏边界问题谈判在北京举行。

**9月30日** 主持盛大招待会,隆重庆祝建国20周年。一批老同志和民主党派人士出席了招待会。

**10月中、下旬** 根据中共中央统一部署,具体安排中央国家机关下放工作,并安置一批老同志及其家属离京疏散到外地。

## 1970年

**2月13日** 出席全国棉花生产会议,并作《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种好棉花》的讲话。

**2月至3月** 根据周恩来指示,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制订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并着手研究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

**3月4日** 就华罗庚来信要求追查被盗手稿事,指示有关部门负责人保护华罗庚人身安全,并追查丢失手稿,力求破案。

**3月18日** 前往机场迎接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一行,表示支持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柬政府,谴责朗诺集团发动的政变。

**4月5日** 应金日成首相邀请,赴平壤对朝鲜进行友好访问。

**4月下旬** 出席在中国境内举行的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同柬埔寨、越南(北方和南方)、老挝“三国四方”领导举行会谈。

**5月21日** 出席首都人民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

**6月** 国务院所属各部门机构实行重大调整,原有90个部、委、直属机构精简、合并为27个,暂定编制为原有人员的18%。

**7月31日** 就原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死亡问题,为国务院起草一份通知,决定将张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其家属按革命干部家属看待。

**8月下旬至9月上旬** 出席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会上,林彪、陈伯达等人搞突然袭击,煽风点火,搞乱会议议程。毛泽东揭露了陈伯达,挫败林彪抢班企图。会议期间,周恩来不分昼夜地工作,多次找陈伯达、吴法宪等谈话,批评他们的错误;同时,与有关人员研究“四五”计划纲要文件。全会批准了国务院关于

全国计划会议和 1970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

**9月17日** 同文化教育部门负责人谈话,提出不要因人废文,要反对形而上学、片面性。

**10月** 在第四机械工业部党组报告上批示,肯定该部部长王诤的历史功绩,指出对其应“一分为二”、“实事求是”,“不要上纲太多”。

**10月至11月初** 三次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就国际、国内问题阐述看法。

**11月13日** 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回复叶海亚转达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关于进行中美高级接触的口信。

**11月** 连续同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大学等外语院系师生座谈外语教学问题,强调要苦练基本功,培养又红又专的外语人才。

**12月24日** 致信毛泽东、林彪,阐明兴建葛洲坝水利工程的可行性。毛泽东表示赞成兴建此坝。

**12月下旬** 根据毛泽东指示,主持召开华北会议,揭发批判陈伯达等人。翌年1月24日,代表中共中央在华北会议上作总结讲话。

## 1971年

**年初** 在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期间,明确提出:在公安战线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不能说“文化大革命”前是“黑线”统治着,这种说法简直不可想象,等于否认毛主席的领导。

**2月11日** 向中央政治局报告 1971 年全国计划会议情况。

**3月上旬** 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

**3月中旬** 在周恩来具体指导下,中国赴日参加第 31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各项准备工作完毕。周恩来亲自起草关于赴日参赛的请示报告,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的报告,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启程赴日本名古屋。

**4月上、中旬** 根据毛泽东决策,正式邀请在日本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乒赛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4月14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中国“乒乓外交”震动世界。

**4月12日** 接见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成员,批评出版界的极左思潮,号召要讲历史,多出书,要广开言路,打破思想垄断。

**4月中、下旬** 主持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会上,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就庐山会议期间所犯错误以及全会以来一直揭批陈伯达不力等问题作了检讨。29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作总结讲话。

**4月至5月** 分别在国家旅游、援外会议和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作报告,阐述党的对外方针政策,批评极左思潮在外事工作中的各种表现。

**6月21日** 会见美国《纽约时报》、《每日新闻》和《华尔街日报》负责人和记者等,谈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

**7月6日** 接见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领导小组成员,谈对建国以来教育工作的估计及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看法。指出:“毛主席的红线也是照耀了教育战线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7月中旬** 同美国总统尼克松所派特使基辛格会谈,商定尼克松访华一事。10月下旬,基辛格再度来华,为尼克松访华作具体安排。

**7月29日** 接见出席教育、出版等七个专业会议的代表,就发展、普及教育及其他有关问题发表讲话。

**8月7日** 会见缅甸联邦主席、政府总理奈温,谈中国的对外政策。在谈到极左思潮对中国外交工作的破坏时,周恩来说:“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在青年中产生极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说服和纠正的。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

**9月9日** 在中央专委会上听取秦山核电站工程汇报,强调尖端工程须列入国家计划,以带动其他工业的发展。

**9月中旬** 林彪集团策动反革命政变,阴谋杀害毛泽东,分裂中央。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连续三天三夜紧张工作,指挥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部门同林彪一伙进行斗争。在毛泽东、周恩来领导下,迅速、平稳地粉碎了林彪等人的政变计划。林彪一伙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领导中央清查林彪死党的专案工作。

**9月24日** 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对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实行离职反省,彻底交代。

**10月25日** 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驱逐台湾当局的提案。接到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来的关于联大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和接纳中国为联合国理事会5个常任理事国成员的正式通知与邀请函后,周恩来与外交部等部门商讨派团出席联大会议事。11月9日,以乔冠华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启程赴联大,周恩来等送行。

**10月** 指示公安部对监狱情况做一次全面检查,要求改变在押对象(其中许多人是“文化大革命”中被监禁的老干部)受虐待的状况,并批评看管人员中存在的宁“左”勿右的错误认识。

**11月10日** 会见日本东京都知事和日本恢复日中邦交国民议会访华团,谈台湾问题。

**11月20日** 同英国作家马克斯韦尔谈话,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

**11月** 派专人在贵州找到贺龙夫人薛明,要她将贺龙病逝前的情况报告中央。

**12月5日** 听取国家计委关于召开全国计划会议情况汇报,就企业管理问题发表讲话,提出要整顿企业的意见。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全国计划会议联系经济工作实际,批判林彪一伙的干扰

破坏,制订出整顿企业的若干措施。

**12月** 就飞机生产质量问题连续作出批示,强调“必须严格执行试飞和全检制度”。26日,出席航空工业产品质量座谈会,讲话中要求深入批判无政府主义,批判极左思潮。

## 1972年

**1月10日** 组织安排陈毅追悼大会,并亲致悼词。

**1月21日** 就汽车生产质量问题作出批示,提出对此应“放在议事日程来解决”。

**1月25日** 致信毛泽东,对一度病危、经抢救之后初步恢复的毛泽东的健康及治疗情况表示关怀。

**2月5日** 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国家计委《关于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的报告》。

**2月下旬** 美国总统尼克松应邀来华访问。周恩来和尼克松就中美关系正常化等问题举行多次会谈,并达成中美《联合公报》协议。中美两国开始走向关系正常化。

**4月9日** 在广州观看部队文艺演出时,提出应继续肃清极左思潮在文艺工作中的影响,提高艺术质量。

**4月24日** 经周恩来审阅修改的《人民日报》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发表。社论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犯过错误的人,只要认真改正错误,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

**4月至5月** 连续抓出口罐头、衬衣、照相机等日用工业品和广交会展品的质量问题。

**5月中旬** 医务人员首次在周恩来体内查出癌细胞。医疗组提醒周恩来减少工作,配合治疗。

**5月至6月** 主持召开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先后在会上作民主革命时期党内路线斗争情况报告、《关于国民党造谣蔑地登



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报告。会议集中、系统地批判了林彪一伙。

**7月14日** 会见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和访问团时，向陪同的周培源交代说，要办好理科，提高基础理论水平，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之后，多次指示有关部门负责人：要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这件事不能再拖延了”。与此同时，周恩来还提出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上大学的意见。

**7月30日** 致信叶剑英、李先念等，要求采取措施，整顿加强气象业务工作。

**8月初** 针对外事部门及其他一些单位批极左思潮不力的状况，连续两天发表长篇讲话，强调“要批透极左思潮”。指出：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要批透极左，把政治落实在政策和业务上；要解放一批老干部。

**8月中旬** 根据毛泽东对邓小平来信的批示，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问题。

**9月下旬** 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应邀来华访问。周恩来和田中角荣就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举行多次会谈。29日，中日《联合声明》发表；同日，中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

**10月14日** 《人民日报》发表根据周恩来意见组织的一版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引起江青、姚文元等不满，指责这些文章是“转移斗争大方向”，是“右倾思潮抬头”。

**11月底至12月中旬** 批示同意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外事会议的主题是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之后，张春桥、江青先后作批示，反对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17日，毛泽东发表谈话，提出要少批极左思潮。批林要批极右。

**12月18日** 根据毛泽东关于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干部方式的批示，致信公安部负责人等，要求切实改善监狱待遇。

**同日** 致信纪登奎、汪东兴，指出谭震林是好同志，应让他回

京治病，并要求考虑邓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

## 1973年

**1月1日** 接见部分电影、戏剧、音乐工作者时，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电影太少的状况提出批评。

**1月2日**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家计委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提出从国外进口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和单机方案。

**2月26日** 听取国家计委关于1973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起草情况汇报。在插话中，历数林彪一伙给经济工作造成的破坏性后果，要求继续批判“左”的流毒和影响。还就切实解决国民经济中出现的“三突破”问题提出具体意见。

**3月8日** 出席中联部、外交部举行的招待在京中外女专家招待会，严厉批判“左”倾错误对外事工作的干扰破坏，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批斗和被迫离开中国的外国专家致以歉意，并欢迎他们重回中国工作。

**3月10日** 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并经毛泽东批准，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

**春** 致信毛泽东，建议抓紧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并具体提出先易后难的方案，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

**4月12日** 与刚复职不久的邓小平同时出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宴会席上。“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邓小平的公开露面，引起国内外的普遍关注。

**5月14日** 致信李先念、余秋里，提醒农业生产要注意防涝、抗旱。

**5月下旬** 主持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筹备召开中共十大、批林整风和国民经济计划等问题。会上向与会者强调：党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

都是满意的。

**6月9日** 陪越南党政领导人到延安参观、访问。

**6月29日** 会见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就中美之间在不同政治制度下发展两国贸易问题阐述看法。

**7月31日** 会见刚果总统恩古瓦比,介绍中国经济建设方针,即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按农、轻、重次序协调发展。

**8月中旬** 批示组建中国歌舞团,下设东方歌舞队等,并对组建中国话剧团、中国歌剧团作出指示。

**8月下旬** 出席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和新党章,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周恩来当选为第十届中央委员。经周恩来多方努力,毛泽东批准,邓小平、乌兰夫、谭震林、李井泉等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打击迫害的领导同志也选进中央委员会。

**8月30日** 出席中共十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秋** 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发起“评法批儒”活动,通过他们操纵的舆论工具,连续发表文章、评论,影射、攻击周恩来。同时,“四人帮”的亲信在清华大学开展所谓“反右倾回潮运动”。

**11月中旬至12月初** 江青等人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攻击、诬陷周恩来和叶剑英,称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毛泽东批评了江青的论调。

**12月中、下旬** 出席毛泽东召集的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参与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事宜。根据毛泽东提议,周恩来于22日起草了中共中央通告,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

## 1974年

**1月** 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转发江青等人主持编辑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25日,江青等在

中央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对郭沫若等著名学者横加指责、无限上纲，实际上是对周恩来等领导人搞突然袭击。他们还提出“批‘走后门’”问题，把矛头指向一大批老干部。

**2月初** 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对江青一伙“批‘走后门’”等问题提出不同意见，指出：如运动中只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就太狭窄了，不正之风决不止此；而对“走后门”又要进行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之后，毛泽东批示斥责江青等人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是“三箭齐发”，“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制止下发“一·二五”大会讲话录音。

**春** “四人帮”连续制造“蜗牛”事件<sup>①</sup>、批“黑画”事件<sup>②</sup>和《解放军报》停刊事件<sup>③</sup>，进一步向周恩来发难。与此同时，“四人帮”操纵的舆论工具借“批孔”为名，对周恩来进行露骨的人身攻击。

**3月中旬** 每日便血达100毫升。经全面检查，确诊为癌症复发。

**4月** 根据毛泽东提议，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冲破江青阻挠，支持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周恩来亲

---

① “蜗牛事件”——1973年12月，为引进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第四机械工业部派团赴美国考察，美康宁公司赠代表团每人一件玻璃蜗牛纪念品。1974年2月10日，江青借此指责接受美方蜗牛礼品是“屈服帝国主义的壓力”，“崇洋媚外”，借以攻击周恩来等国务院领导人。后经周恩来几次批示调查，搞清了美方送蜗牛并无恶意。

② “批‘黑画’事件”——1974年2月中旬至4月中旬，“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刘庆棠、于会泳等秉承江青、姚文元的旨意，在中国美术馆和人民大会堂举办所谓“黑画”展览，展出的二百多幅美术作品都是有关部门根据周恩来1971年以来的指示精神组织创作、并用于宾馆装饰和外贸出口的。

③ “《解放军报》变相停刊事件”——1974年1月17日，《解放军报》根据周恩来、叶剑英在空军党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刊登了一篇题为《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的文章。不久，王洪文、江青、张春桥等召集新闻单位开会，指责这篇文章“很坏”，并布置写反驳文章，批“折中主义”和“中庸之道”。3月11日，江青以中央政治局名义“勒令”《解放军报》停发白组稿件，使该报变相停刊达5个多月。

自部署出行方案,抱病送迎邓小平一行。

**6月1日** 因病势加重,住进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治疗。

**6月中、下旬** 江青等人在讲历史上的儒法斗争时,煽动批判“现代大儒”、“党内大儒”。王洪文针对周恩来批准从国外买船一事,指责这是“修正主义路线”。

**7月17日** 出席毛泽东召集的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严厉批评了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宗派活动。

**7月31日** 和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负责人接见吕正操、杨成武、王尚荣等,传达毛泽东1973年12月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为罗瑞卿以及“杨、余、傅事件”平反问题的讲话。

**9月29日** 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9月30日** 抱病主持盛大招待会,隆重庆祝建国25周年。

**10月中、下旬** 江青等人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借“风庆轮”事件向邓小平发难,将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奋起抗争。“四人帮”经过密谋,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状告周恩来、邓小平。毛泽东当即批评王洪文。毛泽东还指示王海容、唐闻生回京后转告周恩来、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周恩来、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建议邓小平任党中央副主席、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11月初** 致书在外地的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情况,表示:坚决拥护和执行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的指示。并告他的身体情况已较前一段有好转,如近期召开人大,定能吃得消。

**11月至12月** 根据毛泽东意见,主持筹备四届人大各项工作。12月23日,和王洪文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有关人事安排方案等。毛泽东批准了筹备意见和人事安排,再次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等职。江青一伙“组阁”阴谋被挫败。

## 1975年

**1月上旬** 主持召开中共十届二中全会，追认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选举邓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

**1月中旬** 抱病出席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会议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等12人为国务院副总理。

**2月1日** 先后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务院全体会议，宣布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并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

**2月2日** 向毛泽东报送《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由邓小平主管外交，在周恩来总理治病养病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经毛泽东批准。邓小平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3月中旬** 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周恩来的建议，决定全部特赦在押战犯，并给予公民权。

**3月20日** 致信毛泽东，详细报告病情及治疗方案。

**4月** 根据毛泽东意见，批准撤销中央专案工作，释放被长期关押的三百多名高级干部。

**5月3日** 出席毛泽东召集的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会上，毛泽东批评了江青等人批“经验主义”的活动，并明确提出要解决“四人帮”问题。会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表示支持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

**5月下旬** 为确保开好批评“四人帮”的会，致信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提议应进一步讨论吃透毛泽东5月3日的讲话，尤其应搞清楚有人带头批“经验主义”的问题。对此，最早提出批“经验主义”的张春桥指责周恩来信中“有些话不确切”。周恩来再复信以事实回击张春桥的辩解。

**5月25日** 审阅中央统战部报告,强调工作中应体现历来主张的民主协商精神。

**5月底至6月初** 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王洪文、江青等被迫“检讨”。

**6月9日** 抱病出席贺龙骨灰安放仪式,并致悼词。

**6月30日** 会见泰国总理克立·巴莫。7月3日,致电泰国亲王公摩万·那拉底·蓬巴攀,祝贺中泰建交。

**8月中旬至9月中旬** “四人帮”借评《水浒》一事大作文章,鼓噪批“投降派”。在医院的周恩来揭露、批驳“四人帮”的谬论。

**9月7日** 在医院最后一次接见外宾,宣布:邓小平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可以完全相信,邓小平同志将会继续执行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内外方针。

**10月下旬** 病势沉重。手术前对邓小平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表示支持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

**11月至12月** 病危之际,仍关注国内外大事,挂念台湾问题。嘱咐叶剑英等领导同志,注意斗争方法,不要把权落入“四人帮”手里。要求丧事从简,遗体解剖,不留骨灰。

## 1976年

**1月8日** 经医务人员全力抢救无效,9时57分在医院逝世,终年78岁。

**1月11日** 首都百万群众自发聚集街头,送别周恩来遗体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遵照周恩来生前遗嘱,将其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

# 日本帝国主义对牡丹江的经济掠夺

张兆庶 李建华 陈学良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大举入侵,并很快占领了整个东北,对中国东北进行了长达 14 年的殖民统治。日本侵略军于 1932 年 5 月占领了牡丹江之后,便在这里修公路、筑铁路,以此为据点疯狂掠夺当地的资源。日本侵略者对牡丹江地区境内的经济掠夺重点是木材和黄金、煤炭等资源。随着殖民统治的确立,其经济掠夺也全面展开。从资源掠夺发展到农、工、商各业全面大掠夺。

## 一、确定殖民统治交通网

日本帝国主义者入侵牡丹江之后,为了加速掠夺我国资源,便把控制原有铁路和修建新的铁路,作为头等重要的战略任务。1934 年日本侵略者将图们建设事务所改为牡丹江建设事务所,负责铁路的修建工作。下设 5 个中层部门和 15 个主务,其负责人均系日本人。这个建设事务所从 1932 年 5 月至 1944 年 12 年期间共主持新建了 9 条铁路。这些铁路是日本侵略者用刺刀和棍棒强迫中国筑路工人筑成的。每一米路基、每一根枕木,每一条钢轨,都渗透着中国人民的血泪。

这些铁路的修建情况是:1932 年 5 月,修建敦图铁路(敦化到图们),189.9 公里,翌年 9 月 1 日通车营业。这条铁路自敦化跨牡丹江,经大石头、明月沟、老头沟、朝阳川、延吉到图们,东部与朝鲜铁路接轨。这是至日本岛的最短运输线。



1933年4月,修建朝开铁路(朝阳川至开山屯),59.4公里,翌年4月通车营业。这条铁路自朝阳川起,途经龙井、东盛涌、道河到开山屯。它是通往朝鲜会宁至清渡港、日本海而达日本国土最捷径路线之一。

1932年6月修建图宁铁路(图们至牡丹江),248.7公里,1935年7月1日通车营业。这条铁路,自图们起向北跨嘎呀河,经汪清老庙进入老松岭至鹿道、东京城,经过古城宁安,到达牡丹江。为敦图铁路与东清铁路的联络线。

1934年3月修建宁林铁路(牡丹江至林口),170公里,1936年7月1日通车营业。这条铁路自牡丹江向东北在老爷岭与张广才岭之间,经桦林、宝林、向阳到达林口。

接着修建林佳铁路(林口至佳木斯),224.5公里,1938年7月1日通车营业,这条铁路自林口站起,经勃利到达松花江口岸的重要城市佳木斯。这是东满开发丰富的农产、矿产和林产的重要铁路干线。

1934年5月修建林虎铁路(林口至虎头),335.7公里,其中林口至东安(密山)段,1934年5月动工,1936年7月1日通车营业,东安至虎头段1935年2月动工,1937年12月1日通车营业。这条铁路以林口为起点经伪东安省平阳、密山到虎林,与中苏国境的伊曼相对。它是北满东部的干线,沿途土地肥沃,农产丰富,在完达山之南森林茂盛,又有滴道和鸡西煤矿、兴凯湖丰富鱼产,是一个新开辟的垦殖区。

1937年3月修兴宁铁路(新兴至城子沟),216.1公里。这条铁路自图佳线的汪清站以南一个小站——新兴站起,从清河进入深沟的大森林一带,穿越三个隧道,到达城子沟。1940年12月通车营业。

1938年3月修建绥宁铁路(绥阳至东宁),96.2公里,1939年11月1日通车营业。

1939年3月修建城鸡铁路(梨树镇至西鸡宁),44.5公里,

1942年通车营业。这条铁路是1925年建成的穆稜铁路从梨树镇站向东北伸延到西鸡宁(西鸡西)与林虎铁路接轨。

1935年修建了中东铁路线上的海林支线,1939年修建恒山和城子支线,1940年修建开道支线,1942年修建亚林支线,1944年修建东当支线。

为加强铁路线路的通车能力,加紧侵略和掠夺资源,还修建了双轨(复线)。1940年修复滨绥线,哈尔滨至牡丹江间实现了双轨化,1942年末牡丹江绥芬河之间也实现了双轨化,1941年9月林口至东安(密山)的双轨化也实现了通车营业。

这些铁路的修建,主要是按着日本侵略者的战争战略要求设计的。通过这些铁路的修建,把牡丹江和日本占领的朝鲜连结了起来,为将我国东北的物产资源经朝境掠夺至日本和将来进攻苏联提供了方便条件。

## 二、大肆掠夺中国资源

**黄金资源掠夺** 在林口境内的黑背,五林矿区是日本侵略者掠夺的重点。1932年,日本侵略者开始在五虎林(今五林)召集矿工采金。1933年,日本人在五河建利源金矿公司。该公司雇用矿工多达300余人,年产黄金1200两至1500两。1936年又有日本人建立“多地组金矿局”。1938年,“利源”、“多地”合在一起,改称“满洲五虎林采金会社”,年产黄金5000两以上。

在林口黑背矿区,1936年日本人建立采金株式会社驻刁翎矿业所,在黑背设立分所。拥有采金工人万余人。1936年黑背设有日本金矿局,金矿局筑有高大围墙和坚固的炮台。内驻日本守备队和警察武装数百人。1938年,日本侵略者禁止私人采金,黄金统一由日本银行收购。生产也由手工转向机械或半机械化生产。开采范围不断扩大。1940年,日本人在黑背设150立升的采金船一艘,日产沙金20至30两,月产700至1000两,矿区黄金产品长期从刁

翎飞机场运走，此期间日本采金矿拥有采金工人 7000 人。

**煤炭资源掠夺** 1935 年，日本侵略者雇用中国人，在林口杨木建煤矿，开设 5 个小煤井，工人 70 多人，年产煤 25000 吨。1940 年，日本人开始垄断煤炭开采，成立“煤炭出張所”并增设部分机械、井口到十几个，工人百余名。同时，又在乌斯浑河北的东山建立新矿。

**森林资源掠夺** 1932 年 3 月 9 日，日本侵略者卵翼下的傀儡伪“满洲国”一出笼，就规定森林统由伪满政府实行管理。为了加强对我国林区的控制，从 1934 年起，逐渐增设了直属于伪满实业部的森林事务所。1936 年 7 月森林事务所改为林务署。1937 年又将实业部主管林业的林务司改为林野局。同年 10 月又统一把林务署改为营林署，共 30 个。在 1934 年又新设了牡丹江、兴安、哈尔滨三个营林局，到 1940 年 8 月 1 日，又设置北安、齐齐哈尔营林局。在各营林署中直属于林野局的有 10 个署。其中属于牡丹江营林局的有 10 个署，属于北安局和齐齐哈尔局的各 5 个署。属于牡丹江营林局的是：龙井、图们、珲春、宁安、牡丹江、穆稜、一面坡、勃利、虎林、佳木斯 10 个署。

牡丹江营林署的前身是 1934 年设在宁安的森林事务所，由属官大贺贤太郎负责所长工作。1939 年 5 月正式成立宁安营林署，把管辖范围分为两半。当时署长为小栗之二。营林署内设置长务、利用、造林三个科。职员人数有署长 1 名，林士 31 名、属官 11 名，委任官试补 26 名，雇员 23 名，勤杂人员 102 名，合计 223 名。

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长期鲸吞我林业资源，自 1936 年开始实行有计划的掠夺性砍伐。1936 年与集团采伐合计产量共计 24.3 万立方米，到 1937 年继续增加到 28 万立方米，到 1938 年为 46 万立方米。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更有效地掠夺我国木材，开始修建森林小铁路。1936 年 4 月修建了二道河子线铁路，本线起于牡丹江省宁安县仙洞（国铁线的图佳线仙洞站西北），经过万家堡凿山河到考

家过二道河子,沿二道河子到达北岔王八礁子、钓鱼台、阎技沟,全长 77.34 公里。这条铁路的沿线山林面积 6.2 万公顷,蓄积 3200 万立方米木材,每年可出材 15 万立方米。此线在 1937 年 10 月 31 日竣工。此后又铺设三道河子线,以宁安头道河子为起点,沿牡丹江与已设二道河子线相遇,继续沿牡丹江沿岸下行到三道河子,全长 120 公里。

日本殖民当局还于 1934 年在牡丹江开办了牡丹江制材合资会社,到 1939 年,该厂每年消化原木 4.6 万立方米。到了 1936 年 1 月,又投资 100 万元开办牡丹江木材工业株式会社,社长为伊藤堪三。又在牡丹江扩建制材厂,消化原木能力每年可达 30 万立方米。该社于同年又增达 200 万元,把业务扩展到中国的华北。还有三荣制材、高冈号木材部等,一双双掠夺的魔爪都伸向牡丹江地区的大片森林。

总之,牡丹江林业在九一八事变前后一直处于被掠夺与破坏之中,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牡丹江林区无休止地破坏性采伐,使这里的森林资源受到惨重的损失。

### 三、建立殖民工厂、商店

日本侵略者除了对我国进行全面经济掠夺外,还利用我国自然资源修建工厂,为殖民统治服务。日本帝国主义于 1937 年修建了镜泊湖发电厂,1942 年发电。它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掠夺中国的资源进而支持全面侵华战争而修建的较大型动力工程。1937 年 7 月 23 日,伪“满洲国”总务厅企画处决定,将镜泊湖水力电气开发列为 5 年产业计划中电力发展的一个重点项目。原计划开发 6 万千瓦,其中 5 万千瓦供应延吉地区(当时称间岛省),开山屯造纸厂及天宝山铜矿,夹皮沟金矿,并为日伪军火工业提供动力,另外 5 千瓦向牡丹江市方面供电。

镜泊湖发电厂开始勘测统计是在中华民国 6 年,即 1917 年成

立富宁公司时开始,直到1937年11月30日结束。开工准备是1937年12月1日至1938年12月20日,主体工程建设是在1938年12月21日至1942年9月25日期间。1942年6月8日,第一台机组投产发电,同年9月26日第二台机组发电。此时堰堤工程尚未全部竣工,直到1945年6月30日,全部工程才告完成。

日本侵略者在修建镜泊湖发电站时,对建电站的中国人实行血腥的统治。日寇为了防止抗日联军袭击和劳工逃跑,设置了15种警备设施。电厂修建期间的土建工程劳动力,是由东亚土木株式会社各分包组从关内的河北、河南、天津等地欺骗招募来的。进入施工工地,犹如进了地狱。劳工们从事繁重的体力工作,而1938年至1939年间每日工资仅伪满币1.70至1.85元之间,由于物价飞涨,纸币贬值,实际所得还要大打折扣,即使这样,日伪当局在工资支付形式上,还是大动脑筋,对当地人,不怕逃跑,采取按月计发,对从关内骗招来的劳工则实行年终一次计发。名义上工资为0.80至1.85元,但扣除吃、用,再加上把头、工头层层留利,实际所剩已寥寥无几了。

施工中日伪当局只顾赶工程进度,不管劳工死活。1940年隧洞施工中,由于开挖地段碰上软地层,又因日伪当局对隧洞开挖中的安全保护工作马马虎虎,结果多次发生坍方,致劳工伤亡多名。当时在水力电气建设局担任电工的朱永明,就亲眼见到被坍方砸死的劳工尸体,一矿车一矿车往外运。一到夏季,霍乱和痢疾及瘟疫在工棚里传染流行起来,中国人得不到基本治疗,一旦得上病,很难逃脱死亡命运。1940年冬至1941年春,工地发生伤寒病大流行,两个月就死亡300余人。来自天津的劳工,当时称作天津班工人,年末生还者寥寥无几。各个工棚子每天都往外抬死人,病疫劳工死后无人掩埋,死尸或扔到湖南头荒山中,或扔到东沟里,招引来大群野兽,当时野狼成群,吃死尸都吃得红了眼,大白天有时就袭击活人。非人的生活,造成了中国劳工的大量死亡,直到解放后,电房东沟仍然白骨累累。

镜泊湖发电厂自1942年6月3日开始发电到1945年8月13日日寇逃跑为止,此期间日寇掠夺的发电量没有查到可靠资料记载,但根据常识推断在这3年多一点时间里,至少掠夺电量5亿瓦小时。

日本侵略者武力侵占我东北全境以前向牡丹江地区进行的经济侵略,以牡丹江内开设的一家商店字号高冈号为据点。其前身是日本人于1925年开的一个经营食杂百货的小店铺。到1933年,该店铺以日军武力为后盾大获发展,不但收买了西长安街四番(号)地(现牡丹江市西安区政府位置)的房产,还进一步扩大经营范围。到1937年,它的资本已由原来的15万元(日本金票)增长到150万元。1938年(伪满康德五年),日本人又在牡丹江市最繁华的“中区”太平路的东侧(现牡丹江日杂商场址),盖起了字号为“高冈号”的二层楼房大商店。楼上楼下共有1700平方米的营业大厅,楼体的面街部分是瓷瓦贴面。这是当时牡丹江市最大一家综合性商店,该店职工有100多人,一线的业务人员中有日本人也有朝鲜人和中国人。“高冈号”的主任是日本人安养善太郎,店内还有一名由日本人专任的“调查属托人”(实际是情报人员)。该店经营的项目,主要是向外推销日本的商品,既搞批发,也搞零售,经营的商品有布匹、纺织品、麻袋、棉花、糖、烟酒、纸张、文具、玻璃、建筑材料、五金、胶鞋、日用杂货、鲜果和一些机械设备等<sup>①</sup>。为了扩大商店影响,在一些商品上还印有“高冈号”字样。该店在竭尽全力推销货物的同时,也采购牡丹江当地农副产品。收购的货物,主要是大豆、豆饼、红小豆、苞米等杂粮。

“高冈号”除了在太平路开的这家大商店外,在长安街也设有商店和批发部。在它其他地方还设有“高冈号书籍部”、“高冈号碾米部”、“高冈号土木建筑部”、“高冈号煤油批发公司”等。

从表面看来,这个“高冈号”只是个有买有卖,有批发、有零售,

<sup>①</sup> 见日本哈尔滨满铁事务所:《北满概观》,第331—335页。

既采又购的商业企业。而实际上它是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一个前哨阵地。牡丹江市内的“高冈号”，开始是直接隶属日本在1928年设在宁安县城的“高冈号”。宁安“高冈号”又是日本人设在“哈尔滨高冈号”下属的一个中型“二大店”。总店设在民国时期哈尔滨市的透笼街上，“高冈号”在内的日人贸易馆，除肩负推倾日货、占领在华市场这一使命的同时，还肩负着刺探我国东北政治、经济、军事等情报任务，设在各贸易馆中的“调查委托员”就是干这种罪恶勾当的专职人员。他们到处活动，无孔不入地收集包括经济在内的各种情报，对“北满腹地”内“华商”特别加以“调查研究”，以便为日本当局提供“开拓”与“独占”我东北的决策依据。

#### 四、掠夺土地建立殖民开拓团

伪满时期，日本侵略者为了巩固其在东北的殖民地位，从日本本土硫球等地向中国东北移民，称之为“开拓团”。日本开拓团在政治上是殖民的基层组织，在经济上是农业生产组织，在军事上是日本关东军的后备队。日本侵略者从1939年起，向穆稜分期分批迁来开拓团，到1941年5月迁来8个团，460户，1090口人。日本侵略者在穆稜成立了“满拓”，将部分肥沃土地开始归为“满拓”所有，分给日本开拓团耕种。1941年，日本侵略者强制从朝鲜半岛迁移穆稜县朝鲜族开拓队589户，3335人，建立8个朝鲜部落。1941年至1945年间，在海林县境地，设有9个开拓团，在新安复光村西设有一个日本开拓团部。有60多户300口人，有步枪50支，还有马匹、大车。占有土地120多晌，有办公室、学校、商店、卫生所。团长秋田、副团长左腾。掠夺土地，移民、建据点，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大陆侵略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2月，日本陆军中将筑紫熊七（镜泊湖学园名誉园长），军官大林一之（镜泊湖学园长务）、林昌虎（镜泊湖学园长总务代理）等率领，职员（武装军官）13名，学生（武装士兵）217名，武装侵入宁安县镜泊湖畔松乙沟，强行赶

走了在那里的农民,强占了镜泊湖广大地区,建立起一个移民训练所,叫“镜泊湖学园”。这些入侵者,除每人有步枪外,还有机枪、小炮和无线电通讯设备以及汽车、马车等交通工具。他们最初住在被赶走的农民住房。1934年8月则开始建设所谓“学园”。他们把附近的农民抓去给他们当劳工,修建75间平房和军事训练操场(日本人称武上道场)、车库、住房、马舍等。“镜泊湖学园”名义上是培养日本移民的指导队和从事研究的一所学校,实际上是一个深入到民间的日本侵略基地和残酷压榨中国人民的据点,他们配合日本关东军“讨伐”我抗日队伍,对周围村屯经常进行大搜查。

## 五、苛捐杂税的压榨

日本侵略者除了直接掠夺自然资源而外,为了推动其反动的殖民统治,还通过苛捐杂税来搜刮民脂民膏。例如日本侵略者在林口县城征收的苛捐杂税有资料记载达47项之多。有典押税、照费、契税、注册费、营业捐、牲畜税、车捐、自卫团费、爱路献金等,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日伪统治者在征收苛捐杂税时,更是如狼似虎,在向农民征收粮食时,先由警察将农户的碾子和磨贴上封条,不许农民食用新粮,只有完成征粮后才能揭下封条。敢有违抗命令的轻则坐牢,重则杀头。

日本帝国主义对牡丹江疯狂的经济侵略,给牡丹江的经济以极大的破坏。大批农民失去了土地,大批工商业者破产,牡丹江地区丰富的物产和大批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却流入侵略者的手中。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殖民经济掠夺的手段多种多样,其残酷性也是罕见的。



##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始末

史 言

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标志着亚非国家摆脱殖民主义影响，掌握自己命运的新的历史时代已经来临。我国决定派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率代表团出席。

对我外交活动的积极开展，台湾蒋介石大感紧张与焦虑。蒋在当时发表的一篇秘密演说中表示，1955年4月至6月乃是“我们外交最危险的时期”。他指令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无论如何，要阻止中共参加亚非会议，这也是美方的意思，他们中央情报局将予以协助”。

仅隔几日，毛人凤便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以恐怖手段阻挠中共代表团的行动计划。随之，毛人凤就向他的部属下达了在香港侦察中央代表团特别是周恩来行踪的指令。

3月初，在我代表团为出席万隆会议正紧张准备之际，李克农领导的情报部门已经获悉，国民党特务已布置人员将对我代表团进行破坏。但当时尚不知国民党特务将采取何种具体破坏行动。这份情报意味着此次万隆之行将冒很大风险。

由于当时我们既无大型客机，也无去印度尼西亚的国际航线，只能租用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经与印度航空公司商定，4月11日上午，该机作为正常航班飞抵香港，下午再改为中国代表团的包机飞往雅加达。

不久，派往香港的国民党特务向台湾总部报告了这一情况。毛人凤立刻派人定做了一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模型，经过一番密谋，拟定了一个用定时炸弹炸机和在印尼实施暗杀的方案，呈报

给了蒋介石。

4月上旬,在我出席万隆会议的代表团启程的前夕,缅甸总理吴努发来电报,邀请周恩来总理来仰光暂住两天,商谈一下会议的有关问题,待会谈后,约周总理与他同机前往印尼。电报还称,届时他将派专机到昆明来接周总理。周恩来欣然接受了吴努总理的邀请。

这样,代表团兵分两路:一路由周恩来、陈毅率代表团主要成员先行昆明,待缅甸所派飞机试航成功后(那时我国和缅甸之间尚未通航),再启程去仰光,尔后由仰光飞雅加达;另一路,代表团其他成员则按原计划由香港乘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赴雅加达。

4月7日上午,在北京西苑机场上,周恩来总理一行刚要离开候机室登机时,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匆匆赶来,将刚刚收到的一份重要情报交给了周总理。这就是我情报机关获悉的蒋特炸机的阴谋。周恩来十分重视,当即指令,请转给在京的有关领导办理。

4月9日,已抵昆明的周恩来仍非常惦念着先期到达香港的代表团其他成员的安全,就在由昆明到缅甸试航成功的当晚,他给在京的邓颖超急拨3个电话。邓颖超又打电话给李克农,传达周恩来指示,再次提醒要注意香港飞机的安全。

李克农在向中央主要领导人汇报的同时,还向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批准采取外交行动。

外交部奉命通报给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杜威廉,请他们务必采取措施,保证中国代表团人员的安全。并将此情况通报给了新华社香港分社和代表团的同志。

新华社香港分社当晚就将情况通报给了香港当局。他们怕不落实,次日凌晨1时半,又派专人去印度航空公司驻港经理住处,向他通报了上述情况。印航经理起初不相信有人会破坏飞机,当我方人员严正指明:“我们有可靠的情报。希望贵方能引起注意,一旦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印航经理才不得不表示对飞机进行检

查。11日上午，新华社香港分社再次去人会见印航经理，提请印航务必严加防范。

在中国方面的再三敦促之下，香港当局和印航也都采取了一些必要的防范措施。

但是不幸的事件还是发生了。11日下午，“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驶离启德机场后，在南中国海上空爆炸坠毁。

次日，中国政府就“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发表庄严声明，指出：“这一不幸事件绝非一般的飞机失事，而是美国和蒋介石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并强烈要求英国政府及香港当局迅速查明此案。

4月15日周总理在仰光同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时，就向尼赫鲁建议由印度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各派一名政府官员，作为他们各自的代表，去香港共同调查处理这一事件。在亚非会议期间，周总理又接见了印度调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的代表——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商谈和安排了有关调查处理事宜，回京后周恩来又两次约见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最后确定由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作为尼赫鲁的私人代表，我方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熊向晖作为周总理的代表，去香港与港英当局共同调查处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经过尖锐的斗争，港英当局才不得不于18日晚开始逮捕蒋介石集团的特务人员，从5月18日到6月1日他们先后传讯了88人，其中拘留了19人，以后又逮捕了与蒋介石特务有关系的人员8名。

经过审讯和调查终于证实，“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是国民党保密局所属的香港情报站策划的，其主使人为周斌成，直接指挥的是金健夫，具体执行的是周驹。周驹原是香港启德机场的一名清洁工，在国民党保密局重金收买下，被接纳为保密局特工。奉保密局之命，他将定时炸弹伪装成生活用品带进机场，乘打扫卫生之际，溜到“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安放在飞机的轮舱附近。而香港警方虽在外部防范严密，但对内部缺乏检查定时炸弹的安

全防护仪器,同时对启德机场内的工作人员缺乏应有的戒备性。因而在周驹已将炸弹放入舱内的情况下,香港警方自以为安然无恙,便电告我方:“‘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已检查完毕,将于4月11日由香港直飞雅加达”。该机在飞到北婆罗洲沙捞越古晋100海里外时,放在飞机右翼的定时炸弹爆炸使飞机起火,机上人员除副驾驶员狄克西特、领航员帕塔克、机械师卡尼克三人遇救外,所有乘客及其余机组人员全部遇难。

周驹安放定时炸弹得逞后,未等下工,即逃回家中,在家躲了几天,于5月18日即印中调查人员到达香港的当天,乘陈纳德机队的民航班机,逃到了台湾。真相大白之后,港英当局本应将周驹引渡回香港,连同其他罪犯一并送上法庭,听从审判,但港英当局竟置我国政府的一再交涉和抗议于不顾,声称香港与台湾没有引渡条约,不但没有将周驹引渡回香港受审,而且借口证据不足,先后将全部在押人犯,其中包括证据确凿的要犯予以无罪释放,“驱逐”至台湾。至此,这一震惊世界的案件,实际上不了了之,不能不令人深表愤慨和遗憾。

## 《红军不怕远征难》征文启事

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60 周年,广泛征集红军长征史料,弘扬红军长征精神,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资料》编辑部、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中华魂》编辑部、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炎黄春秋》编辑部联合发起《红军不怕远征难》征文活动。

2. 征文主要对象为红军长征老将军、老战士以及当年红军长征路过地区支援和迎送过红军的老同志;征文主要内容应以亲自经历的重要战斗、事件、人物等感人事迹的回忆与记述为主。史实要准确,记事要具体生动,文字一般在 3000 字左右为宜,最长不要超过 5000 字。

3. 征文编委会将对全部应征稿件认真审读,从中择优汇编成《红军不怕远征难》征文图书出版。

4. 征文请寄北京 1924 信箱《中共党史资料》编辑部;邮编 100091;联系电话:2581166 转 5579。应征稿件请写明详细通讯地址、邮编,稿件请自留底稿,一律不退稿。征文截止日期为 1996 年 7 月 15 日(以寄发邮戳时间为准)。

5.《红军不怕远征难》征文活动的协办单位为深圳市龙岗区坂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红军不怕远征难》  
征文编委会**

1996 年 3 月 20 日